

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劉昌德 博士

被創制的仇恨—
媒體運動報導中的反韓框架分析



研究生：林宗偉 撰

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一月

摘要

本文針對國人長期存有的「仇韓情緒」進行研究，並認為這樣的社會集體記憶，一方面固然與台韓雙方長期以來的社會脈絡與歷史環境有關，但更重要的是媒體中介的結果，形成一種 Hobsbawm 所說的創制傳統。因此經由媒體下手，透過不同時期與不同報紙的運動衝突事件報導，進行資料蒐集分析佐以相關文本生產者訪談，希望勾勒出媒體在這波現象背後所扮演的角色。

大致上，從文本的分析後可以知曉，這種仇恨記憶是逐漸的被媒體創制出來，相較於第一時期（1983~1992 年）對於韓國較具包容性並以事件為報導基礎，第二時期之後（1992~2010 年），媒體的呈現對衝突事件的追蹤或說明逐漸變少、情緒性的花絮或是形容詞變多，並將衝突事件與韓國或韓國人整體構連，出現明顯的仇視對象。此外，不同媒體在報導上也呈現不同的立場，顯示媒體在面對這類與韓國的衝突事件，並不是如此的單純呈現，有其特殊的考量存在。

研究中也發現，在媒體的框架產製過程中，組織的經營考量往往成為文本產製的最終考量，使得仇韓新聞框架以讀者為導向，以新聞商品為前提創制文本。這樣的媒體真實隨著時間的拉長，也逐漸的被認知為一種社會真實，與整個大環境結構變得相互生成，慢慢成為一種「被發明的傳統」，自然地存在於眾人的仇韓集體記憶中，等待下一次的觸發時機並且作為媒體可依歸的新聞商品固定產製公式。

關鍵字：Hobsbawm、仇韓情緒、媒體框架、運動、國族、集體記憶

致謝

來政大念書，對我來說就像場奇幻旅程，至今仍然記得兩年多前放榜時的那種喜悅。從小因為阿姨在政大執教的關係，每當寒暑，總會跑來政大渡假，從濟賢橋上騎著單車俯衝而下，偷偷翻牆到北政國中打籃球，看著圖書館前的柏油路漸漸變成現在的磁磚地板、「復古」的井塘樓（還記得小時候去上廁所總覺得很陰森）化做嶄新的教育學院，好多回憶讓我對政大校園一直有種莫名的熟悉與親切感。

然而，大學聯考失常讓我與她失之交臂，本以為再也沒機會當個道南人，想不到好事多磨，讓我在考研究所時還是得到了她。如今兩年多時光匆匆，竟也到了要離開政大的時刻，仍然有種不真實的感覺，總覺還沒待夠，好似後山少爬了幾次、圖書館少待了幾回。

很慶幸自己進來政大遇到了很多貴人，首先當然是在政大的「衣食父母」盧非易老師，老師在我心目中一直都是文人雅士的典型，總是能夠那麼的怡然自得，似乎任何棘手的事到您面前都變得雲淡風輕，然後迎刃而解。很少看見一個老師那麼關心學生，每次開會時總會一個個問大家的近況，或是用開玩笑的口氣講：「最近活的還好嗎？」雖然自己每次都亂回答，不過心中都是充滿著暖意。還有盧師團隊的大家，佳惠、謝董、克威哥、GA 姐、同窗的布丁跟麗娜等等，謝謝你們兩年來的陪伴，讓我在苦悶的研究所生活中有了一些亮點。

促成這本論文的誕生，當然得感謝老爹 3.0 的貴人：昌德師，從上運動傳播的第一堂課開始，心中就默默的想跟定老師了，老師那種亦師亦友的感覺，讓人每次 Meeting 都能沒有壓力的進入狀況，並且在討論中都能盡力的以學生的立場去做思考，然後不厭其煩地給出建議，果然選對好的老闆，可以帶你上天堂！同時也要感謝兩位口委儒修老師和伯修老師，在兩次口試中的簽正與寶貴的建議，才能讓這本論文更臻完整。

最後，要謝謝的是我的媽媽，從小到大，儘管他可能都不知道我在念些什麼，但每當我做決定時，他總會默默支持，給我最大程度的選擇空間，沒有她我不可能安心的完成這段學業；還有女友夙雅一直以來的陪伴與鼓勵，讓我在撰寫論文的階段裡不致於過度孤僻和失去信心，也衷心希望我們都能順利的跨入下一個人生階段。

民國 101 年 2 月於連城路家中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背景.....	5
第三節 問題發想與研究目的.....	18
第二章 文獻探討	20
第一節 想像的他者：認同、運動與國族.....	20
第二節 框架、形象與集體記憶.....	25
第三節 新聞框架的產製過程.....	30
第四節 總結.....	37
第三章 研究方法	39
第一節 研究問題與步驟.....	39
第二節 內部挖掘－媒介文本的框架分析.....	41
第三節 外部探索－大眾仇韓論述框架解構.....	54
第四節 中介探討－行動者意向.....	55
第四章 新聞框架分析與討論	57
第一節 基本資料分析.....	57
第二節 不同時期媒體框架差異性分析.....	62
第三節 文本分析與討論.....	73

第四節 小結.....	87
第五章 大眾論述作為對照及新聞框架的產製過程.....	89
第一節 媒體與大眾的框架建構—以楊淑君事件為例.....	90
第二節 文本分析與訪談討論.....	95
第六章 結論.....	107
第一節 研究結果.....	107
第二節 研究發現與討論.....	110
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115
參考文獻.....	117
附錄一.....	125

圖表目錄

圖目錄

圖 4-1：三時期新聞框架論點分布.....	63
圖 4-2：三時期新聞框架方向走勢.....	64
圖 4-3：第一時期三報框架論點走勢.....	70
圖 4-4：第二時期三報框架論點走勢.....	70
圖 4-5：第三時期三報框架論點走勢.....	70
圖 4-6：四報框架論點走勢.....	71
圖 5-1：楊淑君事件媒體與大眾框架論點走勢.....	91

表目錄

表 1-1：引發反韓情緒事件一覽表.....	10
表 1-2：過去仇韓議題相關論文.....	15
表 3-1：歷年國際賽事與斷代對照.....	43
表 3-2：衝突事件分期表.....	45
表 3-3：框架論點編碼清單.....	48
表 3-4：框架方向編碼清單.....	50
表 3-5：報導形式與消息來源編碼清單.....	51
表 3-6：操作編碼表.....	52
表 3-7：訪談對象名單.....	56
表 3-8：訪談過程.....	56
表 4-1：新聞搜集樣本時期分布.....	58
表 4-2：新聞文本框架論點分布.....	59
表 4-3：新聞文本框架方向分布.....	60
表 4-4：新聞文本消息來源分布.....	60

表 4-5:新聞文本報導形式分布.....	61
表 4-6:新聞版面配置分布.....	61
表 4-7:三時期新聞框架論點分布.....	62
表 4-8:三時期新聞框架方向分布.....	63
表 4-9:三時期新聞文本報導形式分布.....	64
表 4-10:三時期新聞文本版面配置分布.....	65
表 4-11:三時期新聞文本消息來源分布.....	66
表 4-12:四報新聞文本框架方向分布.....	67
表 4-13:第一時期新聞文本框架方向分布.....	67
表 4-14:第二時期新聞文本框架方向分布.....	68
表 4-15:第三時期新聞文本框架方向分布.....	68
表 4-16:四報新聞文本框架論點分布.....	69
表 4-17:四報「借刀殺人」框架論點分布.....	71
表 4-18:四報新聞文本版面配置分布.....	72
表 5-1:楊淑君事件媒體與大眾(網路)框架方向分布.....	90
表 5-2:楊淑君事件四大報與大眾(網路)框架方向分布.....	90
表 5-3:楊淑君事件媒體與大眾(網路)框架論點分布比較.....	92
表 5-4:楊淑君事件四大報與大眾(網路)框架論點分布比較.....	94

第一章 緒論

楊淑君的哭，讓人想起「亞細亞的孤兒」，他「在風中哭泣，沒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遊戲」。當「亞細亞的孤兒」對上「淚的小花」，這場恩恩怨怨，可能會跟台韓國家的競爭，不斷地持續下去！¹

(林瑞，2010)

第一節 研究動機

2010年十一月中旬，台灣正值五都選舉倒數階段，政治人物無不想盡辦法媒體曝光，政論名嘴也各擁其主為之酣戰；與此同時，體壇上因為亞運掀起一波熱潮，台灣媒體也將餘光稍稍轉移至體育消息。奪金奪銀的期待、誰將成為下一個台灣之光？成為台灣民眾的最夯的茶餘飯後話題，其中，最受期待的依然是號稱國球的棒球殊死戰，在王建民長期因傷無法出賽以及中職簽賭陰霾的情況下，終於亞運似乎能為台灣人民帶來一絲精神上的光明，呼吸到一口新鮮的空氣，期待著中華健兒抗日退韓上演一齣齣熱血戲碼。

但這個時候吸引眾人目光的卻是跆拳道女將楊淑君因為電子襪不合規定遭到失格處分，哭喪著臉癱坐在跆拳道場上。雖然事件發生時責任尚未歸屬清楚，但當下媒體與網友們仿若本能地立馬揪出兇手：「又是韓國人，不意外！」楊淑君的淚，讓台灣人再度認知到自己猶如亞細亞的孤兒，在國際孤立無援，報導消息中滿是加害者韓國人的身影：

這樁中、韓聯手做掉比賽選手的爭議處分，是跆拳道自1984年列入亞運正式競賽以來最卑劣的醜聞。²

一開賽即遇到憾事。女子49公斤級奪金大熱門楊淑君，在對戰越南選手武氏厚時，被韓裔菲籍裁判洪性天以器材不合取消資格³

昨天楊淑君被判失格的事實成立後，網友紛紛把矛頭指向惡意裁臧的韓

¹ 〈亞細亞的孤兒 楊淑君的淚〉2010-11-20/聯合報/A27版/民意論壇/林瑞

² 〈真賤 中韓裁判聯手 做掉楊淑君〉2010-11-18/蘋果日報/頭條要聞

³ 〈廣州亞運 跆拳道 韓裔裁判惡整 楊淑君〉2010-11-18/旺報/頭條要聞

裔菲籍審判委員洪天性，揚言要大家一起抵制韓貨。⁴

各家媒體開始瘋狂追逐黑襪事件，各大名嘴也開始評頭論足，政治人物也藉此紛紛發表言論拉抬人氣相互攻訐，全民仇恨的焦點開始集中，菲律賓籍的韓裔裁判成為眾矢之的，然而大家大多記得不是他的名字也不是運動場上的專業說法，而是，韓國人又搞小動作了。

一時之間，全台灣仇韓情緒高漲，蛋洗韓僑學校、拒買韓貨、駭入韓國網站惡搞等等，似乎在情理範圍內能想到表示恨意的行為都紛紛出招。然而回想這種媒體的仇韓報導情境似乎已經不是第一次出現，有仇韓傾向的許多人往往都可以向你歷歷在目地指出，在他們心中台灣人於哪些場合裡又被韓國人擺了一道，楊淑君事件只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引燃了台灣人心中的這顆仇韓不定時炸彈。

奇摩民調中心在西元 2005 年曾做過台灣民眾世界觀系列調查，在韓國的部分，17005 總投票數中有百分之七十三的人選擇「對於韓國負面印象多於正面印象」，僅有百分之十六的人選「正面印象多於負面印象」。顯示韓國的形象在我國並不良好，這種印象來自於何處？是韓國的劣根性使然還是少數的行為被放大？

在台灣，國人似乎存在著一股仇韓情緒，無論是消極的拒買韓貨、拒看韓劇，或是較為激進的發表言論、鼓吹反韓，每個人的周遭好像都有這麼些仇韓的聲音出現，而媒體也不吝版面地大幅報導，與人際間仇韓情緒無接縫地互相串連。這種情形讓人聯想到英國的足球流氓，在研究中即認為英國足球流氓的形成原因在於，對內較為激進的中心分子不斷藉由言論、行為凝聚情緒，而外部媒體的不斷報導，框架出了這麼一群人，透過內外的建構過程，使得原有的情緒成為一種具體且持續擴大的現象（Whannel, 1979）。

有人會覺得仇韓是一種很自然的情緒，因為韓國人就是小動作不斷，缺乏運動家精神，就是應該要鄙視。這樣的回答很簡單很直接，但卻也讓筆者不禁去思考為什麼台灣人特別會去仇韓而不仇菲仇中。在籃球場上，菲律賓一向也是被認為小動作很多、打球不乾淨，但為什麼卻不曾形成一股全民的仇恨風潮？在政治上，中國在國際場合不斷的打壓台灣的生存空間，然而在面對仇中仇韓的選項

⁴ 〈激情過後網友籲理性 PTT 今天冷靜多了〉2010-11-18/聯合晚報/A4 版/焦點

時，許多台灣人反倒是優先的保送韓國。對於國人來說，韓國似乎分門別類的存在於 Halbwachs（1992）所謂的集體記憶中，具有選擇性與偏向意味。

新聞的展示，一方面提供了公眾在國族與他者的想像平台，一方面也為國族記憶留下有跡可循的證據，如同 Benedict Anderson（2002）在《想像共同體》一書中所提到的，國族認同的產生與印刷時代的來臨密不可分，當然國族認同的情緒並非只有傳播媒體單一因素，方言崛起以及帝國擴張等等都被 Anderson 視為歸因，但傳播科技的確改變了人們的時間觀，新聞不斷產出使人們能夠水平地去想像我族，成為現代人晨間禱的代用品，催化了國族的想像。

據此，國族做為「我」的共同想像，這種想像來自於論述的累積。早在二十世紀 Hobsbawm（1990/1997）便指出，民族並非是天然生成而是種創制，它來自於國家創建而後所產生的概念，是為了方便統一建國力量的重要手段，也是凝聚我族的最大公因數，國族仿若是一種軟體動物，一旦脫離了國家的殼，便失去形體。換句話說，國族的想像是立基於國家之上，是國家政治的一環。

德國政治學者 Schmitt（1932/2004）在分析國家政治本質時，即表示政治代表的就是一種劃分敵我的哲學，無法存在中立面，而敵人的劃分便來自於當一個鬥爭團體遇到另一個類似的群體時，便有敵人存在；敵人具有某種的公共性，因為其與國家具有相關性質。

韓國由於歷史上的特殊政經脈絡，身處與台灣相近的競爭位置，成為一個明顯能夠比較的假想敵，此一假想建立在「我族」的思考之上，以國族做為中心去看待韓國，此時韓國便成為他者，同時也被韓國化。如拿來類比 E.Said 的東方主義思考脈絡：「東方實是被西方東方化後的東方。」那麼仇韓情緒中的韓國實是被台灣韓國化的韓國，只是台灣尚無能量改造韓國成為我們的韓國化想像，還停留在第一階段由媒體框架化的他者想像過程。

然而，筆者認為想要瞭解這股情緒的誕生與成型，一方面固然脫離不了台灣人過去的歷史脈絡（台韓之間的愛恨情仇），進而形成一種全民的集體記憶，但是當代媒體的成熟以及背後的資本策略操弄，建構「仇韓」成為一種專有的新聞商品，或許更可以用來說明這個現象的出現。

從媒體角度進一步觀察台灣人對於韓國的了解方式，可發現因為語言文字的

障礙，其知識、資訊幾乎由大眾媒體而來，仇韓論述主要由媒體所帶起，進而在民間發酵，使得媒體夾著原有豐沛的經濟資本再加上文化資本，成為此論述場域中的支配角色；也因為韓國議題向來是國人在乎的主題，其新聞便有了可預期性的價值，據此，媒介可降低不確定的獲利風險，「仇韓」似乎是門好生意，背後有著長久而強大的國族意識作為銷售對象，再加以商業化包裝便成為賣相良好的新聞商品，如同近年來出現的許多台灣之光，捲起一波波風潮。

上述所及，提供了幾個立基點來思考目前國人的仇韓情緒。首先是歷史脈絡下的集體記憶逐漸形成了對於韓國的特殊情感與印象，這股情感是受大環境下的政治經濟脈絡所影響，然而在當中擔任重要中介角色的便是媒介，其導入事件並擁有解釋權，是故在中介的過程同時也成為記憶形成的儀式，固化或加深原有的記憶。其次，如將原本中介角色的媒體化作主體思考，那麼媒體商業的本質便可能驅使其朝向低成本、高收益的新聞產製方式，國族議題的仇韓新聞成為降低獲利不確定風險的好選擇。

另一方面，如果仇韓做為一種大眾集體記憶，那麼它有怎樣的特徵？而媒體在這股集體記憶中扮演的是一個承先還是啟後的角色？再者，媒體是如何感知這股情緒並且化作商業上的考量與實踐？

故筆者希望從上述的思考方向出發，選擇做為想像共同體重要中介的媒體著手，分析媒體對於運動場上的韓國相關報導新聞框架與產製背景，對照台灣社會中對於韓國的集體記憶呈現，來試圖解構台灣人的「仇韓情緒」原因及變化，是為本研究進行的主軸與意圖。

第二節 研究背景

一、交錯複雜的國族認同—亞細亞的孤兒

「身分和認同不是由血統決定的，而是社會和文化的結果。...具體的歷史過程、特定的社會、文化、政治也對『身分』和『認同』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張京媛，1995，15-16)

自十七世紀以來，台灣先後經歷荷蘭、西班牙、明鄭、清及日本的國家統治或殖民，以致後來台灣歸還中華民國，期間除歷經朝代更換，更為重要的是島內族群的融合與交替所帶來的身分認同變化。

在長達 400 多年的歷史更迭下，以明清與日本的影響最深，明清時代台灣開始移入中國東南沿海一帶的住民，其中又以福佬人、客家人為多數，此時的身分認同來自於中國或更準確的說稱之為中華文化圈，從「唐山過台灣」這句話可作為代表。

甲午戰爭後，日本開始五十一年代的殖民統治，島上居民因有了一個更為明顯的他者，閩、客間的區別轉為台人、日人代替。此時的島民身份認同大致上仍奉中國為母國，但已經逐漸出現所謂的台人意識。

時間轉至國府遷台時期，撤退所帶來的大批官民成為社會上的新興族群，此時遂又出現了所謂本省人、外省人的區別，此時本省人中國認同已夾雜了日據時期以來的台灣本土意識。不斷的族群融合，至今血統語言的界線已不再分明，也不再是最初階的共同體想像依據，島上居民的身份認同便隨著這樣特殊的社會、文化、政治背景產生一種複雜身份認知。

綜觀這種意識形態的產生，如荊子馨（2001/2006）所說，在日本殖民時代，台灣自我意識是把中國民族主義視為殖民解放的象徵，從此之後，「中國」在台灣民族主義的發展過程中，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隨著社會歷史脈絡變化，中國的角色也逐步變形。

周宜慶（2008）則從另一個角度看待這樣的自我意識，他認為日本皇民化對台韓兩國身分認同產生不同的影響，同樣經歷殖民的台韓，一個親日一個卻反

日，實與台灣豐富的移民背景與地理位置有密切關係，多移民環境相對於韓國單一民族讓台灣沒有強烈的排外性格，位居太平洋島鏈中心，習慣於各類強權的統治。這樣的情況下，便讓台人在日據時期產生中國意識的同時，也逐漸萌芽出奠基於日本統治下的特殊台灣認同，國民政府遷台後發生的 228 事件更加深了這種本土意識，懷念日本的同時也切割出所謂的本省、外省族群想像，使得台灣人的認同裡同時包含著中國認同與台灣認同。

不過，從歷史的角度看待這樣的過程都可以發現，台灣人的認同是一種複雜而流動的狀態。因此，在面對不同的事件與目標時會產生不同的自我想像。荊子馨（2001/2006:112）在分析日本殖民以來台灣人的自我想像便提到：

仔細檢驗這些看起來像是民族主義的聲稱以及他們宣言背後隱藏的情境，我們將會清楚發現：這種對中國「祖國」的渴望，比較不是來自根深抵固的有機關係或根本的文化關聯，而是基於殖民情境以及他們無力改變的不滿。

換句話說，這種認同來自於一種類似工具性的使用，當今天台灣人想要反抗或是突破某種困境，或是合理化對抗他者的憑藉時，便可能運用這種交替使用的認同來發聲。但這種流動的認同來自於更深層的悲劇性被遺棄情緒，就如同《亞細亞的孤兒》便是台灣在殖民統治的強化以及中國民族主義的幻滅下逐漸「成形」的一則寓言，也成為現今思考台灣近代史的強力隱喻，讓台灣人將自己的民族史描繪成一部背叛與遺棄的歷史（荊子馨，2001；鄭力軒譯，2006）。

孤兒，代表的是被遺棄、沒有歸屬的概念，他是在被背叛的衝突與矛盾中產生的，因此厭惡被背叛，也因此更渴望藉由其他的方式得到認同。然而這種認同本身是不穩固的，是一種去中心化的主體位置所構成的認同，必須高度仰賴著論述，社會結構，反覆，記憶和情感的投入，以便在一個變動不居的世界中維持一種凝聚感（荊子馨，2001；鄭力軒譯，2006）。

這種流動認同也說明了為何我們不斷地出現或營造所謂的「台灣之光」，這種「台灣之光」現象，從另一種角度來看，便是「亞細亞的孤兒」為了取得認同的深層渴望，因為唯有透過這樣，我們才能被看見、才能被重視。也因為這種心態，「孤兒」無時無刻地擔心再被人背叛、擔心不被他人看見，更擔心被別人比下去。

韓國，在現代史中正好成了這樣的一個明確「他者」。這種質疑與焦慮心態即如知名作家楊照（2002）的〈韓國現象的省思〉一文中所映照：

台灣和韓國，不算親近，卻老是被相提並論。遠的有日本帝國主義擴張時期，台灣和韓國同屬日本殖民地；冷戰狀況下，台灣和韓國都是美國防堵戰略的重要旗子；近一點，到了八〇年代，台灣和韓國同屬於在日本『雁行行列』中亦步亦趨的亞洲四小龍……短短四年，情勢丕變。韓國以不可思議的魄力與速度進行改革，經濟從谷底翻身上坡，世界盃之後，韓國商品受到高度重視。台灣呢？。⁵

在這段文字中，可以發現在近代發展中，韓國似乎就是另外一個「我們」，幾乎相同的被殖民歷史背景、相同的經濟發展位階，但隨著國家發展情勢的不同，我們或有領先或有落後，不變的是，韓國在過程中已成為我們在意並且去比較的重要對象。

這樣的在意，同時也是流動、複雜且呈現一種工具性。在台灣認同上，奠基於兩國一路相似的被殖民軌跡，無論是日據時代的威權統治還是二戰後的美國強力介入，台韓兩國都在相似的位置出發，無論是在政治、經濟、體育的發展上都極為相似，也因此產生了如七〇年代經濟部長趙耀東所說：「韓國能，我們為什麼不能？」的強烈競爭心態。

在中國認同上，前述所說的競爭心態，其實又包含了大中華文化圈優越感消逝的失落與心有不甘。從最早的箕子開國⁶的傳說、後來中韓之間的藩屬關係以至於蔣介石時代建立起的兄弟之邦⁷，我方的主觀心態都是由上而下，然而隨著國共內戰後撤退來台，在國際情勢趨使下，韓國與中共建交，使得台灣人至今存在著被背叛的無奈心情。如此脈絡在朱立熙（1993：72）在其對中韓兩國關係分析中，便有這樣的巧妙敘述：

從君臣的宗藩關係，到乾爹兒的父子關係，再到兄弟關係，乃至於弟弟翻臉不認哥哥；一百年來中韓關係淪落至此，孰令至此？

⁵ 楊照，〈韓國現象的省思〉，《新新聞》，2002，800期。

⁶ 據《史記》記載，據說朝鮮是由商朝的宗室箕子建立，典籍中最早出現「朝鮮」一詞的是《尚書大傳》中周武王封箕子於朝鮮之地。

⁷ 朱立熙（1993：80）在其書中表示，蔣介石時代，我方曾幫助南韓獨立建國，而之後數屆的韓國駐華大使或都跟蔣介石有師生關係或乾父子關係。

一語道出台灣人錯雜認同的心中韓國印象。正如江佩蓉(2004)研究中分析在地對韓關係的主要論述時表示：「我們必須先認知一個事實，在地的對韓思考其主體位置是中/台交互為用，同時並存的。」

台灣對於韓國有著的相對複雜的心態，讓「亞細亞的孤兒」仿若看見另外一個自己，深怕被競爭而無法被眾人所認可，使得韓國成為一個容易受到放大的比較對象，這樣的情節出現在台韓兩國文化、經濟、體育的交流上，讓台灣人對韓國有著特別的愛恨情仇。

二、台韓愛恨情仇

2002年六月，世界盃足球賽如火如荼舉行，台灣一如往常的掀起足球熱，眾多一月球迷紛紛出籠，盯著電視上的球賽轉播，臉上可能畫著遙遠國度的國旗樣式，為自己喜歡的球隊(星)搖旗吶喊；不同的是，今年韓國一路過關斬將進入四強賽掀起一片爆冷門討論浪潮，然而最終在韓、德對抗中敗下陣來，同為亞洲一分子的台灣人是怎麼看待這次賽事呢？郝明義(2004：173)在其回憶錄中對於隔天報紙的一張照片有這樣的描述：

那是一幅橫的照片，拍的是在某個百貨公司廣場上觀戰的觀眾表情。照片左邊，是一群韓國觀眾，男男女女，顯然是德國剛進了球，大家臉上的神情均十分失落……而照片的焦點，是一個韓國男孩子側身，一臉不解地看著那個狂笑的台灣人。

郝明義認為會有這樣的狀況並非是台灣忌妒韓國，而是雙方文化差異所造成的觀點不同，使得台灣媒體時常出現對韓國的批判。然而從這也可以看出台灣人對於韓國的特殊國族情緒，正如劉昌德(2003)在其文中所指出，台灣的部分媒體論述在韓國進入八強時，未詳盡的分析比賽詳情，反倒未審先判地列舉韓國過去把在各項比賽中「做掉」中華隊的紀錄，將韓國晉級描述成足總醜聞。足球又或者是這類國際性運動賽事，對於台灣人來說似乎成為民族情緒的宣洩出口，對於主流媒體而言，這樣的論調更是將國族化為熱賣商品的最好做法。

焦點轉移到流行文化趨勢，2002年前後正是「韓流」吹起的一波高潮，韓劇「火花」的播出開啟了國人收視韓國戲劇的興趣，東方消費者資料庫更在調查中指出韓劇在2002年首度以13.4%超越日本電視劇的7.8%，成為國人最常收視

的外來電視戲劇節目。在這之後，「冬季戀歌」更造成一股裴勇俊風潮⁸，讓迷姐迷妹為之瘋狂，另外，哈韓風也間接的引起國人學習韓文的興趣，自 2000 年後韓文學習者與坊間補習班如雨後春筍般出現（郭秋雯，2008）。綜觀韓國流行文化的興盛相對運動場上的仇韓情緒恰成了強烈的對比。

江佩蓉（2004）認為在被泛稱為「哈韓」現象的內部，其實包含了內在的異質性，其中包括了哈韓／恐韓／仇韓交雜的複雜情感，而媒體所指稱的「哈韓族」相較於哈日並不存在，而純然為媒體建構的結果，因為那些被外界認為符合迷特徵的「哈韓族」，內心往往擁有哈韓與仇韓的矛盾認同。

當代台灣仇韓情緒來自許多方面，一路以來經濟產業的雷同競爭性，乃至於 2000 年後文化產業上韓國的突飛猛進讓台灣文化市場不安；在運動賽事如籃球、棒球、跆拳道方面台韓始終是勁敵；在文化正統性方面，近年來不斷出現的「某某物乃韓國所有」新聞消息，更加深台人對其不擇手段的刻板印象，然則綜觀這一路來台韓的愛恨交織情緒，似乎可以發現一個脈絡，即國族情緒的言論爆發點都是以國家為競爭單位的運動場域（柯裕棻，2009；陳姿伶，2008）。筆者據此蒐集網路上網友所提及的台韓衝突事件新聞也頗印證這樣的觀點（表 1），並發現特徵似乎分做幾類：

（一）政經事件衝突：此類較少且集中在 90 年代以前，近年來較為著名則是三星告密事件，但深究其原因則應歸屬為第二類。

（二）不擇手段的求勝方式：此類數量最多，並集中在運動賽事上，多為裁判不公或是缺乏運動精神的小動作不斷。

（三）文化侵奪：集中在 2008 年後，包含了某某為韓國的新聞消息，消息來源多引自中國，雖後來被查證多為假新聞，但仍為許多人相信。

⁸ 美國紐約時報曾報導裴勇俊一年所創造的經濟效益產值高達 23 億美元(超過台幣 700 億)，台灣媒體更曾預估光他來台一次可能就創造出三億台幣的產值。資料來源：
<http://www.epochtimes.com/b5/5/8/17/n1021083.htm>

表 1-1：引發反韓情緒事件一覽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蒐集整理

時間點	事件	摘要
1983/0505	六義士事件	中共民航機遭卓長仁等六人劫持降落在韓國春川，後遭韓國判罪羈押一年三個月後驅逐出境遣送至台。
1984/0407	亞青杯旗歌事件	至漢城參加亞青杯籃球賽的中華代表隊，因旗歌問題未能解決退出比賽。
1988/0711	瓊斯杯群架事件	中韓雙方為爭奪籃球有肢體碰撞，以致球員摔倒產生衝突扭打，而後觀眾鼓譟將雜物丟進場內，最後比賽沒收，韓國勝。
1989/0922	亞洲棒球錦標賽改變積分計算方式	韓國在賽事後期改變積分演算法，將台日韓並列冠軍。
1992/0819	中韓斷交	中韓結束正式外交關係，雙方撤使、斷航。韓國無事先通知便將我國大使館以 1 元過渡給中共。
1997/0519	釜山東亞運籃球加時	中華男籃隊以 1 分領先，韓國隊隊員徐章勳終場前 2 秒鐘取得罰球機會，韓國工作人員竟「不小心」將時間多調幾秒，經中華隊抗議後時間調回，最終由中華隊取得該屆冠軍。
2001/1207	世界電玩大賽加賽	曾政承在預賽打勝韓國第一 AoC 好手，韓國裁判宣佈比賽不算，要加賽一場，否則台灣以棄權論，不過最後仍由台灣團獲勝。
2001/0716	亞洲杯自由車錦標賽偷獎牌	在台灣主辦的亞洲盃自由車錦標賽，頒獎時間因故延後時，一名韓國選手偷拿一面銅牌，事後工作人員追回這面獎牌。
2002/06	世界盃足球賽誤判	被質疑裁判多次判決明顯的偏袒韓國隊，令與韓國隊交手的球隊受到了極其不公正的待遇。
2002/8/20	藝人遊行抵制	因韓劇盛行壓縮台劇播放時數，影響台灣藝人生存

	韓劇	空間，演藝工會號召上街遊行。
2002/1011	釜山亞運跆拳道裁判偏袒	吳燕妮八強賽時卻遭遇不公平對待，每次踢到對方，韓國裁判都不算分數，我方教練和選手十分不滿，因此宣佈罷賽退場，以示抗議。
2004/0718	瓊斯杯女籃邀請賽蓄意攻擊	賽後韓國隊球員在握手時疑似肘擊與以腳踢人，引發錢薇娟反擊。
2006/0822	力行國小少棒冠軍扣留	台中市力行國小棒球隊應邀到韓國參加比賽，最後進入 8 強，不料韓國隊卻以要把冠軍留在當地為理由，禁止力行少棒隊繼續比賽。
2007/1202	亞錦賽遲交攻守名單	南韓隊遲交攻守名單還在日本隊確定推出左投成瀨善久後，突然換成以右打為主的新名單。
2008/06~8	某某為韓國的假新聞	台灣媒體轉引自「國外媒體報導」表示釋迦摩尼、老子、孔子為韓國人或端午、豆漿為韓國傳統。
2009/1207	曾敬翔襲喉事件	韓國選手宋智勳在開賽僅 17 秒時直接以拳頭攻擊台灣選手曾敬翔的頸部，導致曾當場倒地緊急送醫，韓國籍仲裁委員作出爭議判決，將金牌頒給犯規的南韓選手。
2010/05	李白是韓國人系列新聞	台灣媒體轉引自「國外媒體報導」，同樣在之後被證實為假新聞。
2010/1209	鴻海遭韓企檢舉托拉斯	歐盟執委會裁定台灣四家面板廠奇美電等因聯合壟斷面板價格，重罰 5.339 億歐元，韓國三星電子因扮演「告密者」而獲判免罰。
2010/1117	楊淑君黑襪事件	楊淑君首場出戰越南選手，在九比零的領先優勢下，於終場前 12 秒突遭韓裔菲律賓籍裁判以「電子襪不符大會規定」為由，直接判定楊淑君失格。

由上歸納可發現仇韓的衝突點都圍繞著某種刻板印象：即為求勝利不擇手段、缺乏運動精神、不公平。除了運動場合外，台灣人的角色往往都是一個受害者，媒體也據此時常撻伐韓國的不當行為：

奇美電被控涉及聯合壟斷面板價格，遭判處三億歐元……鴻海董事長郭台銘以股東身分出面向歐盟申訴，左批對手才是壟斷元兇、右評政府統籌不足，更嗆聲奇美電不會倒，「一定會把錢從韓國人手中賺回來！」……奇美電遭處罰最重，除了「比較老實」外，背後真實原因是，奇美電的產品、技術即將超越對手，競爭對手非常害怕奇美電坐大，更不樂見台灣面板產業起飛，簡直是想要「消滅」台灣業者。⁹

新聞中往往探討的不是應該持平的觀點以及衝突的原因，而是第一時間的去抓出「戰犯」，將加害者用紅字圈出，冠上「果然如此」的大帽。這樣的做法也突顯台灣人較為激情的一面：

「台灣人太主觀、也太需要發洩的管道！」楊照認為，從阿扁司法宣判到楊淑君失格，台灣人動不動就覺得自己「被欺負了」，只要有人稍稍揮動國家或藍綠旗幟，「台灣人就受不了引誘，先發洩自己的情緒再說」，連最基本的事實都不願意搞清楚。¹⁰

然而，這種仇韓情緒的被害妄想症其來有自，來自於台灣、韓國各種面向的競爭與比較心態，來自於台灣人對於韓國的複雜認同，進而形成了一種自主性的缺乏與集體焦慮，而運動賽事上的爭勝其實代表的是欲奪回其他場域上失去的文化自尊（柯裕棻，2009）。劉昌德（2010）也認為仇韓的情緒並非是短暫的激情，更不盡然是台灣人的虛幻想像，而是來自於政治經濟的結構因素，唯有找到台灣的自主性，我們才能超越這種想像出來的國族情愫。

從這個角度來看台韓之間的愛恨情仇，可以了解這是一個大結構下的社會情緒，從歷史脈絡所建構出來特殊認同的因，加上產業、體育成果的具體競爭，使得台灣人對於韓國有著又愛又恨的果。愛的是一種羨慕與忌妒，除了韓風所吹起的影視明星風潮，也羨慕韓國在政治上的相對獨立性，同是日本過去殖民地，但韓國卻能輕易地獲得國際上承認並獲得經濟的躍進，也因此羨慕之際由愛生恨，愛的越深也越恐慌。

但在這個大結構下，不可忽視的是媒體的力量。如果將上述的仇視過程想像成一列運載著眾人記憶與情緒的火車，那麼媒體就是各節車廂之間連接埠，串起

⁹ 〈韓想滅台灣業者 郭董出招〉2010-12-11/聯合報/綜合

¹⁰ 〈被欺負了 楊照嘆：這是廉價的憤慨〉2010-11-19/聯合報/廣州亞運

了每個區塊；又像是過濾資訊後的儲存槽，藉由闡述各式的新聞文本建立眾人的集體記憶。Gillis（1994）在研究記憶與認同關係時便指出，大眾媒體儲存並分類了「過去」，而這些被中介（mediated）的過去，也成為媒體權力合理化的資源，能夠凝聚共識並加強認同。

如同國內學者翁秀琪（2000）從集體記憶的角度去探討美麗島事件之所以被重視，乃是因為事件喚起了人們對事發當時的爭議，而更重要的是媒體提供一個關鍵的資訊來源，讓民眾去爭議、協商如何分享意義。換句話說，媒體的文本提供了我們對事物共同想像構塑的重要線索與依據，然而更值得思考的是，媒體在產製新聞所憑藉的運作環境與再現方式為何？

三、新聞商品？媒體仇韓論述的呈現方式

如以此次楊淑君事件這波仇韓風潮做為例子，筆者閱讀相關新聞時，發現到各大媒體在報導時，在消息來源部分，除了事件相關人物如選手、教練、裁判外，常會出現雷同性極高的消息來源，例如：

楊淑君遭抹黑事件激發國人反韓浪潮，甚至有不理性的民眾跑去韓僑學校丟雞蛋。對此，衛生署署長楊志良表示，他也火大到想要「拿刀砍人」¹¹

一向快人快語的衛生署長楊志良不改直率發言風格，坦言「討厭韓國人」，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感情上會很火大、很生氣、很想拿刀砍人！但理性上，還是應訴諸法律途徑。」¹²

衛生署長楊志良昨天說，人都有感情，楊淑君受委屈，在感情上他會想拿刀砍人，但理性上要訴諸法律。¹³

此外，在報導內容的部分，原先體育場上的判決疑義焦點，隨著 11 月 16 日事件發生的時間推移，文本也逐漸偏向於個人化的敘述，並開始將楊淑君冠上漂亮寶貝、台灣之光等等稱號，而在內容的描寫上，也強調具戲劇化的故事性質，例如：

¹¹ 〈楊淑君事件 楊志良：火大想砍人〉2010/11/22/自由時報/政治

¹² 〈想拿刀砍人 楊志良語出驚人〉2010/11/23 /中國時報/焦點新聞

¹³ 〈楊志良：感情上，我討厭韓國人〉2010-11-25/聯合報/綜合

劉聰達在門口趁機求婚：「不希望淑君打奧運，這樣會影響我們一些『行程表』，嫁給我就好！」而楊淑君則嬌羞回答：「不要亂講啦！爸媽在裡面。」¹⁴

劉聰達表示，求婚是他跟總教練劉慶文之間的玩笑話。賽前他跟劉慶文談到，他作夢都夢到楊淑君拿金牌後該怎麼辦，劉慶文反問他，自己才開玩笑說「那我就跟楊淑君求婚」。¹⁵

又或者一方面呼籲切勿仇韓，但卻又藉由其他人情趣味事件營造出處處仇韓的氛圍，仿若全台灣皆是仇韓警戒區，例如：

公館鄉劉姓彩券業者昨天在店門張貼「為中華隊加油！拒賣韓國人」告示，苗栗市羊肉爐業者涂勝雄也呼籲國人抵制韓貨、韓劇，聲援楊淑君。¹⁶

反韓情緒延燒，韓姓人士也受辱！基隆市何藍韓宗親會理事長韓良圻，昨天要求外交部等部會，將「韓」國翻譯改為「寒」國，以免姓韓姓人士蒙羞。¹⁷

楊淑君被判失格事件，國內興起反韓風潮，台中縣有消防隊員改編韓國「nobody」歌曲，將歌詞「nobody but you」改成「韓國裁判，沒生目調」，大跳舞蹈歡送同事，順便諷刺韓國裁判。¹⁸

由上述的觀察不難推估，本來的運動議題新聞已經逐漸變質，在議題的操作上，媒體有著更多商業上的考量，對於媒體而言，原有的事件報導已經無法提供足夠的新聞內容，去餵養更多的閱聽人。因此，縱向的朝煽情、戲劇化描寫、橫向的發展相關國族意識事件，便成為包裝新聞商品的必要手段，從而降低成本以及新聞獲利的風險性。

四、相關研究文獻資料

韓流大約在 2000 年前後興起，除吸引了大量的流行追隨者，也讓學界產生

¹⁴ 〈返回老家團聚 男友趁機求婚〉 2010-11-24/蘋果日報/頭版

¹⁵ 〈楊:常夢到拿金牌 婚事再等等〉 2010-11-23/中國時報/焦點

¹⁶ 〈彩券行公告：拒賣韓國人〉 2010-11-19/自由時報/北部

¹⁷ 〈韓姓宗親蒙羞 要求韓國譯寒國〉 2010-11-23/自由時報/北部

¹⁸ 〈消防隊 改編 nobody 消遣韓國〉 2010-11-22/聯合報/大台中綜合

研究興趣，至今累積了一定的研究數量，大多是針對韓劇的興起原因與閱聽人收視經驗討論；而在國內探究仇韓相關議題的論文極少，且多數仍是從探討韓國流行文化著手，於其中再旁敲側擊地將台灣人的仇韓情緒拉出討論，其主要目的仍是為了補足對照哈韓閱聽人的媒體使用反應，對於國人反韓情緒的正當性與形塑過程則較無著墨，是以刺激筆者有進一步探究的欲望，希望可以解構這股特殊的仇視心態。下表列出數篇論及反韓、仇韓相關議題論文暫作介紹：

表 1-2：過去仇韓議題相關論文

時間	作者	名稱
出處		
2004	江佩蓉	想像的文化圖景：韓流與哈韓族在台灣
政治大學新聞所碩士論文		
2004	劉伊倩	韓劇閱聽人研究－以台北女性為例
台灣大學新聞所碩士論文		
2008	陳姿伶	台灣年輕男性韓劇閱聽人的收視經驗
台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所碩士論文		
2008	楊芳枝	Rap(p)ing Korean Wave: National Identity in Question
East Asian Pop Culture. Ed. Chua Beng Huat and Koichi Iwabuchi Pp. 191-216.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在江佩蓉部分主要以本地韓國流行文化的消費行為為主要研究範疇，藉由閱聽人深度訪談方式，瞭解韓國流行文化行為是如何在本地實踐，以及本地社會論述間如何與之進行對話。研究中發現韓流相對於其他流行文化，遭遇更多反對聲浪，而這份反韓情緒除了展現在本地影視產業從業者身上外，更展現在韓國流行文化消費者自身，形成越消費越恐慌的情形。

劉伊倩則以研究台灣女性韓劇閱聽人為主題，然而在訪談過程中發現許多女性閱聽人表示，因身旁的男性討厭韓國令他們產生收視壓力。此一現象也反映到

了 2008 年陳姿伶的研究中，在針對台灣年輕男性韓劇閱聽人的訪談裡，作者發現韓流與台灣男性交會的過程中，具有「韓劇在台的陰性化」與「在地仇韓情結的陽剛化」兩項特質。

至於文本的討論上，楊芳枝以女性主義的觀點去檢視了近年來相關的雜誌、報紙與音樂歌曲趨勢，探究台灣為何在經濟位階、音樂文化場域上仇韓，然而對於戲劇方面不仇韓。文中認為經濟與文化上的韓國論述充滿男性權力痕跡，而無女性發聲位置；然而娛樂上的韓國論述則將女性物化、愚蠢化。

從上述論文整理可以發現，過往的相關研究多著重在閱聽人的分析上，從韓劇或是韓國流行文化為標的，從此出發去探究閱聽人的媒介使用行為與態度。在研究方法上以參與觀察與深度訪談為主，透過觀察閱聽人的線上社群發言歸納出收視習慣與特徵，再進一步地以深入訪談去了解這些韓國流行文化接收者的細部資料，最後再輔以國族歷史因素或性別論述證明並探究其反應的脈絡背景為何。

僅有的四篇論文中，只有楊芳枝以文本分析作為方法，將雜誌與台客文化音樂作為分析目標，探究台灣中產階級與中低階層男性對於韓國是採取怎樣的論述方式，對照女性在這些場域的禁聲與被愚蠢化，在提問方法上開闢了新的路徑，不過焦點偏向女性議題的闡述，也較為缺乏系統性的採樣分析。

研究結果歸納上，仇韓的認同部分，江佩蓉以台韓兩國的歷史脈絡為本，大量的引用台灣論及韓國的相關文本，表達出台灣對韓國的特殊情感，進而容易放大彼此的競爭狀況，然而在近年來文化創意產業的落後，使得韓國流行文化接收者呈現一種同時存在哈韓/恐韓/拒韓的矛盾心態。這種情形與柯裕棻（2009）及劉昌德（2010）針對仇韓情緒所提及的結構性因素與自主性焦慮有相當程度的契合。

仇韓者描述的部分，上述研究中較少著墨，其中只有陳姿伶以年輕男性閱聽人為調查對象，發現這個階層的族群具有仇韓特徵，其仇韓心態又與朱立熙所說的歷史歸因較無關係，其所重視的多為運動場上不公不義事件，不過，陳姿伶卻無法肯定其他年齡層的人是否也存有這樣的心態。

另外，在楊芳枝論文中，發現在台灣的中產階級閱讀的政經雜誌中，近年形

成一股將韓國做為假想敵的論述，而這樣的論述也影響了文化場域的思維，作者以台客搖滾作為代表，表示仇韓的論述有兩種位階不同的呈現方式，在布爾喬亞階級部份，強調經濟實力的努力超越，對於較低下的無產階級而言，陽剛性似乎成為唯一抵抗的手段，然而不變的是，兩者皆是以男性的角度論述，女性則被禁聲。相反的，女性在這波韓國論述中，再現於娛樂新聞當中，皆是以一種無腦、盲目追求流行的形象出現。

Kellner(2003)認為文化研究的理想策略應是採取多重觀點(multiperspective)進行研究，多重觀點包括三個面向：文化的政治經濟與生產、文本分析與批判、閱聽人接收分析與媒介使用等，儘管一般研究難以面面俱到，但以此作為研究審視標準卻可提供較完整面向對照。

總觀上述研究成果，筆者歸納先前的討論與文獻爬梳，將已知的仇韓研究以上述三個面向大致進行檢視，發現在仇韓議題的研究上，較欠缺源頭的檢視，多以閱聽人的接收分析為主，表示仇韓的情緒呈現一種男性的、陽剛的，而仇韓者以年輕男性為主力，其仇視說法往往來自於運動場上不公事件，再輔以過去的國際外交衝突與經濟競爭。

至於在文本的分析批判以及政經環境產制上較無著墨，僅知論述具有陽剛化特徵，其論述的歸因可能來自於長久以來的經濟男性霸權，使得女性在仇韓被消音。但對於媒體的操作動機與呈現歷程變化並沒有進一步的討論。

以上研究成果提供了筆者對於仇韓議題的研究想像與基礎，但如以 Kellner 的研究面向參考似乎還缺了一角。筆者以為，上述研究對於仇韓者的記憶來源依據與被影響進程似乎尚未提及，換句話說，這些仇韓情緒是怎麼累積與發酵的？為什麼台灣媒體的仇韓論述何以對台灣民眾具有說服力與吸引力？其中的論述有產生變化嗎？而媒體中的仇韓論述是為誰所建構？為誰所覆誦？為誰所接受？進而形成台灣不同於其他國家看待韓國的角度？這些都是可再努力的方向。

第三節 問題發想與研究目的

一、問題發想

由先前討論可知關於仇韓情緒的剖析，仍有相當大的研究空間。筆者認為，仇韓情緒的出現，除了歷史的政經環境因素外，媒體的成熟與商業思維的操作手法也可能是要因之一，是以探討媒體產製端的結構性分析會較為根本，畢竟媒體是影響閱聽人接收與再製文本的重要來源，也是關鍵的國族想像中介來源。

此外，韓國文字對於台灣人的高隔閡性，使得消息來源較為限制，媒體容易操作與框架；仇韓的情緒並非是短暫且隨機的出現，似乎有著一定的時間規律性及場域特性（運動場），且在閱聽人的討論上仍以新聞文本為源頭，如此一來探討新聞文本的產製呈現與媒體操作環境的歷程性，便顯得更為重要，也較能追本溯源，理解為何仇韓論述對於國人具有吸引力及影響性。

另一方面，大眾集體記憶的建構與媒體文本雖有因果關係，然而兩者有其不同的生產脈絡，因此在大眾的集體記憶論述建構與媒體文本的產製特徵是否有什麼異同？加入這些比較，對於解構國人的仇韓情緒也能有不同角度的切入點。

綜合上述，筆者做出下列的思考方向：

- （一）媒體文本如何呈現運動場域中與韓國的衝突事件
- （二）媒體與大眾所建構的仇韓集體記憶文本間是否呈現論述差異

二、研究目的

近年來台灣人的仇韓情緒或隱或現的持續高漲，呈現一種以偏概全的不理性、激情，綜觀這些情緒的爆發點，幾乎是隨著媒體報導聞雞起舞，進而形成一系列的仇韓情緒、論述生成迴圈如下：

ㅂ궡궡!（韓文，音同皮摳背，意即可恥！卑鄙！）日來謊話連篇的南韓籍世界跆拳道總會秘書長梁振錫昨厚顏第三度舉行記者會，他雖然首

度承認楊淑君腳跟的感應貼片在比賽前就取下，但仍傲慢栽贓楊意圖作弊。¹⁹

南韓又要耍奧步！，據傳下屆亞運主辦城市南韓仁川，已決定撤掉這項沒有奪牌優勢的競賽，如此也將嚴重威脅台灣奪牌機會。²⁰

媒體報導，楊淑君失格事件，引起國人憤怒，除網友們最近發起拒吃韓國商品外，台中縣豐原市一家電器業者，今天怒砸南韓製的電腦螢幕，並發起拒賣韓貨、拒到韓國旅遊的行動；據悉，該業者目前已退給廠商 2 萬多元的韓國製電腦周邊產品。²¹

本文便希望能從過往的新聞報導中，了解韓國形象在台灣社會中的轉變歷程，是否呈現某些刻意操作的痕跡，並探究這些重要因素如何影響了仇韓情緒的生成；同時藉由框架分析資料與新聞產製者訪談對照，了解媒體產製過程對於仇韓論述生成的相關性。此外，也希望從現今大眾所建構的仇韓集體記憶論述作為分析對象，從另一面了解仇韓情緒如何在民間發酵。

因而，本研究希望藉由不同的角度觀照韓國形象的變化與特徵，剖析台灣人的仇韓情緒，一方面從運動新聞文本的產製過程回顧，追本溯源了解仇韓論述的一路變化與特徵；另一方面比較大眾與媒體間的集體記憶論述建構，凸顯媒體產業商業化的生產本質。希望藉由研究發現，讓國人正視仇韓情緒的產生原因，並且突破虛幻的國族情緒發洩，從而自省如何能以其他的破口，彌補長期以來恐韓、拒韓的心理，不被媒體搖動的國族新聞大旗所利誘、為之吶喊，進而掉入為人作嫁的閱聽人商品陷阱；反之，才能較持平地看待台韓兩國之間交流，從而互相學習、截長補短，化作台灣更正面成長力量。

¹⁹ 〈高麗騙子 3 天 3 改口 終承認楊淑君賽前已取下感應片〉 2010-11-20/蘋果日報/頭條要聞

²⁰ 〈韓又要陰 取消撞球阻我奪牌〉 2010-11-20/蘋果日報/頭條要聞

²¹ 〈力挺楊淑君 台中業者怒砸韓製螢幕〉 2010-11-20/自由時報/社會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根據先前的討論中，筆者歸納出仇韓情緒的幾個研究關鍵字：他者、運動、記憶、媒體框架、新聞商品，每個關鍵字彼此影響與扣連，拼湊出國人心中潛藏仇韓情緒。故本部分的文獻將分做三個小節討論，其中第一部分以仇韓意識做為基底，由運動與國族主義之間的關係進行討論，探討為什麼運動場上容易激發敵人或是他者產生，從而增進國家認同感。

第二部分則進入文本產製的過程，此部分將前述的國族他者討論延伸至新聞媒體的影響，探討新聞框架對於形象塑造的重要性，以及傳播與集體記憶建構之間的關係，研究重點在於文本如何透過框架化機制來建構新聞，以及新聞文本、與大眾集體記憶間的關係。

第三部分延續新聞框架的產製方式，由文本、個人與組織三方面探究新聞框架的影響要素，此外，也由媒體產業的商業性質切入，進一步探討媒體為了符合持續經營的利益，如何影響新聞呈現與產製方向或去尋找符合利益的議題發展成為新聞商品。

最後小結上述三部分，推論仇韓情緒因國族意識的力量，成為一個好的標的物，再加以商業化的包裝，化作易操弄的商品，而這種商品同時也可能影響了大眾的集體記憶與國族感受。

第一節 想像的他者：認同、運動與國族

一、運動與國族認同

「天空藍的 T 恤就是國家存在的明證：烏拉圭 (Uruguay) 的存在並非是個錯誤。足球將這個默默無聞的小國重新推上世界的舞台。」（引自黃東治、邱金松譯，2008：155）

烏拉圭足球隊的例子體現了當代運動與民族國家的形成之間的密切關係。Maguire & Jarvie and Mansfield and Bradley (2002/2008: 175-176) 等人便認為，當代運動的發展和國族主義、國家狀態 (nationhood)、國族意識 (national consciousness) 等概念結合為一體，運動已成為了整合社會以及國家認同與建構

的催化劑。由於運動有著明顯的對抗性質，因此當運動員佇立在國際運動場上，便讓人極易聯想到國與國之間的對抗，如同 Hobsbawm（1990）認為一支 11 人制的足球隊使數百萬國民讓所享的國家認同感更為真實，關鍵就在於想像。

想像讓眾人成為共同體，國家或民族都可以是想像出來的，Hobsbawm 很早便強調了這個概念：「民族主義早於民族的建立。並不是民族創造了國家和民族主義，而是國家和民族主義創造了民族（Hobsbawm, 1990；李金梅譯，1997：14）。」因此，想像共同體的建立可說與現代性緊密相連，世俗化的理性主義、日曆化的時間感知、以資本主義驅使的科技發展、識字率提升與大眾傳播的興起，這些現代性的特徵，都成為了當代國族主義無可欠缺的要素（Tomlinson, 1991: 83，引自陳子軒，2007）。

文化研究學者 Barker 在談到「國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也提到，國族認同便是一種集體的組織後認同，並非天然生成的現象，而是在許多偶發性的歷史事件中構成。而民族國家則屬於政治上的抽象概念，其意即是一擁有主權的行政機器隸屬於特定空間或疆域。而國族認同則能讓人們以民族國家的符號及論述作為同一化想像對象（羅世宏等譯，2004：236）。

這種強調歷史所積累的族群認同和文化認同，便是民族意識的關鍵所在（郭洪妃，1997: 50）。因為民族被想像成一個「共同體」，這樣的特質也傳達了某種平等的同胞手足之情。儘管每一個民族實際上永遠有其內部的宰制與剝削結構，但是這些現實卻不妨礙民族被想像成一種同性質的人群集合（游任濱，2002：44）。

在運動場上，其本質便是在於競爭，也因此容易產生衝突性，進而勾起相對歸屬感，觀賞者各自為屬於自己的一方吶喊助陣，形塑出我族與他者異同的民族情緒（Rowe, D., McKay, J. and Miller, T., 1998:124）。然而民族主義作為國族認同展現的最高層次，其看似單純的相對建構，但本質實是虛構的產物，如同 Gellner（1994:62）所言：「民族主義並非是在自我意識中將民族概念喚起，而是在民族不存在之處的一個發明。」

運動場上的衝突往往成為這發明的催化劑，因為有了衝突，歸屬的相對感便自然地在集體記憶中存在逐漸發酵，從而創造民族主義中兩個重要因素：共同的

歷史感與命運。而運動場上的各個國族符號，如運動員球衣上的國旗和顏色，抑或是賽前或頒獎儀式中的國歌演奏都成為這「想像共同體」的觸發點（陳子軒，2007）。

Geertz（1973:444）著名的峇里島鬥雞田野研究中，認為觀賞鬥雞象徵了階級之間衝突緊張，觀賞者在看鬥雞比賽的過程中，便是一種自我的戰爭模擬，將內心經驗與現實結合，也讓比賽更具有觀賞張力的吸引性，從而提供了情緒發洩管道，也鞏固群體的集體意識。如將鬥雞擴大類推至現今的觀賞運動，便可發現有異曲同工之妙，只是現代的觀賞運動透過大眾媒體的傳播，使其不再是一個狹隘地域的經驗，而是一種使人崇拜與充滿魅力的群體情誼（Appadurai, 1996）。是以，國族意識與運動之間的結合力量，不僅僅在於運動參與者本身，也因具觀賞價值，而擴散到觀賞者身上，例如近年來的許多台灣之光如王建民、曾雅妮、或跆拳道上的楊淑君，都只是運動場上的一員，但是透過大眾媒體的傳播包裝，其國族感染力，卻可以透過螢幕感染上萬甚至百萬人。

正因為運動與國族主義的關係是如此的密不可分，如同水幫魚、魚幫水，統治者往往藉由運動來凝聚國族認同，達到國族的彰顯與榮耀目的，如希特便勒透過柏林奧運宣傳亞歷安民族的優越、墨索里尼則掌握足球賽事，與其法西斯政權相輔相成，在台灣，紅葉、金龍少棒的風靡一時，則讓七零年代風雨飄搖的國民黨政權度過在國際外交上潰敗的黑暗期，順利轉移了國人的注意力（陳子軒，2007）。

從上述可以了解，運動具有對社會與國家進行統合的潛力，也因此常被拿來與國族主義作結合，其發展大致會呈現幾個特徵如下：

運動具有某些與生俱來的特質，使它具有成為國家統一和團結工具的可能性，進而鞏固官方或核心的國族意識。

1. 運動提供了一種弱小民族與國家情緒能量宣泄的安全途徑或是出口。
2. 運動有助於形成某些獨特的政治鬥爭，一些國族主義的政治以及群眾的國族主義鬥爭，都與運動密切地連結在一起。
3. 在國族主義的運作過程中，運動通常會涉入其中，並成為其對國族主義不平等關係與依賴性的自然反應。

4. 運動有助於去探索認同，無論是在地區或全國的層次上，都可以透過懷舊之情、神話、傳統的創造、旗幟、國歌和慶典儀式等方式達到追求認同的目的（Maguire et al., 2002/2008: 175-176）。

另外，儘管至今全球化的浪潮影響了當代民族國家的認同意識，但運動與國族的關係並未因為民族國家主權的衰退而減弱，相反的，為了因應新時代中政治、經濟與軍事主權旁落的問題，運動場中國族認同的維護反而出現得更加積極（Javie, 2003 ; Rowe et al, 1998 ; 轉引自劉昌德，2006）。而傳統的運動國族認同便是一種區分「他／我」的「畫邊界」過程與結果（Klein, 1997: 9-11）。

是以在畫邊界的區別中，便是尋找敵人的過程，如同台韓之間的因在政治、經濟上的位階競爭，使得雙方在運動場上更顯得劍拔弩張，運動也因其獨特的特性，成為當代社會認同建立相對重要的載具。

二. 認同的來源—他者的找尋

前人的經驗提醒，當在談論國族議題我們必須去思考的重要問題，即是回答「我」是誰？因為在尋求如此認同建構的過程的同時，便會發現「他」者區分的重要性無可避免。而運動的特質，恰好符合這種國族認同的特質，也就是有明顯的「你」、「我」之分（Horne, Tomlinson, & Whannel, 1999: 178）。也說明了為什麼仇韓的衝突論述多發生在運動場域。

Cohen（1985:63）認為，認同符號建構最顯著的特徵即是相對角色的建立，「排除」（exclusion）與「包納」（inclusion）的過程，同樣具備重要的分量。然而劃分他者與我族之間的界線是相對且動態的，各種層次的認同——從國族、區域、社區乃至人際關係——皆是如此，群體意象中，除非一個「他」和「他類」的意象也被建立，否則「我」和「我族」是不完整的（Keller, 2003；轉引自陳子軒，2007）。

江宜樺（1998）對認同的定義，即個體確認自己在時間空間上的存在。也就是主體性之存在必須透過其他主體對自己的承諾與肯定，因此每個主體與其他主體都必然發生一種「互為主體性」的現象。從人類的發展史上可得知，認同是各種權力團體透過制度性力量（如政治、經濟與傳播媒體等）作為強大團體利益、排除他者的重要依據（郭良文，2002）。如將國家視為政治上的巨大團體，要增

進利益，認同上的一致性不可言喻，Schmitt 便認為如要達到政治上的統一性，便得去「決斷敵人」(deciding enemy)，也就是存在去區分他者的過程。

Schmitt 的思想可從下述的這段話可作為初步的說明：

「敵人是我們自己的作為形象的問題。如果自己的形象是清楚確定的，哪來的敵人呢？敵人並不是某種出於某一理由必須排除和因其非價值而必須消滅的東西。敵人處於我自己的層面。基於這一理由，為了要爭得自己的範圍、界線、形象，我必須以鬥爭方式與敵人清楚區別開來。」

(Schmitt, 2003: 429；引自鄭祖邦，2009)

所以，在 Schmitt 的概念中，如果要呈現自我的形象，那麼便需要先去區別他者，也就是去尋找敵人，而敵人（他者）形象的建構也就是對自我認識的一種方式。換句話說，證明自我的存在價值，首先會出現的自然反應便是找出他者。

一直以來，台灣常以「亞細亞的孤兒」作為自己的近代民族史寓言，努力希望獲取國際認可，然而這種認可確建立在流動的自我認同上，必須藉由他者的形象不斷的定義自己；如果將台韓兩國的競爭情況納入 Schmitt 的思考情境，那麼台灣人自然有可能會將韓國視作敵人，從而鞏固與釐清自我定位以建立國族意識。

此外，「戰爭」與「敵人」這兩個概念對 Schmitt 而言具有相互的指涉性，原因之一在於，戰爭起源於敵對性，而敵對性就是對另一存在的生存否定 (Schmitt, 1932；劉宗坤譯，2004: 107)。是故仇韓情緒或可視作戰爭的某種形式，只是透過文字、語言等論述方式進行對他者的價值否定。

如同 Hall 在其認同政治 (identification politics) 的概念中指出，認同即是由「論述」所建構出來，這些論述透過特定且具體的策略在特定的歷史與制度中所產生，因此相較於認同傳統上被視為一自然建構的實體而言，它實是為了製造差異與排除異己的產物 (Hall, 1966: 5)。換句話說，認同不會憑空出現，他們是被創造出來的，因此去「進行認同」彷彿就是去找尋敵人的過程，正如國族想像，其國家認同的意義也是被塑造出來，是不折不扣的人工產物，依 Hobsbawm (1983/2002) 的說法，便是一個所創造出來的傳統 (created traditions)。

綜上而言，他者之所以產生，也就是從我的角度去揣摩心中的敵對對象，而

國族認同的意義在於統一我的存在，必然強烈需要一個他的出現，有了他才能清楚讓團結目的性存在。因此找出他者，即是主觀意識的操作，整合原先的多重想像，如同在複雜的世界中為了生活獲得清楚的生存方向，人們勢必會去簡化許多事物，尤其是當該者距離自己的日常生活越遠，越容易使得刻板印象產生，成為框架化的源頭。

第二節 框架、形象與集體記憶

Eric Hobsbawm (1983/2002) 在其《被發明的傳統》一書中明確指出，生活中許多整套的行事過程，通常由外顯或默示且為人接受的規則所支配，其本質往往是儀式性與象徵性的，這些傳統藉重覆再三的價值觀與行為規範灌輸於大眾心目之中，而這些價值規與行為規範往往又自動扣連著過去，進而建立一種連續性，讓人以為理所當然。

從這個角度來看國內的仇韓情緒，似乎即符合 Hobsbawm 創制傳統的概念。對韓國有負面印象的民眾，往往皆能指證歷歷其前科累累，從而認定韓國形象便是如此，而塑造這股仇韓傳統的論證來源之一便是新聞文本，新聞的框架營造出對韓國的特殊形象，每次框架化的結果累積，逐漸成為了 Halbwachs (1992) 所說的集體記憶。

一、決定你該看甚麼—框架的影響

對於框架研究貢獻極大的社會學者 Goffman 於 1974 年出版《框架分析》(Frame Analysis) 一書中說明「框架」一詞，是指有組織性地在背後去主導社會事件以及人們對於事件的主觀涉入，它是由許多片段 (strip) 所構成，也就是事件進行過程中的任意細節 (Goffman, 1974: 10-11)。換句話說，世界事太多太複雜，因此人們傾向透過了框架呈現的真實，才有辦法去協商和理解真實，並且決定自己如何去儲存對真實的記憶。

然而最早提出框架一詞的是人類學家 Bateson，在 Bateson 的定義中，「框架」代表了個人組織事件的心理原則與主觀過程，是「成組的訊息或是具有意義的行動」，並認為主體有時可以藉著有意識的語文指涉來瞭解框架，但大多數時候框架無法明顯指認，也難以察覺 (Tankard et al., 1991；羅世宏，1994)。

框架如同 Goffman 所認為的闡釋基模 (schemata of interpretation)，是人們定義情境的一種組織原則，這種原則讓個人對外在世界所發生的一切產生確定、感覺與認同 (林建利，2007)。也就是說當我們對某些事物產生定見時，並非是自己原先意識所生成的，而是受到了許多情境累積下來的感覺與論述所影響，這些框架成為了我們去思考、判定闡釋的脈絡。

二、形象與框架累積

(一) 形象的概念

形象一詞最早出現在心理學中，表示一種態度 (attitude) 或是心理的畫像 (mental representation) (張敏華，2005)。而後 Boulding 在其所撰的《形象》一書中，表示形象是人類對於外在事物的主觀知識，也就是人在一生中會不斷透過感官感知外界給予的訊息，所以對於外在的一切事物能夠保持著某種程度的認知，認知將隨著訊息的更新也會產生變化，使得形象的來源具有變動性 (Boulding, 1969)。

故 Lippmann (1922) 認為，對人們而言，這個世界有太多繁複及細微的事物是我們無法親身體驗，為因應外在環境的變化，我們必須建構一個易於處理且可簡化事物的模型，這個模型就是所謂的刻板印象。

由於形象是一種簡化的主觀認知，人們重視高效率，忽略低效率的結果，以致形象或刻板印象是否傳能達正確的訊息一直是學者關注的焦點 (簡琬璧，2002)。Lippmann (1922) 也指出，大部分的時候，我們是先下定義，再做觀察。我們的觀察也會盡量符合既有的定義，也就是我們還是會用既有的刻板印象來觀察新事物。從框架的角度來看，刻板印象便是框架的累積效果，這樣解釋也讓筆者反思韓國負面形象的產生，與新聞框架之間的關聯性。

(二) 框架的累積效果

從基模的角度繼續討論，Gerhrels & Rucht (1992) 認為框架是人們解釋外在真實世界的心理基模 (schema)，用來做為瞭解、指認以及界定行事經驗的基礎。鍾蔚文 (1992) 也指出新聞的觀看對閱聽人來說是一種知覺的重建過程，個人的先前知識來決定了他的重建結果；而框架則是強調的是資訊處理時的選擇、排除、重組等的過程與所形成的詮釋結果中的侷限或角度。因此，框架可被視為

一個意識形態的的組織過程，在概念上可能是由具體到抽象的思考，或是由抽象至具體的操作手法，人們或組織藉由語言、文字的選擇與重組機制，表達對於事物或事件的重視程度，進而逐漸累積成唯特殊的價值觀，也因此人們往往經由框架來組織社會事件，成為其了解與詮釋世界的基礎（臧國仁，1999）。

框架的特性在於排除性（exclusive）以及含括性（inclusive），也就是框架能夠去選擇含括或是省略哪些訊息或事實應該出現，進而改變事件的意義，甚至透過虛構將事件本身變形（羅世宏，1994）。

媒體建構新聞框架的過程，就是一種框架化的過程。框架（frame）是一較具體的符碼呈現，有賴於特定的機制運作，而其中機制的運作過程就是所謂的「框架化」（framing）。臧國仁（1999）認為框架這個概念既是動詞，也是名詞。「框架化」定義為不同真實之間的轉換（或再現）過程，是「框架化」（動詞）真實的歷程，而其後所形成的產物就成了真實的「框架」（名詞）。

Gitlin（1980: 26）長期觀察媒體報導美國八〇年代民主社會學生組織（SDS）的社會運動，結果發現媒體以霸權的觀點，使用瑣碎化（trivialization）、極端化（polarization）、邊緣化（marginalization）、貶抑運動影響力（disparagement of the movement's effectiveness）、強調內部歧見（emphasis on internal dissention）、低估遊行人數（disparagement）等六種框架化的設計。一方面對於學生運動呈現負面的報導，另一方面也侷限了社會真實。透過這些例子可以發現，許多形象的再現，都是藉由框架的不斷累積而成，逐漸的便成人們心中的既定印象，讓社會事件或議題定調。

這樣的情形與學者 Hobsbawm（1983/2002）提出「創制的傳統」（invented tradition）的概念頗為相似，因為某些政治與經濟因素，以致於在生活當中衍生或刻意創制出不少「新的」傳統。而創制「傳統」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出自人為刻意創造、建構而成；另一種則是在短時間內（或許三、五年、或許更短）無形中成形。

這些創制的「傳統」，通常即是一系列的實踐，透過不斷重複，用公開或是看似心照不宣的規定呈現，並且帶有儀式性、象徵性的本質。「傳統」也透過這樣的實踐，試圖灌輸大眾特定的價值觀與行為規範，讓這樣創制而生的傳統，能夠自然而然地與過去的事物相連結。

從傳統的創制特徵來看仇韓情緒，似乎可以發現仇韓便是一種被創制的仇恨，人們可以很自然且輕易指出韓國的負面形象從何而來，筆者認為會造成這樣的傳統誕生，即來自於媒體不斷的框架化累積讓國人逐漸形成了仇韓的集體記憶。

三、集體記憶、媒體與大眾

集體記憶研究先驅者 Halbwachs 認為：社會記憶或集體記憶是一種集體社會行為，現實的社會組織或群體（如家庭、家族、國家、民族、或一個公司、機關）都有其對應的集體記憶。我們的許多社會活動，經常是為了強調某些集體記憶，以強化某一群人組合的凝聚（引自王明珂，2001：46）。

集體記憶的形成，同時也是個動態的過程，藉由社會脈絡、媒體力量交織形成的（Wertsch, 2002）。集體記憶便是一種「對於過往的導覽」（orientation to the past），讓國族的成員得以藉由重溫集體記憶—不論是對於自身或是他者的集體記憶—強化認同（Le, 2006）。然而這種建構往往會屈就認同的一致性，或因政治權力的威權脅迫，使得其在真實性與正確性上存有疑義（Zelizer, 1998: 3）。

Schwartz 在其有關美國總統林肯的長期研究中發現，林肯在現代的偉大程度是被建構出來，表示集體記憶實為一種文化系統（culture system），集體記憶的創制反映了社會或大多數人的需要、問題、恐懼、心理狀態與期望，記憶因此成為如語言般的表達象徵，連結了當下的各種局勢（Schwartz, 1996: 910）；換句話說，集體記憶則呈現了社會經驗，結合社會中普遍的價值觀與感受，成為情感和道德認知上的載具。

在與媒體的關聯上，Zelizer（1995）表示記者常以「說故事者」的權威角色來建構集體記憶，並且認為集體記憶需要藉由具物質基礎提醒大眾，因此它不止存在人們的腦海中，同時也於各式論述、日記、紀念碑、儀式、服裝、博物館、大眾媒介報導中具體存在。記者會以多種方式引用往事，包括：對紀念日報導、類比式的歷史報導（即以歷史事件為例，分析事件情境並做預測）、脈絡式的歷史報導（藉由追溯歷史軌跡來解釋為何產生現今情勢）（Edy, 1999；引自翁秀琪，2000）。

Parisi（1995）更表示，所謂真實，實是種符號的建構活動，世界並非由物

質所組成，而是語言意義的組合，新聞與其他符號行動如儀式，戲劇，敘事等等，均是創建社會意義的重要機構。易言之，在所有語言或其他中介結構中，新聞媒體扮演了轉換社會真實為符號意義的核心角色（臧國仁，1999）。

另一方面，Hobsbawm（1990/1997）提到「民族愛國情操」這種平日與大眾距離甚遠的意識形態，之所以會在十九、二十世紀短時間竄起成為政壇上的強力概念工具，可能來自於大眾心目中的民族主義原型，這種原型有兩種，其一是超地域的普遍認同；其次，則是少數特定團體的政治關係與辭彙。前者雖看似以地域為基礎，然則是以世居地的想像作為認同感，例如過去的猶太人與耶路撒冷；後者則是這些團體與政治、國家體制具有緊密關係，使得其具有普遍化、延展化和群眾化的能力，例如日耳曼人與今日的德語使用情形。

換句話說，這些民族主義原型構成了基本的集體認同情感，然而並沒有或還沒有以特定領土的國家政治組織建立具體的「必然」關係，會形成這種必然關係，乃是之後的官方為了中央統治的需求，開始塑造彼此的緊密扣連性。

化作本文脈絡，仇韓的集體情緒也應該並非由單一的面向所建構，其中媒體如前述所討論成為重要的中介來源，然而此一集體情緒原型仍來自於大眾所組成的社會經驗，兩者關係如同近代民族主義的形成，逐漸形成一種必然，只是原先的官方 VS. 民眾角色，由媒體 VS. 大眾這一組概念所替換。

換言之，媒體提供了集體記憶的重要來源，然而其塑造的過程很可能會受到媒體資本、國家威權或認同壓力等政治經濟面向的影響，使得集體記憶容易產生偏差。而記者所建構集體記憶報導，儘管藉由描述往事能讓不同的世代增進對現況的瞭解，但時常的狀況是，記者只把集體記憶作為分析與誇大的工具，缺少了維護與建構集體記憶的面向（翁秀琪，2000）。

因此，媒體儘管是集體記憶的建構與維持的重要來源，但仍舊受到許多因素影響，如將仇韓的集體記憶看做某種民族認同的具體行為，那麼媒體仇韓的論述便有可能如同 Hobsbawm（1990/1997）對於民族主義產生的見解一般，儘管有其脈絡生成背景，但仍有刻意操作的軌跡出現。

第三節 新聞框架的產製過程

Anderson (1999: 86) 認為促成共同體的想像是一種爆炸性的相互作用，其關鍵要素在於資本主義（生產體系與生產關係）、印刷科技（傳播科技）以及人類語言宿命的多樣性，這三者讓現代民族的登場預先搭好舞台。在 Anderson 的概念中，資本主義推動了後兩者的發展與整合，讓語言隨著印刷品的銷售動機逐漸形成固定性格（fixity），進而形塑出「主觀的民族理念」，得以讓數十萬甚至數百萬計的人們知曉並想像他們屬於這個特殊語言的場域。

這樣的觀念說明了傳播科技成為民族想像共同體的關鍵中介原因，另一方面似乎也可以去預想印刷資本主義發展的成果為何，即媒體成為重要的想像來源，擁有無可取代的影響，也突顯了媒體的本身的趨利性與新聞產製背後的人為與複雜過程。

一、新聞框架產製

本文的研究焦點之一在於了解媒體仇韓的框架產製受到哪些因素影響，進而如何與觀者產生互動。Entman (1993) 便認為，框架至少存在於傳播者、文本、接收者和社會文化中；Woo 也有同樣的看法，他認為框架概念強調的新聞媒體之呈現內容並非固定實體（fixed entity），而是文本製作者、接收者、與文本三者之間的互動且受到社會情境影響的結果，也就是說一種新聞框架的產生過程牽扯到了組織產製、個人接收以及文本自身三方面的交互影響（引自臧國仁，1999:113）。以下分別述之。

（一）文本框架

Gamson (1989) 認為框架是一組具有組織性的中心思想，可使相關事件突顯意義，並引導我們何者才是議題所在，也因此 Gamson 將新聞視為是一種說故事的過程，而非新聞事件的呈現，且一則新聞同時有許多框架在競爭，並有不同的重組方式。

Pan & Kosicki 認為新聞文本並無客觀意義，而是新聞工作者組合一些符號設計（symbolic devices），與讀者個人記憶及意義建構行為互動後的產物。這些符號設計包括句法結構（syntactic structure）、情節結構（script structure）、主題

結構 (thematic structure)、修辭結構 (rhetoric structure) 等，透過這些設計，新聞文本達成了組織事件或事實的再現功能 (引自臧國仁，1999: 139)。

新聞文本框架就是「將故事整理為一體 (coherent whole) 的中心意旨」，而此一「整理過程」乃藉由選用 (或排除) 以及強調 (或忽略) 語言結構與字詞達成 (臧國仁，1999: 143)。Rhee (1995) 便認為新聞框架表現在新聞故事的主軸中，經常以不同方式凸顯，當中包含前述 Gamson 所提出之說故事過程；此外，新聞工作者的知識背景與經驗，也會經由產製者的「詮釋基模 (interpretative schemata)」重組，從而創造不同的新聞框架。最後，在不同的社會與時空情境 (social and contextual frames) 下所產製的新聞故事，更會同時影響新聞言說的呈現以及讀者對於新聞故事的詮釋能力。

換言之，文本論述並非中立，新聞從業人員在字裡行間所選擇的特定句法與詞彙，都代表了媒體、記者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是如何認知該社會事件，同時進一步也框限了讀者對新聞的理解面向。也因此將文本作為分析對象，某種程度上可以反映的記者個人以及組織框架的影響程度。

(二) 個人框架

在前面一節關於框架的討論中已知，個人了解框架的方式來自於過去對世界了解的心理基模，如同新聞框架是「個人」選擇、詮釋、強調或組織外界事務的心理結構 (臧國仁，1999)。不過另外須考量的部分是「個人」可以為新聞記者，也可以是閱聽人自己本身。因為訊息的接收來自傳遞與接受兩端，所以在新聞文本的產製過程中，記者用自己的框架去建構新聞，但同樣的，閱聽人也會依個人的認知框架去接收新聞。

Stocking & Cross 分析新聞產製過程發現，新聞記者在選擇事件、選擇導言、或選擇報導角度時，都以慣用的思考方式來進行，只要是與原有思考模式不同的角度，記者就會不加重視甚至予以排除 (臧國仁，1999)。國內研究也有相似的結果，章倩萍 (1994) 研究新聞記者的認知策略，便發現記者在採訪報導新聞時，會以基模作為認知新聞事件及人物的基礎，主動的詮釋外來資訊的意義。

探究個人框架的產生，原因可能來自於社會現象過於複雜，因此人們常會運用一些簡化機制來組織生活經驗，即 Lippmann (1922) 在《民意》(Public opinion)

一書中所提的「刻板印象」，就是一種「簡化型態」(oversimplified pattern)，用以協助人們獲得有關世界的意義。

這樣的情形如同 Fridriksson (1995) 將新聞視為故事，他認為每則新聞故事都承載了不同訊息，而訊息內容只是記者個人專注或將焦點集中在議題某一部份的結果。換言之，新聞其實是記者或編輯的個人框架在選擇社會事件的部份真實與排除其他部份真實後的呈現。

基模理論強調我們對於事實的主動建構，是因為人們對於事件的認知，基本上會有強烈的主觀傾向(鍾蔚文，1992)。Chung & Tsang (1993) 進一步指出新聞採訪工作，實是目標或假設導向(hypothesis-oriented)的歷程，這樣的歷程是個人框架的軌跡呈現；他們在研究中指出，新聞事件的本身並非記者所採訪出來，而是記者不斷「驗證」事先所蒐集的資訊，或是去對應消息來源訪談的結果是否與原先目標或假設吻合。但另一方面，其所報導的新聞符號真實雖然可能與原初事實無所對應，在大多數情況下甚至有所出入，但由於新聞工作者本就是社會人，其報導之新聞不能與社會大眾的共有經驗(社會真實)相去甚遠，兩者必須有某種程度之社會共識(臧國仁，1999)。

也就是說當看到韓國相關的報導時，記者個人為了將事件表達清楚，可能會依照過去的事件印象，引用不同背景資料，並依照當時的時空環境選擇某部分的真實進行基模重組，使得同一事件出現不同的敘事內容，產生一定的意識形態，而這樣的個人框架進而影響了對於事件本身的認知。

(三) 組織框架

在個人框架的討論中強調的是長期以來的框架累積可能會讓記者本身選擇某部分的真實去做報導，使得這樣的報導可以為自己的假設所接受，並且符合當時的時空背景。但記者身為媒體組織的一員，有著僱傭的不平等關係，仿若中古時期的封建采邑的庇護與效忠，使得記者無法脫離組織，也讓其身分同時必須與企業員工之間的認同相互流動(張文強，2009)。這樣的特徵讓記者深受組織影響。

Bantz (1990) 指出，新聞媒介組織內部經常面臨不同價值觀的對抗，如新聞專業與企業利潤的衝突，或專業與娛樂風格如何調和取捨，這種內部意識形態

之爭固然屬組織常態，長久下來，將會影響新聞工作者的自主權，造成新聞人員在進行報導時面臨應配合企業文化還是完成媒體工作目標的困擾。

新聞組織內部也會為了使新聞工作順利進行所制定的慣例與程序，這些規則通常會去限制議題的新聞性，如決定哪些人屬於新聞人物、哪些消息來源是值得採訪的，從而對議題產生不同的報導面向，具體的規則如「記者採訪路線」、「新聞寫作規範」等（林建利，2007；張敏華，2005）。

再者，「新聞室控制」也是媒體框架社會真實的重要因素。如同國內學者所調的「內部控制」，指的便是「新聞編採人員的工作環境，如何影響新聞成品的內容」（鄭瑞城、羅文輝，1988: 118）。當中有些新聞媒體會透過具體的編輯手冊明示報社的風格與立場，有些則必須靠記者自行去學習摸索組織中隱晦不明的立場。

此外，媒體組織往往也可以透過人事、理念、監控以及獎懲等方式，來維繫組織的政策（陳順孝，2003）。這些情境使得個人框架與組織框架產生衝突時，在新聞義理與組織政策走向間不得不去進行取捨，延續自己的職業生涯。如同張文強（2009）所說，在組織內部工作的新聞工作者，除了需要處理新聞工作的自主權與能動性問題外，還得面對新聞專業與組織利益碰撞後，更為深層的工作意義與自我認同衝突。

因此，從前述討論可以知曉，一則新聞就是一種選擇與組合的結果，如同臧國仁（1998）所歸納，媒介觀察事物的方式，也就是框架的表現。這種選擇與組合的基礎，部份來自記者的個人心理狀態或經驗，有時肇因於新聞組織所設定之常規與偏向，以致某些事件能受到青睞而成為新聞，使得另些事件真實僅有部份被呈現，其他的部分真實則可能因與媒體組織框架不合而遭棄置、忽略。

二、媒體組織與新聞商品特性

新聞框架的生成除展現在文本上，與個人與組織框架更密不可分，而在當中記者本身的個人框架往往會受到新聞室控制影響，使得最後新聞文本偏向媒體內部生產規則。因此，如要檢視媒體是否對於運動場域中的新聞文本有刻意操作之痕跡，可發現儘管有著不同的框架存在其間，但仍深受新聞商品生產特性與媒體組織影響。

（一）新聞文本與組織獲利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媒體本質即在於獲利，如同製造各種產品，為了考量其所付出的財貨成本，因此在市場中的行為必須符合理性要求，才有可能因製造產品獲取利潤（Picard, 1989；馮建三譯，1994: 89）。其中最基本的規則，便是將原料轉化成為輸出產品並獲得利潤。而產品供應（product supply）中的財貨或勞務則又受到產品的生產成本、獲利能力所左右。畢竟，生產者總是會希望以最低成本，產出最多商品以獲取最高額的報酬（Picard, 1989；馮建三譯，1994: 97）。

商品有許多種面向，可以源自許多不同的社會需要，商品的使用價值不限於為生活需要的滿足，許多使用價值更是由社會所建構。Mosco 便指出，各種使用價值具有多重決定性並相互構成，一邊是社會建構的使用價值，另一邊是起自特定社會安排的價值，也就是受到市場機能影響而產生的交換價值。（Mosco, 1996；馮建三、程宗明譯，1998: 208-209）。換句話說，生產者的選擇將會來自於市場反應，一旦生產者感知市場需求，便會產製符合的商品。

因此，新聞商品產售指的即是使用價值轉換成交換價值的過程，決定價值的標準，由產品所能服務的個人與社會之需要，轉換到由市場所能帶來的結果（Mosco, 1996；馮建三、程宗明譯，1998: 212）。易言之，商品的價值唯有在市場中才能被展現，媒體不僅具有直接創造剩餘價值的經濟角色，而且也具有間接創造剩餘價值的經濟角色（Garnham, 1979: 132）。

易言之，媒體同時具有了生產與交換兩種特質，藉由生產媒體商品（文本）獲得價值，但同時也創造了文本所帶來的其他經濟效益並對社會產生影響。如果將仇韓的相關新聞來舉例的話，便可以說，運動場上的衝突事件原先可能是一種運動議題的報導新聞商品，然而這項商品卻也創造了其他新的價值性對社會情緒造成影響，這種情緒又反身回來提高了媒體生產仇韓新聞的價值。

（二）新聞商品特性

上述所提到的剩餘價值創造，便是如何使新聞商品獲取利潤的重要概念，接續議題，那麼所須討論的便是新聞的商品特徵為何？也就是要怎樣利用新聞獲得大量的利益。Jhally & Livant（1986: 130）很早便指出，對於媒體來說，觀看行動便是商品生產的主題，那麼媒體經營的最重要任務就不僅是讓觀眾看而已，

而是要讓他們看得更多。換句話說，如果商業媒體要能賺錢，那麼就必須增加剩餘觀看時間，也就是去創造讀者的觀看慾望。

Ang (1990: 165) 分析閱聽眾本質的研究中也認為，如何得到觀眾是一種純粹的經濟概念，也是媒體關注的核心，觀眾並非是被動的，而是具有感情與智慧，所以在我們理解觀眾的特性時，便就應該明白媒體公司的策略便是將人們轉換成為觀眾，觀眾是製造出來的，而非天然生成。

從這些論述可以知道，新聞並非單純的文本製作而已，而是具備商品特質，從某種角度來看，他便是文化商品的一種，從人們對於內容物的青睞，才能產生價值。而文化商品在運作時往往會遇到幾項問題 (Hesmondhalgh, 2002; 廖珮君譯, 2006: 18-23)：

1. 高風險：由於閱聽人的喜好難以捉摸，因此有時即使投入再多行銷手段，也可能付之一篲，誰也無法預測下一個成功文本樣貌如何。
2. 生產成本高但再製成本低：即固定成本高而變動成本低，例如新聞的採訪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然而在文本產出後，再製複本的時間與成本便會大大降低。
3. 半公共財；創造稀有性的需求：這個特徵近似經濟學上的公共財概念，也就是前人是否使用接不會改變下一個人使用的經驗。所不同的是，文化商品會透過一些方法如限制近用、禁止複製、控制發行時間等方式，來創造商品稀有性來增加價值。

為了解決這些可能產生的問題，也牽引出文化（新聞）商品的生產特性如下 (Hesmondhalgh, 2002; 廖珮君譯, 2006: 18-23)：

1. 大量的文本產出：使失敗的作品與暢銷作品相互抵消，易言之，便是平衡冷門以及較受歡迎的新聞商品之間的所帶來的收益差距。
2. 集中與整合式的管理：在產業上指的便是垂直、水平整合，如從新聞生產流程來說，那麼一則新聞在製作前，可藉由不同的部門協力採集，在製作後，更可以透過不同曝光管道做多重的利用，減低了新聞生產的成本。

3. 類型化、創造文類與明星：從前述高風險的文化產業本質可知，閱聽人的習癖難以預料，為了降低風險，其中有效的方式便是去建立連續性的閱讀誘因，如明星體制以及文類。

這類文化（新聞）商品的生產方式並非一般想像的如此自由以及具備多元性，我們的收視習慣儘管具備自主性但也可能是受到媒體所餵養而成，新聞展演有著一定的潛規則。如同 **McManus**（1992: 205）所說，新聞是非常特殊的商品，在理想市場情境中，理論上閱聽眾應該會根據自利原則理性運作、願意享受多元的新聞呈現，並且具備辨別新聞品質好壞的能力，這樣不但可使新聞供應者獲得最大利潤，閱聽眾本身也可得到最大的啟發。但事實上，業者獲得最大利益的邏輯與啟發大眾的公共利益具有衝突性，真正的市場裡，如何獲取閱聽眾的注意力才是最重要的課題。

在前面的文獻討論中，可知仇韓情緒的迸發之處多在運動場域，並在當中反映國族情緒，原因來自於而運動員在國際場合的表現往往化作人民認同之心繫，以及最深處的集體情感（**Eco**，1986：159）。是以運動員從而容易受到注目而成為一種名人類型，匯聚及乘載各種社會情緒，具備認同的消費價值，也因此媒體在報導上，時常以運動場域中的明星或話題選手做為一個開端與延續，使其對於新聞的重要性日益增加（**Smart**, 2005；何哲欣譯，2008: 10）。

如此的發展態勢，造就了近代的名人現象。**Rein** 等人即認為名人與媒體之間關係即是：「一個曾經由新聞所製造出來的名字，現在卻是這個名字主動製造新聞。」（引自何哲欣譯，2008：17），表示了名人如何為媒體所建構的過程。透過名人，媒體可以建立一種類型化的銷售方式，建立議題中心並且撩撥閱聽眾接下來的收視需求；因為透過名人，敘事可以建立焦點與連續性，且將原本平鋪直敘的報導方式加入了人物角色的變化，以及故事性的敘說方式。

此外。這種由媒體所建構出的認同，既流動又複合且非一定，具有一體兩面的複合商業與文化意義（**McDonald, M.G. & Andrew D.L.**, 2001: 22）。如同先前國人瘋狂的王建民現象，媒體一方面藉此議題增加銷售量，另一方面也滿足了民眾對於王建民文本的消費認同需求。易言之，媒體在生產包裝名人的過程中，除了情緒的操弄外，當中的一些文化及社會、政治意涵，也會藉由媒體來影射或隱含（**陳家奇**，2008）。

這樣的名人現象，代表的即是新聞商品時常呈現的一種類型或公式化報導。這樣的操作方式根據先前一些不斷被試驗的文本經驗，成為標準化的公式，將風險降到最低，降風險的同時以得到利潤（Croteau & Hoynes, 2001: 153）。這也證明了人們對於新聞產品的偏好是可以被撩撥的，關鍵在於創造連續性的需求，如廣播電視的連續劇、電影製片人重複使用片名（Baker, 2004；馮建三譯，2008: 105）。

易言之，為了迎合並吸引最多數的閱聽眾注意，媒體組織在大量生產文本的過程中，會去尋求能降低販售風險的新聞呈現，這樣的主題可能來自於社會文化的某種期待，並配合過去累積的販售經驗，進而感知大眾的觀看需求，逐步建立某種類型的主題公式；然而，這些做法雖然可能達到獲利的目的，卻也容易喪失了議題的聚焦以及理性討論的空間，使得部分真實淹沒在組織框架中，另一方面更顯示媒體組織有其建構與影響新聞真實的一面。

第四節 總結

從上述文獻討論可知，運動場上的對抗容易產生國族主義，國際賽事將民族套入在國家的殼中，而運動員所代表的便是一個具體的國族想像目標，讓眾人集體想像，故所發生的事件也容易成所謂的集體記憶。集體記憶是不斷的在更新變動的過程，也容易成為國族想像下的附屬品，會為了成全我族想像，產生刻板印象與自圓其說。

從這個角度來看，報導韓國新聞賽事的來源便是媒體，也是框架產生的重要中介，而框架的產生來自其重要的過程—框架化，會產生框架化即是人們去簡化與自己不熟悉事物的一種方法，使之對事物更容易了解以及歸類，所以我們需要各種框架來幫忙，但反過來說框架也逐漸閉鎖了我們的觀看方式，進而對事物產生固定形象。所以框架是一個在文本、個人、組織之間的循環，它可能隨機出現在哪個部分，或是受到程度不一的影響，但可以確認的是媒體會是推波助瀾的要素。

新聞做為一種媒體產物，其最終目的在於讓媒體能夠獲利生存，為了永續經營必然就要買低賣高、降低成本以得到更多的利潤。然而昨日的新聞成為今日的歷史，新聞本身因時效性高，因此如何掌控新聞的新鮮度變成為重要課題。然而

為了維持新鮮度，必須要配置大量的人力與設備，在市場的競爭下，媒體自然要尋求降低成本的方式，也就是將新聞的製作成本降低。

其中一個好方法便是創造與延續議題類型，如此一來便可降低目標分散的風險，以確保穩定的新聞銷售利益，不過這樣的情形也容易讓新聞流於同質及產生框架化的現象，讓特定事件或對象缺乏其他向度的觀看方式。



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問題與步驟

一、研究問題

綜合前述文獻討論，本研究進行具體的研究發問如下：

(一) 媒體文本如何呈現運動場域中的仇韓論述

框架理論讓我們知道媒體並非如明鏡般反映真實，而是透過選擇與重組呈現新聞事件，而新聞媒體做為一種產業，有其生產機制與利潤考量維持經營運作，運動場上的競技與象徵意義，使得國族情緒容易聚集與發酵，也容易成為媒體熱賣的新聞商品，因此探究新聞文本的框架顯得格外重要，希望藉此了解台灣媒體在過往的運動新聞文本中如何呈現仇韓論述，是否有不同的框架變化以及商業化現象，以及為什麼會呈現這樣的框架。

1.1 韓國相關運動衝突事件中，媒體報導呈現如何的新聞框架？

1.2 不同時期韓國運動衝突事件中，媒體報導呈現的新聞框架變化如何？

(二) 媒體與大眾所建構的仇韓集體記憶文本間有怎樣的建構互動

Hobsbawm (1990/1997) 在探討民族主義的興起時，談到兩種觀點：庶民（大眾）、官方。前者所代表的是一種群眾內心對於共同想像及安全感的渴望，後者則是官方為了方便統一國家秩序與維繫政治權力的手段，換句話說，後者代表的是一種人為的控制，但也並非意旨前者庶民的民族意識原型即是天然生成，只是相對官方的明確目的性，大眾有自成一格的生成與運作方式，並且與官方相互影響、融合。

在本文脈絡中，仇韓的意識生成，如 Hobsbawm 對於民族主義的闡述，具有雙元性，只是在角色上，原先的官方與庶民，化為媒體與庶民的差異。對於媒體來說，運動場上的仇韓議題，不僅僅是國族意涵，也具有新聞生產上的商品價值，具有維繫媒體經營的目的性，但對於大眾便沒有這樣的壓力存在，因此是否也產生了不同的集體記憶建構方式？故衍生問題如下：

2.1 以楊淑君事件為例，韓國相關衝突事件中，媒體與大眾間所建構的文本框架差異為何？

2.2 以楊淑君事件為例，媒體報導的文本框架產製過程如何？？

二、研究步驟

在今日的社會，大眾媒體已成為主要的符號創造者，它同時是生產者也是傳送者，從新聞報導來看，更是兼具了製碼與解碼的過程。如果參考 Anderson 想像共同體對於媒體的概念，其發達使得人們有了集體想像的中介物，透過每日更新的新聞文本，讓人們有如中古世紀的晨禱在心念上集結。

本研究目的即是去了解媒體文本是如何再現運動場域的韓國論述，進而驅使國人有仇韓情緒的共同想像，因此研究重點之一便是探究製碼端的文本歷程變化及媒體生產環境影響。研究重點之二，則倚靠 Hobsbawm 民族主義官方、庶民相互生成的概念，從大眾文本的對照，去驗證媒體文本在仇韓議題上是否具有偏向性與操作軌跡。

所以，研究方法大致分做兩個階段。第一階段透過量化的方式，進行運動場域中仇韓論述的內容框架分析，分析對象有兩個部分，媒體方面為中國時報、聯合報、蘋果日報、自由時報、自立晚報等報紙，並且依據時代背景化劃分斷代，以期能夠看出政經脈絡對於新聞框架歷程變化的力量；大眾文本的代表，則以網路上的相關文章與回應做為分析目標。

第二階段以質化研究方法為主，分做文本分析與深度訪談兩個部分。文本分析以網路上的仇韓相關文章與回應做為分析目標，旨在了解大眾文本如何呈現及與媒體文本互動。深度訪談部分，則訪談媒體場域中的新聞生產者，企圖了解在數波仇韓情緒下，新聞文本生產者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新聞產製環境所帶來的影響。

第二節 內部挖掘—媒介文本的框架分析

一、框架分析路徑選擇

框架分析的研究重點在於，能重新建構在某一議題中的言談或論述中採用論點，將之解構再重組以考掘其中深藏意義（Donati,1992:143，轉引自羅世宏，1994）。是以分析的方式依照不同事件、議題、切入角度，往往也會有適合的不同框架分析方法。

目前國內外研究新聞框架大致採用幾個分析取徑：van Dijk（1985）的「批判論述」（critical discourse）分析取向；Gamson（1989）的「詮釋包裹」分析取向；Tankard（1991）的「框架清單」（the list of multidimensional concept）分析取向；Pan & Kosickii（1993）的「論述結構」分析取向及 van Gorp（2007）的「框架包裹」（frame package）分析取向，種類多元且著重也有所不同，在眾多框架分析中，某些學者除文本外，也會加入「時間」作為變項，欲了解議題框架的與政治、經濟、媒介情境的相互轉變情形（陳詩婷，2011:18）。

在上述的框架分析路徑中，Pan & Kosickii 的「論述結構」分析與 van Dijk「批判論述」分析取向，主要以英文的語法結構為母體，且多為單則新聞分析過程，較適合橫切面的文本分析，不利分析中文文本（羅世宏，1994:54）。儘管橫切面的分析方法較能掌握文本較深的意義，然而本研究希望能夠以縱深的歷史角度了解新聞中的韓國形象變遷，上述分析取向便難以師法。

Davis（1990:179）即認為框架分析不應限於單則新聞結構，更應該發展能分析長時間議題框架的方法。在眾多分析途徑中，Tankard 的「框架清單」分析取向便適合用來分析長時間、大樣本的媒介論述，所謂框架清單，即是先分析小樣本的新聞內容後，建立框架類目並加以定義，之後再將大樣本的新聞依序分配到某一建立的類目中。

此取向意義在於揭露新聞文本中所提供的「示意框架」（suggesting frame），也就是挖掘媒介可能的「發言位置」以及所產製的「框架方向」。所謂的框架方向能體現媒體的特定立場，從而看出其所欲引導的「偏好閱讀」（preferred reading）方向，而 Tankard 的「框架清單」取徑最大優點，即是能以量化方式進行框架分析，測量方式相對論述分析簡潔便利，在程序上也較符合客觀性（羅世

宏，1994)。

本文旨在探究歷時性的韓國新聞論述變化，從而分析台灣人仇韓情緒的進程，因此勢必須將時序拉長、採取較多樣本數，為求效率並避免陷入主觀判斷，成為筆者採用 Tankard 的「框架清單」分析取向的重要原因。

二、研究對象與範圍

(一)樣本選取範圍

在文獻回顧中已知，仇韓言論的爆發點多發生在運動場域，因此本文內容分析自運動新聞報導中選取。在運動場上台韓間的碰面機會往往在於國際賽事中，因此本研究以運動賽事中的衝突事件期間，作為仇韓論述的樣本蒐集目標，並採取立意抽樣方法，找尋最可能出現仇韓言論的關鍵論述時刻(critical discourse moments)(Gamson,1992)，其中包括賽事判決爭議、國家主權衝突、選手肢體衝突、賽制疑義等較為引起國人注意的重大事件。

選取範圍上希望能夠囊括較為集中的新聞樣本，故將以事件發生後的十天為蒐集對象。本研究以不同階段每期抽選兩個特定事件，以區分不同時期的仇韓論述變化。樣本採取的時間起始點，畫分大致三個階段如下：

1.政治摩擦期：1983年5月5日至1992年8月24日

台灣的韓國研究學者朱立熙(1993)指出，八零年代以來台韓關係開始變化，起因在於1973年朴正熙以「六二三宣言」作為國策，傾全力與中國大陸交好，這中間最大的衝擊性事件是發生在1983年5月5日的「中共民航機劫機事件²²」，使得台韓中之間關係逐漸白熱化，埋下之後韓國與中華民國斷交的遠因。是以筆者即以此事件做為起始點至1992年台韓斷交為末，是為政治摩擦期。

2.後斷交期：1992年8月25日至2004年12月31日

此階段台韓兩國的政治關係已浮上檯面，因此劃分切點的重要因素轉為經濟環境的變化。自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以來，南韓政府大力改革經濟結構，強力發展電子、通訊等產業，對我國相關產業影響甚大，2004年後台韓雙邊的貿易開始產生逆差，也反映出之間的競爭力消長，至此階段，雙方進入全球化的體系

²² 台灣媒體稱之為六義士奪機投奔自由事件。

下競爭（邱俊榮，2006）。其後韓國逐漸脫穎而出，在 2005 年行政院主計處的經濟數據調查中，韓國每人 GDP 更首度超越台灣，將台灣擠到亞洲四小龍末。

3. 全球化競爭期：2005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2005 年韓國 GDP、GNP 開始超過台灣，成為一個分水嶺，顯示在過去亞洲四小龍中台灣較優於韓國的經濟優勢地位，至此階段逐漸易位，並且在產業上捉對廝殺。

表 3-1：歷年國際賽事與斷代對照

時期	時間	事件名稱	事件摘要
I 政治 摩擦 期	1983 年 9 月 12 日	亞錦賽棒球 賽制更改	主辦國韓國臨時推翻既定賽程，改為中日韓三隊的戰績若相同時並列冠軍，不再加賽爭冠軍，意圖確保韓國穩居冠軍。
	1984 年 4 月 7 日	亞青盃旗歌 事件	我國至漢城參加亞青盃籃球賽的中華代表隊，因南韓片面毀損與我國約定，不准我國放國旗歌，我代表團憤而退出比賽。
II 後斷 交期	1997 年 5 月 10 日	吳京貴賓卡 事件	韓國釜山東亞運，中華臺北奧會循例幫當時前去加油的教育部長吳京申請貴賓卡。不料在開幕前一天吳京等人的貴賓卡卻被收回並降級。
	2002 年 6 月 18 日	世足賽誤判 事件	被質疑裁判多次判決明顯的偏袒韓國隊，令與韓國隊交手的球隊(義大利,西班牙)受到了極其不公正的待遇。
III 全球 化競 爭期	2009 年 12 月 7 日	曾敬翔襲喉 事件	韓國選手宋智勳在開賽僅 17 秒時以拳頭攻擊台灣選手曾敬翔頸部，導致曾當場倒地緊急送醫，韓籍仲裁委員隨後作出爭議判決，將金牌頒給犯規的南韓選手。
	2010 年 11 月 17 日	楊淑君黑襪 事件	楊淑君首場出戰越南選手，在九比零的領先優勢下，終場前 12 秒突遭韓裔菲律賓籍裁判以「電子襪不符大會規定」為由，直接判定失格。

(二)樣本來源

本研究以報紙作為媒體新聞報導的分析文本。原因在於報紙新聞報導的深入、準確、及專題的呈現手法，相較廣播或電視新聞之報導之內容來的更較精確及詳盡（蘇蘅，2000）。此外，報紙亦是一般大眾主要的媒體來源之一，且能以文字直接分析，同時報紙保存時間久，不受時間限制，在資料蒐集與選取上較為方便。基於能夠同時兼顧文本取得的方便性和完整詳盡等因素，本研究以報紙內容作為分析文本。

在報別的選取上，以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等三大報為主，原因在於中時、聯合與自由時報是國內主流的綜合性報紙，其報導內容具有指標作用，且三報涵蓋年代長、報社政治立場各有偏向，符合本研究的需求及樣本比較上的意義。

不過第一時期中，自由時報以自立晚報替代，在第三時期則再加入蘋果日報作為取樣樣本。原因在於 1980 年代自由時報尚未形成全國性報紙，且因產權問題，使得報風與今日自由時報²³有很大差異，相較之下，當時號稱「無黨無派、獨立經營」辦報並以全國為發報範圍的自立晚報²⁴，由於產權較無跟黨政軍有關係，使得在報社立場在報禁時代較不受干涉（林富美，1999），可與其他兩報有所對照。

至於蘋果日報雖為 2003 年後才登陸台灣，但其影響力不可小覷，無論在閱報率還是發行量皆名列前茅，其商業化的編採風格至今影響台灣報業甚鉅（張卉穎，2004；尹俊傑，2008），可作為其他三報的對照版，唯日期以 2003 年 5 月 2 日在台發行後的報導開始採樣。

另外考量資料取得的完整性，為蒐集研究期間所有符合選取原則的文本，必須透過資料庫的檢索才較可能辦到，而聯合報、中國時報、蘋果日報、自由時報大部分資料已建置全文新聞資料庫，因此能夠較方便且完整囊括所需要新聞文

²³ 自由時報前身為自由日報，為中部地區性報紙，後將產權轉移至現今自由時報負責人林榮三，逐漸成為今日台灣四大報之一，並具有較為明顯的政治傾向。

²⁴ 《自立晚報》：創刊於 1947 年 10 月 10 日，為台灣第一份正體中文晚報，一向以「無黨無派、獨立經營」為理念。最初由顧培根創辦，時日出四開紙，發行宗旨是：「完全以國家民族利益為前提，以民眾的信心與希望，替民眾說話，忠實報導，善意批評，積極建議，抨擊壞人，歌頌好人，作為政府與民間進一步合作的橋樑。」

本，也成為樣本來源選擇的重要因素。

(三)文本選取方式

在樣本選擇上，除了依據上述所提及的時間點進行抽樣外，文本的選取方式主要參考 Donati (1992；轉引自羅世宏，1994: 60) 所建構的「關鍵字清單」(keywords list) 方法，其做法為：先針對新聞標題進行關鍵字檢索作為第一階段篩選，再針對選出之新聞進行全文關鍵字檢索，若內文未出現設定之關鍵字，則排除之。

然而本文考量設定之關鍵字並非一定出現在標題，如標題無出現關鍵字便予以刪除，有可能會遺漏相關文本，因此筆者修改文本選取方式為：其標題或內文出現至少一次以上的關鍵字即列入選取範圍。

本研究針對運動場域中的仇韓論述變化為研究問題，故將前述所列各項事件發生後十天做為時間基準，設定搜尋關鍵字組合為如下：

1. 亞錦賽更改積分事件：「南韓」、「韓國」、「亞錦賽」、「亞洲盃」、「棒球」。
2. 亞青盃旗歌事件：「南韓」、「韓國」、「亞青盃」。
3. 吳京貴賓卡事件：「南韓」、「韓國」、「亞運」、「吳京」。
4. 世界盃足球賽誤判事件：「南韓」、「韓國」、「裁判」、「足球」。
5. 曾敬翔襲喉事件：「南韓」、「韓國」、「跆拳道」、「曾敬翔」。
6. 楊淑君黑襪事件：「南韓」、「韓國」、「跆拳道」、「楊淑君」。

表 3-2：衝突事件分期表

時期	事件名稱	樣本日期
I 政治 摩擦期	亞洲盃棒球賽制更改	1983 年 9 月 13 日~9 月 22 日
	亞青盃旗歌事件	1984 年 4 月 8 日~4 月 17 日
II 後斷交期	吳京貴賓卡事件	1997 年 5 月 11 日~5 月 20 日
	世界盃足球賽誤判事件	2002 年 6 月 19 日~6 月 28 日
III 全球化 競爭期	曾敬翔襲喉事件	2009 年 12 月 8 日~12 月 17 日
	楊淑君黑襪事件	2010 年 11 月 18 日~11 月 27 日

三、框架類目界定與分類

(一) 框架操作編碼

Tankard (1991) 的「框架清單」取向，主要先透過內容分析找出框架表格，並從新聞樣本中找出框架建構的定義與指標，然後再將這些樣本分配到新聞框架下。研究者首先應分析小樣本的媒介論述，建構屬於該研究的「操作性框架編碼清單」(working frame coding list)，找出各種代表性意義的報導框架。

所以，第一個步驟即是先找出媒介論述中的各種可能框架論點與機制；第二個步驟才是將大樣本的文本套入所歸納框架之中，進而呈現出各項框架分布。故筆者在第一階段，選擇 2010 亞運楊淑君黑襪事件作為小樣本抽樣，建立操作性框架編碼清單。

作為框架論點清單建構對象的理由是：本年除一般性的體育賽事報導外，還發生「楊淑君黑襪事件」，引起媒體大肆報導，如此一來便可能蒐集到平日不容易在體育賽事報導外出現的框架或框架論點，使之後在實測登錄時有較完整的分析類目可用。

至於建構框架分析類目的過程中，羅世宏在其對框架分析的研究中 (1994: 64) 認為應至少符合兩個要求：

1. 框架的目的性與名稱合理性：

在建構框架類目過程中，應考量到行動者或文本生產者的意識形態目的，並且將這樣意識形態合理化轉換，也因此沒有所謂的「中立框架」或「為框架而框架」的類目。換句話說，當我們命名框架時，必須能反映行動者的某種支配或目的，考量到這個意識形態至少對於行動者一方是可欲、合理的。

2. 具「文化共鳴」(cultural resonance) 的框架類目：

由於框架所表現出來的應是自然或理所當然，所以在建立框架類目時也須有文化基礎，使得框架是可被人們所理解的 (recongizable)。換言之，我們所建立的框架要具合理性，便須奠基於符合閱聽人文化或傳統觀念的深層結構，然後汲取、變造成為可用的框架類目。

有了這兩個基本原則為前題，便可依序發展出屬於該研究「操作型框架編碼

清單」，步驟大致如下（林建利，2007: 46）：

1. 區分新聞文本的「主要事件」或「主要情節」：

分析工作進行首先要務便是將資料轉化成可操作的概念，其過程便是打破以新聞則數為單位，而改採逐段、逐行、逐句甚至是逐字來進行分析。也就是說將原始文本打碎，獨立出各種概念，然後重組、合併成為一個更具代表性的事件或情節型態，以作為研究中的議題框架。

2. 找出主要事件或主要情節中的「框架論點」與「框架機制」：

其次，便是從這些議題框架中進一步找出被使用的情形，也就是框架論點與框架機制。框架論點是由字、詞、語句以及段落等符號設計所組合而成，透過這些基本單位，新聞文本才能表現出寫作風格與文本意旨，所以框架論點即是「框架化」過程中的「框架活動」，行動者的宣稱與論點透過這些框架活動才得以再現。至於「框架機制」則與新聞的整體結構與用字遣詞相關，反映出新聞的報導傾向與背景，可進一步分析框架化過程（羅世宏，1994；林建利，2007）。

3. 框架論點與框架機制的命名：

根據上述原則與步驟，最後由研究人員反覆隨機抽出新聞報導，重複閱讀並結合文獻探討所得出的概念，找出各種框架的使用情況，並透過討論、溝通與修訂，最後將分析出的類目加以命名，得到研究所能使用的框架論點與框架機制，以下分別說明所歸納成果。

(1) 框架論點

「議題框架」通常得經由「框架論點」才得以發聲，所以在本研究分析上，將以「框架論點」為分析的單位，如下頁表 3-3。

表 3-3：框架論點編碼清單

框架論點	編碼說明
1 民族自尊	<p>具體行動或言語呈現仇視韓國的民族認同。</p> <p>如「量販業者順應情勢，把韓國泡麵撤下促銷區，由本土品牌泡麵取而代之²⁵」、「韓氏宗親會昨要求外交部等部會，將韓國翻譯改為寒國，以免韓姓人士蒙羞²⁶」、「電腦行老闆拒賣韓貨、還砸爛韓貨²⁷」。</p>
2 本性難改	<p>表示台灣人長久以來對韓國的負面印象。</p> <p>如「這次楊淑君被判失格，國人的情緒之所以如此憤怒，絕對與大家長久以來對韓國與跆拳道之間的怪異感受有關²⁸」、「網友對韓國的開砲是新仇舊恨、長期累積的怨氣²⁹」。</p>
3 政治口水	<p>政治人物透過衝突事件作為宣傳或攻擊的口號或工具。</p> <p>如「國民黨文傳會主委蘇俊賓也批，2006 年北京跆拳道公開賽，我國選手面臨類似楊淑君情況，當時行政院長蘇貞昌、副院長蔡英文全都緘默無聲³⁰」、「民進黨台北市長候選人蘇貞昌批評國民黨舉辦一一二一大遊行，同時聲援楊淑君，是在消費楊淑君³¹」。</p>
4 一丘之貉	<p>表示韓國在衝突事件中與另一方共同狼狽為奸</p> <p>如「這事件還有一個共犯，甚至是主謀，那就是主辦國中國³²」、「這樁中韓聯手做掉比賽選手的爭議處分，是跆拳道自 1984 年列入亞運正式競賽以來最卑劣的醜聞。³³」</p>

²⁵ 〈泡菜泡麵急撤 韓式料理店急凍〉 2010/11/21 /中國時報/焦點新聞

²⁶ 〈韓姓宗親蒙羞 要求韓國譯韓國〉 2010/11/23 /自由時報/北部新聞

²⁷ 〈砸爛液晶螢幕 商家賣韓貨〉 2010/11/20 /蘋果日報/頭條要聞

²⁸ 〈力挺楊淑君 讓跆拳道黑哨消失〉 2010/11/24 /中國時報/時論廣場

²⁹ 〈楊淑君是最後的稻草 朱學恆：這是合理的生氣〉 2010/11/19 /聯合報/廣州亞運

³⁰ 〈蔡批馬處置慢 朱嗆別鬥爭〉 2010/11/21/蘋果日報/頭條要聞

³¹ 〈誰消費楊淑君？藍綠口水戰〉 2010/11/20 /聯合報/焦點新聞

³² 〈一個乩童 一個桌頭〉 2010/11/22 /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³³ 〈真賤 中韓裁判聯手 做掉楊淑君〉 2010/11/21/蘋果日報/頭條要聞

5 借刀殺人	認為在衝突事件中，韓國只是擋箭牌，主要敵人另有他者。 如「韓國人與台灣人無冤無仇，在這次事件中也無選手與楊淑君競爭，為什麼要對台灣不利？ ³⁴ 」、「這次做掉楊淑君，顯然不是韓國人事先策劃的，而是中國的趙磊在現場臨時起意 ³⁵ 」
6 理性自省	認為台灣人要有格調，須冷靜面對，或反省自身作為。 如「如果只因為亞跆盟或世跆盟裡少數韓國人的作為，我們就要擴大到對五千萬韓國人的仇恨，對嗎？ ³⁶ 」、「我國代表團相關人員外語能力不足，對比賽規則的掌握能力不夠細緻 ³⁷ 」。
7 場邊花絮	描寫事件人物相關的生活細節。 如「楊淑君小時候很乖、很聰明，但比較皮，後來教練誇楊淑君有天分，才決定送楊淑君去學跆拳道 ³⁸ 」、「劉聰達在門口趁機求婚...楊淑君則嬌羞回答:不要亂講啦!爸媽在裡面。 ³⁹ 」。
8 體育發展	藉由運動場上的衝突事件分析我國體育概況。 如「然而○八年北京奧運僅僅拿到二銅，朱木炎、楊淑君的先後失常，徒留蘇麗文落敗但奮戰不懈的畫面，這一切已顯示我跆拳道發展與時俱進的能力不足 ⁴⁰ 」、「現代體育是複雜的系統工程，台灣還停留在張三、李四都可順便談兩句的粗放階段 ⁴¹ 」。
9 賽事說明	關於衝突事件說明與追蹤。 如「舊款電子襪、電子貼片 亞跆盟認證至 2012 ⁴² 」、「電子襪事件 進入調查 ⁴³ 」。
10 其他	以上論點未包含者，歸類為其他。

³⁴ 〈真的不是韓國人的錯〉 2010/11/24 /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³⁵ 〈誰趙磊作弊的證據〉 2010/11/23 /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³⁶ 〈誰鼓動反韓 小朋友何辜〉 2010/11/22 /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³⁷ 〈學學南韓 賽場做筆記〉 2010/11/19 /聯合報/民意論壇

³⁸ 〈如果退休 淑君 300 萬獎金 培訓學弟妹〉 2010/11/25 /聯合報/綜合新聞

³⁹ 〈返回老家團聚 男友趁機求婚〉 2010/11/24 /蘋果日報/頭條要聞

⁴⁰ 〈亞運豐收 體育前景仍是問號〉 2010/11/26 /中國時報/時論廣場

⁴¹ 〈體育管理 人才在哪裡〉 2010/11/19/聯合報/民意論壇

⁴² 〈舊款電子襪、電子貼片 亞跆盟認證至 2012〉 2010/11/20 /中國時報/焦點新聞

⁴³ 〈電子襪事件 進入調查會〉 2010/11/21/聯合報/焦點新聞

(2) 框架方向

鍾蔚文、臧國仁等（1995）認為框架化涉及報導的整體結構，像是報導的背景與角度。這類框架涉及報社結構與行動者（文本生產者）之間的抗衡對立與妥協，揉合組織框架與個人框架，進而產生框架機制。

故本研究在此部分採取其概念，將框架機制轉化成為所謂的框架方向，以判斷框架論點的架構與意識形態角度，分作仇韓、不仇韓，說明如下表 3-4。

表 3-4：框架方向編碼清單

框架方向	包含之框架論點
1 仇韓	以仇韓作為主軸，包括「民族自尊」、「本性難改」、「政治口水」、「一丘之貉」等論點。
2 不仇韓	呼籲不應情緒化的仇視韓國，或不以仇韓議題為描述對象。如「理性自省」、「場邊花絮」、「體育發展」、「賽事說明」、「借刀殺人」等論點。

(二) 登錄類目與原則

除框架論點與框架機制的分類外，本研究在類目登錄上，還加入了新聞文本基本資料單元的測量，其考量是在分析過程中搭配基本資料進行第二次較詳細的分析，甚至與原有的框架分析結果相互驗證或得到新發現。

在報導形式與消息來源部分，本研究也針對新聞的報導型式進行歸類，分為：新聞、特稿、社論、投書等。消息來源部分，含直接引述或間接引述，歸類如下：選手或教練、政府官員、媒體、民眾。如下表 3-5 所示。

表 3-5：報導形式與消息來源編碼清單

報導形式	1 新聞	2 特稿	3 社論	4 投書	5 其他
編碼說明	有記者署名、報社統發稿。如「記者 XXX 報導」、「本報訊」、「外電報導」等新聞皆屬之。	由學者專家或報社主筆撰寫，或記者主動分析調查的新聞專題、相關知名人物專訪。	報紙所刊載的評論文章，代表報社意見。	民眾或學者針對新聞議題向報社投稿的投書	非屬上述類別者。
消息來源	1 選手或教練	2 公眾人物	3 媒體	4 民眾	5 其他
編碼說明	包括當次比賽與無比賽之運動人員	各級政府單位人員、民意代表或藝人等皆屬之	轉述國內外其他媒體消息	包括一般民眾與網友	無消息來源，如文中以「據悉」呈現。

至於框架登錄原則參考羅世宏（1994: 72）三大原則：

1. 重複原則：若一則新聞中有兩處以上的框架論點採取同一議題框架或是框架方向，須進行重複登錄。

2. 排除原則：如某一個框架論點不只包含一個議題框架，則須檢視文本上下文結構判定該則文本的主要的核心議題框架，之後選擇適當的框架論點登錄。

3. 明確原則：框架論點在登錄過程中的框架方向必須明確，否則一律登錄在「其它」類目。

依此原則，本研究以整篇文章為判別標準，選出最具代表、最明顯、最主要的主題登錄。依據三項標準判定登錄主題：（1）整篇新聞所佔比例最多者；（2）出現在導言者；（3）與標題相同主題者。

綜合以上說明，以及參考羅世宏(1994)修改自 Gamson 的多位數編碼方式，成為下列編碼表：

表 3-6：操作編碼表

編號	事件名稱	報別	報導形式	框架 論點	消息 來源	框架 方向
	C1	C2	C3	C4	C5	C6

所建立之類目系統主要包括「事件名稱」、「報別」、「報導形式」、「消息來源」、「框架論點」以及「框架方向」等。類目的建立主要根據第二章相關研究結果而來，並輔以對文本反覆篩選，以求達到窮盡、互斥等類目建構的要件。登錄方式與順序如前述所類目編號如下。

1. 事件名稱：亞錦賽事件登錄為 1，亞青盃旗歌事件登錄為 2，吳京貴賓卡事件登錄為 3，世界盃足球賽誤判事件登錄為 4，曾敬翔襲喉事件登錄為 5，楊淑君黑襪事件登錄為 6。
2. 報別：聯合報登錄為 1，中國時報登錄為 2，自由時報登錄為 3，蘋果日報登錄為 4，自立晚報登錄為 5。
3. 報導形式：新聞登錄為 1，特稿登錄為 2，社論登錄為 3，投書登錄為 4，其他登錄為 5。
4. 框架論點：登錄方式與順序參照前述表 3-3「框架論點編碼清單」。
5. 消息來源：選手或教練登錄為 1，公眾人物登錄為 2，媒體登錄為 3，民眾登錄為 4，其他登錄為 5。
6. 框架方向：仇韓登錄為 1，不仇韓登錄為 2。

(三)信度檢測

信度是指測驗結果的可靠性與一致性，換句話說，即使由不同人對同樣資料重複施測，也可以得到相近或相同結果。檢定部分，檢測至少需從樣本數中抽取 10%～25% 的樣本數來做信度檢定 (Wimmer & Dominick, 2003: 128)。據此原則，本研究由框架清單建構樣本中，隨機抽取 52 則進行相互同意度檢定。

筆者邀請另一位政治大學廣告所同學共同進行框架類目相互同意度檢定，並採用王石番 (1991) 所提到的編碼員信度計算方法，其公式如下：

$$R = \frac{2M}{N1 + N2}$$

M：完全同意之數目

N1：第一位編碼員應有的同意數目

N2：第二位編碼員應有的同意數目

經過檢測後，信度係數達到 0.84⁴⁴，符合 Gerbner 對於文化指標設立的信度係數最低標準 0.80 門檻 (王石番，1991)，表示筆者所建構之框架論點清單信度具可行性及信度。

(四)資料處理

框架分析將採量化方式進行，蒐集樣本後以分析數據的統計套裝軟體 SPSS 17.0 for Windows 進行樣本分析工具。除總體框架論點分布，同時列舉各時期的論點分布、消息來源等要素，進行描述性統計以及卡方檢定。採取的方式茲說明如後：

1. 描述性統計 (Descriptive Statistics)：描述性統計是以次數、百分比、平均值與標準差等方式呈現，將樣本的分佈作初步分析，以描述每一個變項分佈的情形。

⁴⁴ 兩位編碼員在 52 則新聞樣本中，編碼相同的新聞為 44 則，所以編碼員相互同意度： $R=2(44)/52+52$ ， $R=0.84$ (小數點取至第二位)

2. 卡方檢定 (chi-square)：卡方檢定用來瞭解或觀察次數和期望次數間的差距，適用於不連續的變項中。

第三節 外部探索－大眾仇韓論述框架解構

此部分針對問題 2-1 與 2-2，探討大眾文本論述及媒體文本之間的框架建構呈現比較，方法則延續前述媒體文本的框架分析而來，故研究方法介紹部分不再贅述。

由於受限過去網路文本較無現今發達，以及文本採樣問題，本研究在大眾與媒體文本的比較採取單一事件對照，以 2010 年發生的楊淑君事件做為在框架分析的標準，並沿用前述框架論點的分類，也就是以框架論點編碼清單做為直接分析架構，分析楊淑君事件中，大眾文本的框架論點特徵。因此以下只針對樣本選取對象與原因、選取方式與範圍說明。

一、樣本選取對象

本研究將選取批踢踢 (PTT) 實業坊⁴⁵Olympics_ISG 板做為採樣對象，原因在於其為國內知名的 BBS 站，同時站內的板務管理與規範較其他 BBS 站或網路論壇嚴謹與完善，大幅減少非相關的網路廣告文章占據看板，以及降低謾罵非理性的文章內容。

至於 Olympics_ISG 雖然板名英文以奧林匹克運動會為標題，然而其內容實為包含各式國際綜合運動會的交流討論之看板，自 2004 年開版至今，成為網友談論相關賽事的主要留言板，且較少謾罵性的文章出現；選取 Olympics_ISG 板為採樣對象原因之二，乃是其他可能出現相關文本的留言板，由於板規以及文章數量過大需定期篩選，使得事件當時文本大量消失，唯此板留有較完整的文本可供選擇。

二、樣本選取方式與範圍

選取方式上，以「楊淑君」為搜尋關鍵字，搜尋 2010 年 11 月 17 日至 2010

⁴⁵ 成立於 1995 年，由台大資工系學生架設，原為實驗性質，後不斷發展至今註冊總人數已超過 150 萬人，尖峰時段同時進站人數達 15 萬人，擁有兩萬多個不同主題看板，每日約四萬篇新文章被發表。 參考資料來源：批踢踢實業坊網站 <http://www.ptt.cc/index.html>

年 11 月 26 日間的文章，並挑選回應推噓文⁴⁶數量高於 10 篇的進行分析，樣本數量在篩選後共有 78 篇。至於文本分析範圍，則以發文者本文為主。

第四節 中介探討－行動者意向

本章節針對問題 2-2，為瞭解媒體與大眾之間的集體記憶建構關係，當中的行動者是如何看待自己以及對方的生產方式，故透過深度訪談的方式進行。此部分問題較無法藉由文本作為分析對象，因為行動者的意向與文本產製過程往往與當下情境相關，進而造成文本的變化，然而文本的特徵卻不一定能說明行動者的背後產製動機。

是故採取深度訪談最重要的優點在於由研究者主導對談，並且能夠取得豐富且詳盡的資料，同時對於敏感的議題也較能提供精確的答案，剛好補足了文本分析上的不足（Wimmer & Dominick, 2003）。

研究的訪談採「半結構」式訪談進行，即研究者先想好訪談題綱，問題將根據文獻、所觀察現象以及前述的框架分析結果作為骨幹提出，其中題綱僅作為提示之用，訪談問題會根據現場狀況與對象進程序及內容的調整。

一、對象選擇

訪談對象，媒體方面採訪共四位，皆以體育記者為主，當中兩位受訪者為記者兼管理職，除撰寫稿件外，也參與稿件發佈的篩選工作，故對於研究中的產製問題探討，應較能有所回應；另外兩位則是當時事件的報導記者，盼能從生產者的角度探討媒體產製端是否產生組織框架與個人框架的衝突。

另外，考量訪談問題可能較為尖銳，為避免受訪者工作及生活上不必要的干擾，故採訪名單以匿名代號方式呈現，請見下表：

⁴⁶ 推噓文是批踢踢的一種文章評鑑和註解系統，使用者可直接對在文章下方評鑑好壞或加入自己的意見，而不必另外發文回覆文章。

表 3-7：訪談對象名單

對象分類	訪談對象	報別	採訪資歷	備註
記者兼 管理職	主管 A	中國時報	28 年	
	主管 B	自由時報	15 年	楊淑君事件報導記者
記者	記者 A	聯合報	27 年	楊淑君事件報導記者
	記者 B	蘋果日報	9 年	楊淑君事件報導記者

表 3-8：訪談過程

訪談對象	訪談方式	日期	訪談地點（時間）
主管 A	面訪	2011/11/21	中國時報（1 個小時）
主管 B	面訪	2011/11/18	體委會(1 個小時)
記者 A	面訪	2011/11/18	體委會(55 分鐘)
記者 B	面訪	2011/11/30	台北市立體育館(30 分鐘)

二、訪談問題大綱

研究採半結構式深度訪談進行，針對文獻中對於新聞框架產製過程中所影響要素來進行討論與提問，以了解媒體及記者個人在面對與韓國相關的衝突事件時，是否有較為不同的採訪策略？而這樣的策略與過往採訪經驗相關？或是為個人與媒體組織互動過後的結果？

詳細訪談大綱見附錄一。

第四章 新聞框架分析與討論

本章主要利用基本的描述性統計說明所蒐集新聞文本的大致輪廓，並利用卡方（chi-square）檢定，來比較各時期及各報的框架分布，是否有明顯差異；此外，也藉由所蒐集樣結果，做為進一步文本分析的依據，了解在不同情形（時期、報別）下媒體如何呈現仇韓新聞框架以及可能的產製因素。

透過以上研究程序，以回答前述研究問題如下：

1-1 韓國相關運動衝突事件中，媒體報導呈現如何的新聞框架？

1-2 不同時期韓國運動衝突事件中，媒體報導呈現的新聞框架變化如何？

第一節 基本資料分析

根據前章研究設計所界定的六個韓國相關衝突事件做為蒐集樣本，剔除部分與本文無關之研究對象後，本研究一共抽得 521 則新聞樣本；每則新聞中出現有時不只一種框架論點，框架論點在所蒐集樣本中的總頻次則為 607 次。

一、仇韓新聞文本整體分析

（一）新聞文本的報別與時期分布

由於研究中所蒐集新聞樣本跨越的時代既長既遠，為顧及報紙走向的統一以降低研究結果不確定性，除中國時報及聯合報在三時期為相同樣本蒐集母體，所蒐集樣本分別為 164 則及 158 則；自由時報部分，由於在 1980 年代尚屬地方性報紙且產權及報性與今日自由時報差異頗大，故在第一時期以報性較為相同的自立晚報做為母體蒐集對象，兩者相加共蒐集 146 則。此外，在第三時期，加入蘋果日報做為樣本對照對象，共取得 53 則。

表 4-1：新聞搜集樣本時期分布（則）

時期	報別/事件	中國 時報	聯合 報	自由 時報	自立 晚報	蘋果 日報	小計 (則數)(%)	
I	亞青杯旗歌	35	40		30		105 (20.2%)	140
	亞錦賽賽制	15	13		7		35 (6.7%)	(26.9%)
II	吳京貴賓卡	23	24	18			65(12.4%)	139
	世足賽誤判	36	14	24			74(14.3%)	(26.7%)
III	曾敬翔事件	9	10	8		10	37(7.1%)	242
	楊淑君事件	46	57	59		43	205(39.3%)	(46.4%)
	總計	164	158	109	37	53	521(100%)	

資料顯示（見表 4-1），在時期分布上，以第三時期樣本所蒐集到最多，占全部樣本 46.4%，如去除掉第三時期增加的蘋果日報樣本仍有 189 則，占全數的 40.3%。以事件計算，則以楊淑君事件為最多，亞青杯旗歌事件其次，可能與事件發生當時，所牽涉政治話題有關，前者適逢 2010 五都大選，後者則牽涉到中韓邦交原則。

但在樣本數比較上，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一時期樣本母體所處時代，報禁尚未開放，報紙的頁面相較今日較為限制，所蒐集到的樣本數，依比例原則可能本身也相對較少。

(二) 新聞文本的框架論點與框架方向分布

在所有新聞文本樣本中，本研究考量一則新聞可能不只一個新聞論點，因此採取複選編碼方式，一則新聞最多可登錄三個論點。

以此登錄的的統計結果，框架論點報導最多的是「民族自尊（以言詞或行為表現出對韓國的厭惡）」一項為 43.3%，其次則為「賽事報導（衝突事件相關追蹤與說明）」，再者為「理性自省」的 10.9%。其餘的論點則較少不到一成。（見表 4-2）

表 4-2：新聞文本框架論點分布

框架論點	次數	百分比
民族自尊	263	43.3
本性難改	34	5.6
政治口水	24	4.0
一丘之貉	23	3.8
理性自省	66	10.9
場邊花絮	22	3.6
體育發展	24	4.0
賽事說明	128	21.1
借刀殺人	19	3.1
其他	4	0.7
總和	607	100.0

從框架方向來看（表 4-3），總體的媒體報導在對於描述韓國相關衝突事件時，框架方向是略為朝向仇視韓國，占總體的 57.3%，高出不仇韓的框架方向約一成多（見表 4-3），顯示媒體在呈現上具偏向性。

表 4-3：新聞文本框架方向分布

框架方向	次數	百分比
仇韓	348	57.3
不仇韓	259	42.7
總和	607	100.0

在新聞中的消息來源分布方面，所登錄的樣目當中（表4-4），分布是較為平均的，唯一稍微偏高的是「選手或教練」一項，但並不顯著，這樣的結果顯示在這些衝突事件當中，儘管爆發的場域是在運動場上，但媒體在採訪上所呈現的意見來源不只限於體育相關的人員。

表4-4：新聞文本消息來源分布

消息來源	次數	百分比
選手或教練	165	27.2
公眾人物	143	23.6
媒體	147	24.2
民眾	150	24.7
其他	2	.3
總和	607	100.0

在所蒐集的新聞文本中，大多數報導形式則以純新聞為主，由記者屬名或是報社發訊，占總體 75.1%，其次依序則是投書的 10.9%、特稿的 9.2%（見表 4-5）。在純新聞的版面配置上，仍以體育為最大分布範圍，占全體樣本四成，其次則為焦點版的 10.7%以及綜合版的 11%，其餘則不到一成（見表 4-6）。

表 4-5：新聞文本報導形式分布

報導形式	次數	百分比
純新聞	456	75.1
特稿	56	9.2
社論	29	4.8
投書	66	10.9
總和	607	100.0

表 4-6：新聞版面配置分布

新聞版面配置	次數	百分比
焦點	65	10.7
娛樂	35	5.8
體育	255	42.0
綜合	67	11.0
政治	34	5.6
總和	456	75.1
其他(非純新聞)	151	24.9
總和	607	100.0

第二節 不同時期媒體框架差異性分析

一、不同時期的新聞文本框架差異

從（表 4-7）可看出，論點當中所蒐集到較多的為「民族自尊」與「賽事說明」兩項，而此二項論點隨衝突事件時期互相有成反比的趨向，即民族自尊論點在第二第三時期中，論點數目所占比例較多；而賽事說明則是隨著時代越趨近，所占比例越少。整體來說，三時期的論點分布是有成顯著差異的（ $\chi^2=88.375$ ， $p<0.001^{***}$ ）。

表 4-7：三時期新聞框架論點分布

框架論點	時期		
	I	II	III
民族自尊	n=54 (34.6%)	n=77 (50%)	n=132 (44.4%)
本性難改	1 (0.6%)	10 (6.5%)	23 (7.7%)
政治口水	1 (0.6%)	0 (0%)	23 (7.7%)
一丘之貉	7 (4.5%)	5 (3.2%)	11 (3.7%)
借刀殺人	6 (3.8%)	0 (0%)	13 (4.4%)
理性自省	17 (10.9%)	10 (6.5%)	39 (13.1%)
場邊花絮	4 (2.6%)	7 (4.5%)	11 (3.7%)
體育發展	8 (5.1%)	6 (3.9%)	10 (3.4%)
賽事說明	58 (37.2%)	39 (25.3%)	31 (10.4%)
其他	0 0%	0 (0%)	4 (1.3%)
總和	N=156 (100%)	N=154 (100%)	N=297 (100%)

換句話說，媒體在呈現韓國相關的衝突事件時，隨著時序有越來越朝仇韓論點部份偏向。如圖 4-1 所示，這樣的趨勢也可從「本性難改」的比重逐漸增加看出，顯示韓國的給國人較差的刻板印象有越來越固化的情形出現。至於在政治口水一項，在第三時期忽然增多，則應該與所採樣本中的楊淑君事件當時接近大選有關，使得政治人物得以將與韓國的衝突事件，做為話題互相攻訐，這樣的情形也由媒體所呈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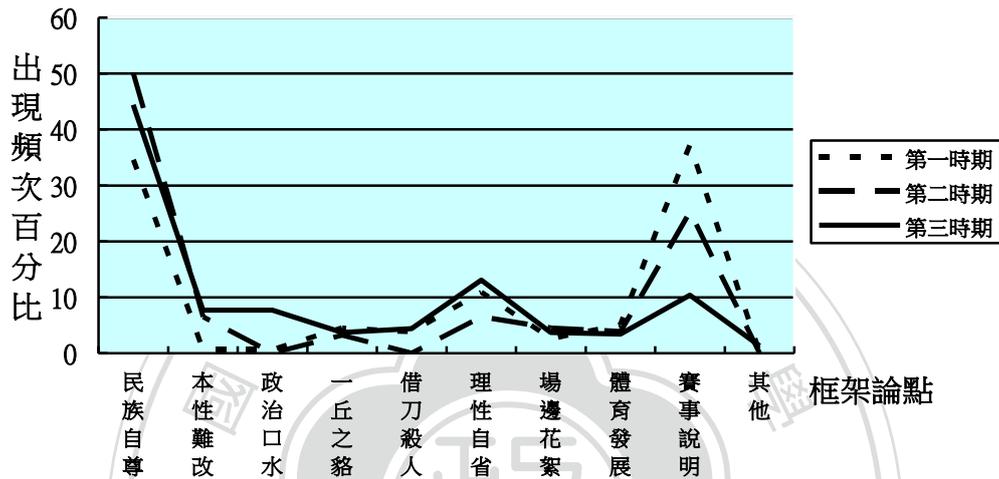


圖4-1 三時期新聞框架論點分布

從表 4-8 的三時期框架方向來看，整體達到顯著差異 ($\chi^2=23.176$ ， $p<0.001^{***}$)，也可更清楚發現媒體在仇韓新聞的呈現上，有逐漸升高的趨勢，在第一時期仇視與不仇視的比例接近四比六，然而時間經過十多年後，到了第二時期比例已翻轉成為六比四，並於第三時期仍以些微的幅度繼續上升。

表 4-8：三時期新聞框架方向分布

框架方向	時期		
	I	II	III
仇韓	n=64 (41%)	n=94 (61%)	n=190 (64%)
不仇韓	92 (59.6%)	60 (39%)	107 (36%)
總和	N=156 (100%)	N=154 (100%)	N=297 (100%)

圖 4-2 的樣本資料顯示了媒體仇韓偏向新聞文本，在第一與第二時期之間有了交叉，比例開始反轉。以本研究的時期分野來看，比例翻轉的關鍵年代介於 1985 年至 1996 年之間，最主要原因可能來自於中韓斷交所帶來的衝擊，詳細的脈絡本研究也將於接下來的章節繼續探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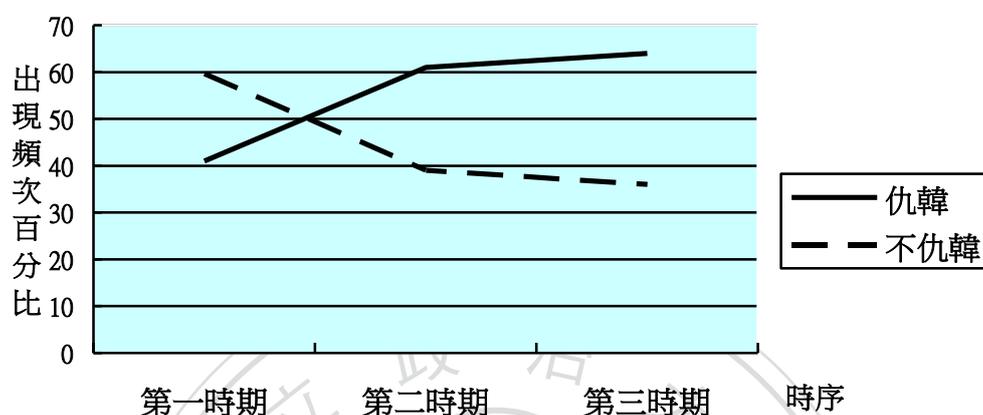


圖4-2 三時期新聞框架方向走勢

在報導形式上，從表 4-9 可知，隨著時期趨近於今，當中投書有越來越多的情形，而特稿越來越少，可能與版面增多，以及媒體增多所帶來的民眾聲音越來越重要有關係；抑或是媒體在這類事件發生時，越來越喜歡呈現民眾意見。整體的分布呈現顯著差異 ($\chi^2=51.88, p<0.001^{***}$)。

表 4-9：三時期新聞文本報導形式分布

報導形式	時期		
	I	II	III
純新聞	n=117 (75%)	n=115 (74.7%)	n=224 (75.4%)
特稿	28 (17.9%)	21 (13.6%)	7 (2.4%)
社論	7 (4.5%)	4 (2.6%)	18 (6.1%)
投書	4 (2.6%)	14 (9.1%)	48 (16.2%)
總和	N=156 (100%)	N=154 (100%)	N=297 (100%)

從表 4-10 版面配置的分布來看，也顯示距離現代越近，新聞文本所在的版面的越來越擴散，表示這類與韓國相關的運動衝突事件越來越受媒體重視，而不只出現在體育版面。整體的分布差異也在統計上達到顯著 ($\chi^2=34.195$, $p<0.001^{***}$)。

表 4-10：三時期新聞文本版面配置分布

版面配置	時期		
	I	II	III
焦點	n=3 (1.9%)	n=5 (3.2%)	n=57 (19.2%)
娛樂	4 (2.6%)	2 (1.3%)	29 (9.8%)
體育	81 (51.9%)	100 (64.9%)	74 (24.9%)
綜合	12 (7.7%)	3 (1.9%)	52 (17.5%)
政治	17 (10.9%)	5 (3.2%)	12 (4%)
其他 (非純新聞)	39 (25%)	39 (25.3%)	73 (24.6%)
總和	N=156 (100%)	N=154 (100%)	N=297 (100%)

在表 4-11 中可知，民眾的比例有變多的情形，選手等事件相關人員卻逐漸不是主要的消息來源。顯示媒體越來越喜歡去訪問民眾對於事件的意見，配合前述版面配置分布的呈現情形，也表示媒體越來越傾向將這類事件跳脫出單純的體育新聞，成為某種操作議題的痕跡。整體的分布差異在統計上達到顯著 ($\chi^2=70.538$, $p<0.001$ ***)。

表 4-11：三時期新聞文本消息來源分布

消息 來源	時期		
	I	II	III
選手或教練	n=50 (32.1%)	n=47 (30.5%)	n=68 (22.9%)
公眾人物	40 (25.6%)	22 (14.3%)	81 (27.3%)
媒體	44 (28.2%)	61 (39.6%)	42 (14.1%)
民眾	21 (13.5%)	23 (14.9%)	106 (35.7%)
其他	1 (0.6%)	1 (0.6%)	0 (0%)
總和	N=156 (100%)	N=154 (100%)	N=297 (100%)

二、不同報別的媒體框架差異性分析

本部分主要想要比較不同的報別在呈現與韓國相關事件時，是否有產生框架論點或立場上的異同。

在框架方向的分布上，如表 4-12 所示，整體來說蘋果日報與自立+自由此兩組報紙呈現較多的仇韓框架比重，而聯合報則略高於中國時報。整體的分布差異也在統計上達到顯著 ($\chi^2=14.983$ ， $p<0.01^{**}$)。

但值得注意的是，依樣本蒐集時間分段來看，第一時期中，媒體的總體框架方向比重如前述表 4-13 所示，不仇韓的比例是大於仇韓，約呈現六比四比重；但從報別來看，自立晚報如表 4-12 所示，仇韓比例便已高出五成，而後幾個時期中（表 4-14；表 4-15）也都明顯高出中時與聯合兩報，顯示不同媒體的立場有所不同。

表 4-12：四報新聞文本框架方向分布

框架方向	報別			
	中國時報	聯合報	自立+自由	蘋果
仇韓	n=90 (50.8%)	n=99 (53.2%)	n=119 (65.7%)	n=46 (71.9%)
不仇韓	87 (49.2%)	87 (46.8%)	62 (34.3%)	18 (28.1%)
總和	N=177 (100%)	N=186 (100%)	N=181 (100%)	N=64 (100%)

表 4-13：第一時期三報新聞文本框架方向分布

框架方向	媒體		
	中國時報	聯合報	自立晚報
仇韓	n=22 (42.3%)	n=26 (41.3%)	n=22 (52.4%)
不仇韓	30 (57.7%)	37 (58.7%)	20 (47.6%)
總和	N=52 (100%)	N=63 (100%)	N=42 (100%)

表 4-14：第二時期三報新聞文本框架方向分布

框架 方向	媒體		
	中國時報	聯合報	自由時報
仇韓	n=34 (54%)	n=27 (60%)	n=33 (71.7%)
不仇韓	29 (46%)	18 (40%)	13 (28.3%)
總和	N=63 (100%)	N=45 (100%)	N=46 (100%)

表 4-15：第三時期四報新聞文本框架方向分布

框架 方向	媒體			
	中國時報	聯合報	自由時報	蘋果日報
仇韓	n=34 (54.8%)	n=46 (59%)	n=64 (68.8%)	n=46 (71.9%)
不仇韓	28 (45.2%)	32 (41%)	29 (31.2%)	18 (28.1%)
總和	N=62 (100%)	N=78 (100%)	N=93 (100%)	N=64 (100%)

框架論點的分布方面，從表 4-16 可知，蘋果日報在「民族自尊」這類較情緒性的框架論點，呈現上占有比例較重，其次則是自由時報；而這兩報在「理性自省」與「賽事說明」二論點的呈現上也相對較少。另外，中時與聯合兩報則在論點上的比例都相當接近。

這樣的趨勢，筆者經過比較後，也發現如將三時期分開比較（下頁圖 4-3；圖 4-4；圖 4-5），也大致呈現如上段所述框架論點分布結果。

表 4-16：四報新聞文本框架論點分布

框架 論點	報別			
	中國時報	聯合報	自立+自由	蘋果
民族自尊	n=75 (42.4%)	n=75 (40.3%)	n=85 (47%)	n=33 (51.6%)
本性難改	9 (5.1%)	9 (4.8%)	12 (6.6%)	4 (6.3%)
政治口水	4 (2.3%)	7 (3.8%)	9 (5%)	4 (6.3%)
一丘之貉	2 (1.1%)	5 (2.7%)	12 (6.6%)	5 (7.8%)
借刀殺人	3 (1.7%)	1 (0.5%)	13 (7.2%)	0 (0%)
理性自省	22 (12.4%)	23 (12.4%)	12 (6.6%)	4 (6.3%)
場邊花絮	8 (4.5%)	8 (4.3%)	3 (1.7%)	3 (4.7%)
體育發展	7 (4%)	10 (5.4%)	4 (2.2%)	3 (4.7%)
賽事說明	45 (25.4%)	47 (25.3%)	30 (16.6%)	8 (12.5%)
其他	2 1.1%	0 (0%)	0 (0%)	0 (0%)
總和	N=177 (100%)	N=186 (100%)	N=181 (100%)	N=64 (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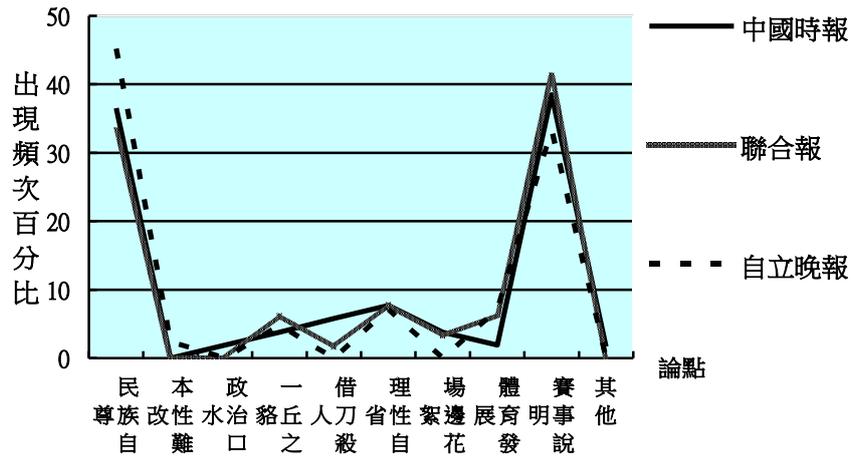


圖4-3 第一時期三報框架論點走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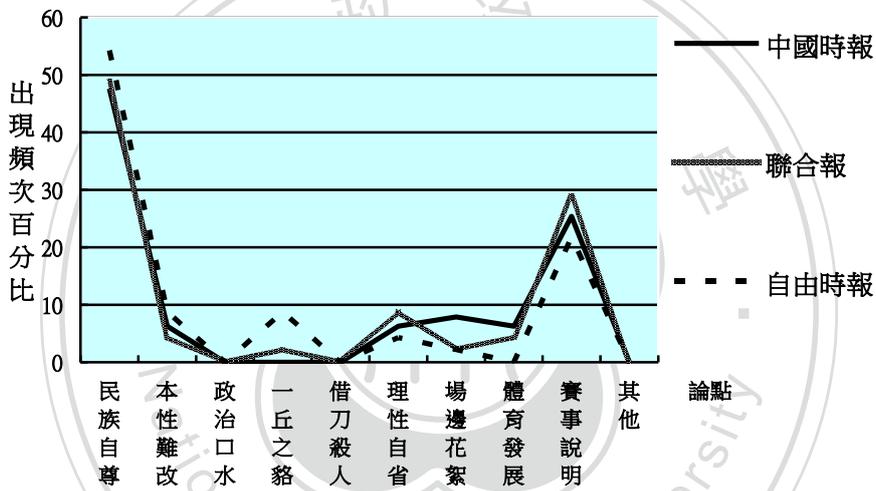


圖4-4 第二時期三報報框架論點走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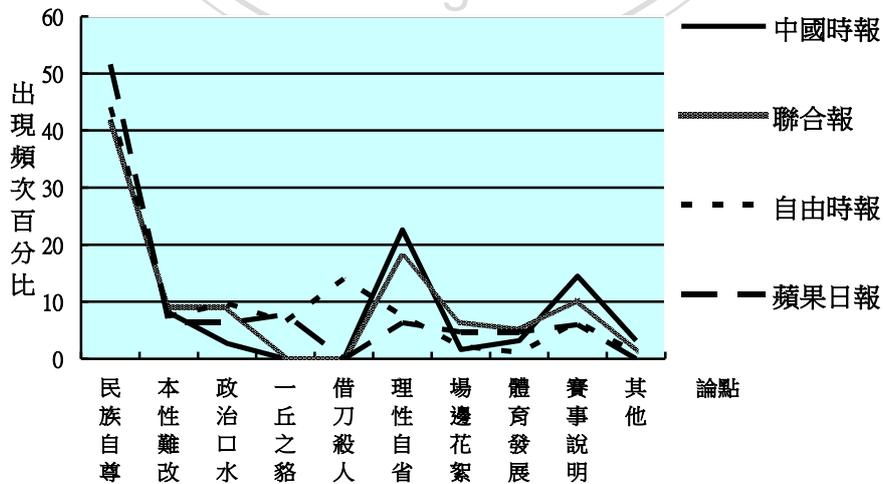


圖4-5 第三時期四報框架論點走勢

另外，從圖 4-6 可以發現，除前述所說的「民族自尊」、「理性自省」、「賽事說明」等論點有明顯的差異外，自立+自由這一組新聞樣本資料，在「借刀殺人」論點以 7.2% 特別高出其他三報，筆者交叉比對後發現（下頁表 4-17），此論點全部集中在楊淑君事件中，顯示自由時報在此事件中，與他報有立場差異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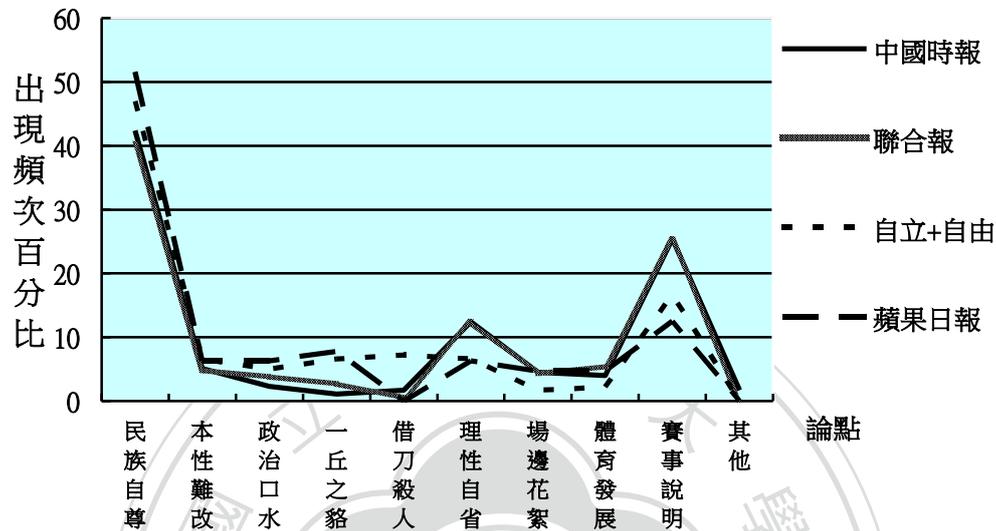


圖4-6 四報框架論點走勢

表 4-17：四報「借刀殺人」框架論點分布

時期	媒體			
	中國時報	聯合報	自由+自立	蘋果日報
I	n=3 (5.8%)	n=1 (1.6%)	n=0 (0%)	缺
II	n=0 (0%)	n=0 (0%)	0 (0%)	缺
III	0 (0%)	0 (0%)	13 (14%)	0 (0%)
總和	N=3 (100%)	N=1 (100%)	N=13 (100%)	N=0 (100%)
*楊淑君 事件	0 (0%)	0 (0%)	13 (17.6%)	0 (0%)

至於版面配置上如表 4-18，整體分布差異也在統計上達到顯著 ($\chi^2=30.388$ ， $P<0.01^{**}$)。總體來說蘋果日報分布在體育版的比例最少，而在娛樂版、焦點版、綜合相對他報比重較多，顯示將體育新聞的版面擴散最廣，可由此推論當遇到這類事件，較為著重，而呈現相對明顯版面配置差距；至於自立自由則以政治版的比重最高，可能與其較為特殊的關懷本土路線有關係。

表 4-18：四報新聞文本版面配置分布

版面配置	報別			
	中國時報	聯合報	自立+自由	蘋果日報
焦點	n=12 (6.8%)	n=5 (3.2%)	n=27 (14.9%)	n=13 (20.3%)
娛樂	11 (6.2%)	2 (1.3%)	8 (4.4%)	8 (12.5%)
體育	78 (44.1%)	100 (64.9%)	75 (41.4%)	18 (28.1%)
綜合	15 (8.5%)	3 (1.9%)	23 (12.7%)	12 (18.8%)
政治	9 (5.1%)	5 (3.2%)	17 (9.4%)	0 (0%)
其他 (非純新聞)	52 (29.4%)	39 (25.3%)	31 (17.1%)	13 (20.3%)
總和	N=177 (100%)	N=186 (100%)	N=181 (100%)	N=64 (100%)

第三節 文本分析與討論

此部分主要希望以前面二小節所得到的量化資料作為支撐，進一步解釋在不同時期的媒體在面對與韓國的衝突事件時，是如何呈現以及反應當時的時空背景，希望藉由文本上的蛛絲馬跡，來闡述這些樣本所呈現出來量的差異為何，以思考文本呈現的意義如何。

一、政治摩擦期：「唇」亡「齒」未必怕寒

在過去十年間，台灣民眾的反韓情緒並未再隨著雙方關係的低盪而升高，卻是不幸中的大幸。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台灣人的反韓情緒有相當大的成分是一股強烈的「受害意識」所激發出來的。

(朱立熙，1993：33)

在中韓斷交的次年，國內資深的韓國專家朱立熙，以這樣的一段話一刀劃開了過去十年台灣人仇韓情緒的五臟六腑。回顧近代歷史，中韓是兄弟之邦，同是東亞反共陣線最堅強的患難兄弟，南韓駐華大使金信便曾經用唇亡齒寒來形容這段關係：

中韓之間的關係，一般都稱為兄弟之邦，但金信大使認為兄弟之邦還不足以說明兩國關係之密切。他說，中韓兩國利害、安危與共，這層關係是唇亡齒寒，有一方受到意外變故，另一方的安全也受到影響。⁴⁷

在這樣的承諾下，一九七零年代陷入外交困境的台灣，在中美斷交後，只剩下三個比較大的邦交國——南非、沙烏地阿拉伯還有生死與「共」的韓國。然而國際外交本就沒有永遠的朋友，因為地緣政治以及經濟上的需要，南韓從八零年代加速推動「北方政策」，開始與中共交好，讓台韓關係開始產生變化。

陷入國際外交困境的台灣，當然不願放棄這個還有傳統友誼的友邦，盡全力對韓國示好，政府在歷次的經貿談判「給予」韓國讓步與優惠，然而台灣人民都知道那是「委屈求全」不得不如此。朱立熙（1993）便認為就是這樣的過程，讓台灣人將反韓的情緒與受害意識深深嵌入在淺意識中。

這樣的情緒容易反映在任何一個起火點上，在亞青盃事件中便可以看出這種

⁴⁷ 〈金信大使臨別情懷〉1971-01-08/聯合報/二版

官方與民間之間的意見差距：

外交部長朱撫松十三日指出，韓國與我國都是反共國家，由中共支持北韓南侵的事實，可知中共與韓國的基本利益仍是衝突的，他相信我國與韓國仍會有很好的交流、合作關係。……朱撫松說，有許多人懷疑中韓友誼是否存在？它認為中韓友誼依然存在。但期間已有不愉快與問題存在，必須雙方努力克服、維護，已減輕傷害。⁴⁸

洪文棟委員建議，六月份舉辦的瓊斯杯籃賽，可以不必邀請韓國，此外可以不買高麗參，不買小馬汽車，不買韓國瓷器，不坐韓航班機，不去韓國觀光，不買韓國蘋果。蕭瑞微委員強調，外交講求現實，我們外交部卻講道義，外交部不能認為此一事件祇是韓方小部份人作法而予容忍，應該重振國家的骨氣

我國駐韓大使薛毓麒今天表示，他正盡最大努力處理亞青杯的善後事宜，他希望中韓兩國因此事件造成的傷痕，能夠很快復原。薛大使強調，中韓兩國絕不能因此一事件，讓中共離間中韓友好關係的企圖得逞。⁴⁹

林鈺祥委員指出，政府有關首長在處理亞青杯事件中自欺欺人，行政院秘書長瞿邵華在立法院表示亞青杯事件純屬民間交流活動，政府間的關係不受影響，這種話恐怕連秘書長自己也不會相信。⁵⁰

政府官員拼命的希望修好關係，但民間或是民意代表則抱持著質疑的態度，強烈的反彈或抗議。媒體在報導時，也多呈現出中韓友誼仍然友好的情形，或是反映出韓方對事件發生感到相當遺憾與憤怒，大致都將事件本身視做單一事件處理，而非「連坐」將帳算在所有韓國人上：

金大使說，全斗煥大統領對中韓兩國傳統友誼至為重視，並稱韓國政府對於我籃隊退出比賽一事極為重視與關切，金大使除了表示遺憾之外，並且深盼中、韓傳統友誼不致受此一事件之影響。⁵¹

⁴⁸ 〈中韓友誼仍然存在 合作交流仍將繼續〉1984/04/14 /中國時報/二版

⁴⁹ 〈參加國際活動 因時因地制宜 遵守基本國策 要求公開公平〉1984/04/14 /聯合報/三版

⁵⁰ 〈不滿我對亞青杯事件處理方式 立委籲採強硬態度 維護尊嚴切莫遷就〉1984/04/11/自立晚報/二版

這些人士在電話中均痛切指責韓國籃協背信忘義，厚顏媚匪，而無可彌補的地傷害韓國與中華民國悠久的友誼，他們特地代表韓國向中國友人致歉，並且堅決地表示他們支持中華民國的立場，並希望中韓間友好關係不致受到此次事件影響。⁵²

中華民國青年男、女籃代表隊今天離開漢城時，南韓主要報紙和電視所表達的輿論，都對南韓籃協第八屆亞洲青年盃籃球賽違背對我們承諾表示，這是一種不可彌補的嚴重誓信錯失。⁵³

相較第二與第三時期，媒體對於韓國仇視的言論較少也較為理性，多是替韓國說好話，或是將罪魁禍首轉移到中共身上，認為這是一種「借刀殺人」，台灣人應該要能夠以國際關係的角度來看待這樣的事件：

這個時候我們衝動或感情反應，正好中了中共破壞韓國與中華民國關係的下懷。中共的想法是，目前雖受制於北韓，不能與韓國建交，但能疏遠韓國與中華民國關係，也是一大的收穫。⁵⁴

在抗議的言論中，此時還也尚未出現台灣人對於韓貨或韓流的一種如江佩蓉（2004）所說的越消費越恐懼的媚韓、恐韓的情況出現，在這個階段取而代之的是一種以大國制裁小國的心態，至少在經濟上，對韓國是充滿自信的：

一名經濟學者昨天表示，我國對韓國貿易為入超，如禁止韓國小馬汽車及人蔘進口，對我國經濟不會產生任何不良影響。他認為，我們應當對韓國的背信行為採取適當的反應。他指出，當初我政府特准小馬汽車進口，是在韓國承諾購置我國汽車零件的條件予以同意的，但韓國卻未履行承諾，我方一直未採行任何措施，似嫌軟弱。現應就這次籃賽事件，適當反應。⁵⁵

整體來說，在第一時期與韓國相關衝突事件的新聞文本中，媒體對於事件較少去呈現對韓國進行謾罵或針對性的語句，在中韓仍有邦交的狀態下，媒體也似乎相對的反應了一定的當代時空背景。

⁵¹ 〈全斗煥對我退出比賽極表關切〉1984/04/11 /中國時報/焦點

⁵² 〈不滿韓國籃協背信 韓人紛打電話向我使館道歉〉1984/04/11/自立晚報/二版

⁵³ 〈南韓違信背諾錯失 輿論認為無法彌補 並以巨大篇幅分析報導〉1984/04/10/中國時報/三版

⁵⁴ 〈旅美學者看亞青杯事件 認清現象環境·宜採務實步驟 國際關係錯綜·勿中中共詭計〉1984/04/12/聯合報/二版

⁵⁵ 〈罷吃高麗蔘·不搭韓航機 韓方食言背信·各界強烈抗議〉1984/04/10/聯合報/三版

在發生背景較為單純的亞錦賽賽制變動事件中，韓國儘管至中期才變動賽制，造成當屆同時出現三個冠軍的這種「奇景」，但或許是當屆台灣沉浸在獲取金牌的喜悅中，對於此事並無太大著墨或是草草帶過：

韓國棒球協會今天臨時推翻既定的競賽規程，改為中日韓三隊的戰績若相同時，三隊並列冠軍，而不再加賽爭冠軍。

這項改變等於確保韓隊穩居本屆亞洲杯冠軍，不再參與三隊加賽的混亂戰團。亞洲杯剩下十三日兩場比賽，若日勝澳、中勝韓，中日韓三隊戰績同為五勝二負，照預定賽程，先要抽出一支種子隊，由另兩隊交鋒，勝隊再和種子隊爭冠軍。⁵⁶

當中只有自立晚報有出現較為針對韓國隊在此次比賽的批評，並對其民族性開始做出描述：

韓國民族性是好強愛面子的，只要國際比賽在韓國舉行，他們就非得到冠軍不可。亞洲杯棒球賽舉行過十二屆，其中有四屆在韓國舉行，冠軍都是韓國隊取得，其他八屆在別的国家舉行，韓國就得不到冠軍。⁵⁷

從上可知，在此階段，在中韓仍有邦交的狀況下，媒體對於韓國的描述儘管因事件的發生必然有對韓國抗議或不滿的聲音呈現，但更多的是對自己的務實反省或是較為理性的去看待事件發生的原委，主要則在賽事衝突的細節上去做追蹤，較少出現針對性的字眼或是冠上刻板印象。

二、後斷交期：漸離漸遠的那個「他」

政治上，一九九二年，韓國無預警的宣布與中華民國正式斷交，緊接著來的是撤使、斷航，這段歷史讓台灣人徹底對兄弟之邦的幻想破滅，也象徵台灣與韓國從原本的盟友關係漸離漸遠。

在經濟上，過去八零年代台灣經濟起飛，創造了世界驚豔的經濟奇蹟，韓國相對而言，無論在產業或政策上，都還未起步，在國內甚至興起一股「台灣學」風潮：

⁵⁶ 〈我成棒昨大勝澳隊 今戰韓軍背水借一〉1983/09/13/聯合報/三版

⁵⁷ 〈只要主辦國際比賽 韓國就非爭得冠軍 亞洲杯成棒如此這般又如願了〉1983/09/13/自立晚報/三版

最近韓國漸漸萌出「向台灣學習」的念頭。一九八三年來，韓國經濟鉅子，現代財團會長鄭周永，幸福金星財團會長具滋暻，大宇財團會長金宇中及大農會長朴龍學等人，曾經連袂飛往自由中國·台灣訪問……當然韓國政府也不例外，部內無不瀰漫著關心台灣的空氣。(崔林青，1987：53)

然而當時序進入九零年代末期以至千禧年過後，韓國雖經歷 1997 年的金融風暴，卻在短短數年間爆發性的成長，無論在 GDP、GNP 或外匯存底上都緊追甚至超越台灣，如以經濟成長率來看，2001 年台灣、新加坡均為負成長，只有韓國成長 2.8%，到了 2002 年第一季，韓國更以 5.9% 的經濟成長率高居亞洲四小龍之冠（楊瑪利，2002）。

而台韓之間的競爭不止是在經濟成長率的比較，更直接的是在產業的競爭性，邱俊榮（2006）針對 2005 年以降十年間台韓間的經濟發展進行分析後發現，台韓兩國在產業的發展上有高度的雷同性，皆以電子產業做為主要出口，而台韓在美、日、歐三大消費市場出口占有率自 1998 年以來，開始產生反轉，不是被拉近就是被超越。

這樣的時空背景也反映在新聞文本上，在量化的資料中可以發現，這個時期媒體對於韓國的呈現開始翻轉，仇視韓國的文本比例較第一時期明顯變多，而在論點的變化上，對於賽事的報導比例下降，取而代之則是民族情緒的抒發較多，並且往往會提到過去對韓國的「受害經驗」：

中華男籃隊這一歷史性的冠軍，不僅讓我國在釜山東亞運閉幕壓軸戲的男籃冠軍賽，成為最佳男主角。而且讓在司令台上的中華代表團團長張豐緒，在與韓國代表團團長崔鉉烈並肩坐在貴賓首席，爭足了驕傲的面子。十天前開幕時他為吳京部長被換卡受辱的積鬱悲情，頓時拋出九霄雲外。

甚至，五年前被韓國片面斷交而憤怒的中華民國外交部，也於昨日由台北特致賀電給釜山東亞運的中華男籃隊，認為這也是為他們出了一口氣。⁵⁸

⁵⁸ 〈男籃金牌國人驕傲〉1997/05/20/中國時報/特稿

自從一九九二年中、韓斷絕邦交，接著中、韓斷航，及前些時的我國準備將核廢料運往北韓，中、韓兩國關係的惡化，就像是一道傷痕不但沒有癒合結疤，反而在昨天的吳京換卡事件把傷痕拉扯得更大。⁵⁹

此外，在追究責任時，這個時期對於媒體在呈現韓國相關報導時，大致已不再說好話，或是替其開脫罪名，如吳京貴賓卡事件，同樣與先前的亞青盃事件大致屬於政治干涉體育的範疇，然而在此時期，媒體則用較直接的指涉方式指責韓國或是與其一同的共謀者：

中華代表團昨天在東亞運受到不平等待遇，教育部長等首長的貴賓證件製作好了又被降級，南韓明顯地以政治干涉體育，待客之道非常失禮，有違承辦大型國際運動會的東道主身分。⁶⁰

我教育部長吳京等人的貴賓卡被降級，中華代表團分析來龍去脈後，認為籌備會主席金雲龍脫不了關係外，也出現「大陸官方應曾向南韓政府施壓，最後由青瓦台直接下令執行」的說法。

據中華代表團本部官員了解，當初答應給吳京等人貴賓卡的籌備會官員遭到修理，出發前和韓方聯絡都含糊應付，吳京住的飯店房間也在抵達前一刻才確定，種種跡象顯示會出事，果然如此；依此判斷，韓方早有預謀，金雲龍身為主席不可能不知道。⁶¹

至於在 2002 年世界杯足球賽，其實更顯示出了台灣人對於韓國的一種在意心態，本身並非參賽國的台灣，身為亞洲的一員，眼看韓國一路過關斬將進入四強，從民族血緣上來看，台灣與韓國相較於歐洲金髮碧眼的強權們應該更為親近，然而台灣觀眾與媒體所表現出來的卻是一面倒的抨擊，當中多是針對此次賽事與韓國隊的多次誤判，認為韓國勝之不武，然則仔細看其中原委，卻似乎有其潛台詞：

回顧歷年來的運動競賽，南韓為了贏得比賽無所不用其極，臉皮厚到令人難以想像的地步。當年南韓政府為了與中共建交，對我極盡羞辱之能

⁵⁹ 〈東亞運縱橫談〉1997/05/11/中國時報/特稿

⁶⁰ 〈我貴賓證件遭更改降級 如此待客 那像主人〉1997/05/11/聯合報/東亞運特別報導

⁶¹ 〈東亞運風波 吳京被「降級」中共施壓 青瓦台下令執行〉1997/05/12/聯合報/政治

事，直到上個月強力阻撓總統夫人吳淑珍參訪，對台灣的欺凌可謂一路走來，始終如一。

沒錯，世界盃比賽勝負與台灣無關，但球迷最不願見到的就是放水、不公平的競賽。這不是「別人吃麵，我們在喊燙」，而是筆者對粗暴的阿里郎已經受夠了！在此呼籲國人別再迷戀韓劇、韓貨⁶²。

從讀者投書的文字中或多或少反映出當時國內的仇韓心態，是一種一路以來的「受害者自白」，不得不跳出來說句公道話。無論是在政治上的被背叛，運動場上的小動作到最後文末的抵制韓劇、韓貨，這種憤慨似乎早已超越了被誤判導致出局的義大利、西班牙兩國，也更來得深刻。

因此，媒體在報導時也似乎開始去呈現這種刻板印象，或用其他相關事件新聞來加深關於韓國的負面訊息，並且在這些訊息裡，仇視的對象已也從原本應該的從體育場上的就事論事，變成鐵板一塊的「韓國」或「韓國人」：

「亞洲人是這麼搞足球的嗎？」原本西方蔓延 1000 多年的「亞洲黃禍情結」，在 21 世紀地球村漸形成共識時，被南韓這麼一攪和，東西方民族薄弱的信任感再次被撕裂。連亞洲國家包括台灣、大陸、日本等地的球迷、媒體，也對南韓蠻幹的作法無法認同而予譴責。

而南韓最大的損失，是「南韓主辦的運動競技，必會運用裁判優勢來左右勝負」，已在台灣、大陸、日本等地民眾心裡形成難以磨滅的刻板印象而對南韓缺乏信任感，這才是南韓最大的損失。⁶³

義大利由足協副主席馬克希尼具名，向南韓足協發出挑戰書，要求南韓選擇一個中立國家與義大利再戰一場，讓球員可以不受外界干擾，公平的對決一次，進而消弭義國的民怨。

但這項消息被南韓視為笑柄，認為義大利人在做白日夢。尤其目前南韓已進入前 4 強，比賽還在進行，南韓隊根本沒有體力也沒有時間再

⁶² 〈裁判不公 阿里郎勝之不武〉2002/06/22/自由時報/讀者投書/張婷

⁶³ 〈強出頭 南韓得不償失〉2002-06-26/中國時報/世足賽專刊

戰一場。南韓媒體更評論說，南韓進入4強，地位已不可同日而語，憑什麼要答應他們？⁶⁴

韓國在這些報導裡，變成了一個亞洲之恥，是造成東西方民族無法和平相處的罪魁禍首，是一個小動作很多的國家，而義、西兩方是這場不公平競爭下的悲劇英雄，英雄們連場外在較勁的最後機會都沒有，所能留下的，只剩下韓國高麗棒子們高高在上的睥睨模樣。

在媒體呈現的報導形式上，也似乎有著某種規則，也就是在純新聞的報導上，所呈現的往往是韓國的負面訊息，而在社論或是讀者投書的部份，則常會出現理性看待的觀點，為事件來做解釋與分析：

我們一直訴說南韓是靠裁判偏袒才能把葡萄牙、義大利、西班牙幹掉，但是在球賽進行時雙方球員都必須服從裁判的決定，不論是誤判或判決不公，雙方都是宣誓過必須遵守的。到目前為止，從播出的所有比賽畫面並沒有看到任何有韓國球員不服從裁判或威脅裁判以影響判決的情形發生，相反的是對手卻時常意圖在比賽中影響裁判的決定，尤其是在韓西之戰主審裁判對韓國犯規之執法較嚴，韓隊卻從未抗議。⁶⁵

台灣何時變得要靠辱罵韓國來明哲保身，或凸顯政治正確？雖然這次比賽裁判也的確有偏袒韓國之嫌，但是有必要這樣瘋狂攻擊韓國嗎？第一個，全世界除了義大利和台灣以外，歐美日的媒體並沒有認為這場比賽過份到無法忍受的地步，甚至普遍認為義大利戰術過於保守、體力也不如對手，失敗也不是沒有原因。第二，地主國本來就存在裁判偏袒的優勢，這也是為何地主國通常在歷屆世界盃會拿到較好的名次的原因。第三，論小動作而言，哪一國沒有？墨西哥對美國的十六強比賽，小動作比韓義之戰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但卻不見國內球迷或網友的撻伐，和獨厚彼而薄此？⁶⁶

從第一至第二時期，可逐漸看出媒體對於民眾聲音越來越重視，除了在讀者投書的呈現外，在新聞報導中也不時可以看到網友的反應，不過有趣的是，媒體

⁶⁴ 〈黑哨冤魂要報仇 義西揚言單挑高麗棒 南韓回答以後再說〉2002-06-25/中國時報/世足專刊

⁶⁵ 〈裁判若犯錯，罪不在南韓〉2002-06-25/中國時報/時論廣場/黃家健

⁶⁶ 〈韓晉八強 有那麼嚴重嗎？〉2002-06-21/中國時報/時論廣場/愛竹

所報導的民眾反應大多數又與讀者投書立場呈現明顯的差異：

網友 Sirokame 開心說：「德國隊真是正義使者；看完這場比賽，真是大快人心！」網友餛飩說：「強隊總算出頭；公理終究還存在世間。」

Abby 則以為：「突然發現要贏得一場真正勝利，裁判是很重要的。我愛德國，更愛今天公正的裁判；沒有您們，今天是無法看到公正精采的球賽。」 網友 Linben 興奮表示：「哈哈，泡菜的賤招沒有用了；坦克碾過泡菜了，帥！」 Moviecatcher 說：「三流的球隊，果然不敵一流的正規軍。」⁶⁷

一位有先見之明的網友公開呼籲，台灣同胞最好暫時取消或延後歐洲特別是義大利之行，以免到了當地被誤認是高麗棒子，慘遭不測。

網友 Fish 表示：「南韓隊好賤，喜歡搞小動作；裁判誤判又護航，義大利太可憐了！」 Jeremy 說：「如果裁判判決偏向義大利，可能在南韓會被活活打死……」 Entman 則說：「南韓只要辦比賽都是這樣。連全球轉播，大家看得清清楚楚的世界盃也敢這樣搞。想把韓片 DVD、老婆的韓劇通通丟掉。」⁶⁸

在這些報導和網友的反應中，可感受到在這個階段，韓國的刻板印象越來越「深植民心」，這種情緒來自於中韓斷交以來的被背叛，以及台灣人在其他場域如經濟或是運動場上競爭時的「吃虧經驗」；而韓國近年來的經濟崛起所帶來的韓國商品與韓國大眾流行文化，在文本中的許多反彈聲音中都被提到，顯示了讓台灣人對於韓國的存在越來越重視。

而媒體在呈現上，也開始翻轉迎向大眾，對於賽事衝突的本身重視的比例降低，而較多的是去敘述韓國相關的衝突點與對立性，以及表達國內民眾不滿的情緒，在描述的手法上，也開始加入形容詞與特定用詞加強語氣，並且營造正反雙方的角色增加可看度。

三、全球化競爭時期：看見韓國的那個「我」

千禧年過後，韓國流行文化開始流行，在過去韓貨如江佩容（2004）所說被

⁶⁷ 〈強隊總算出頭天，網友一片叫好聲〉2002-06-26/中國時報/綜合報導

⁶⁸ 〈台灣網站 義憤填膺 批韓聲浪一面倒〉2002-06-20/中國時報/世足賽專刊

當做劣質品或次級品的印象開始扭轉，轉而代替的是一種與日本匹敵的新潮流⁶⁹，這樣的情形在本研究所蒐集新聞樣本當中也可看出蛛絲馬跡：

亞運楊淑君遭判失格事件，引發國人反韓情緒，甚至網友串連發起拒用韓貨、拒看韓劇等具體行動。這一連串排韓效應，也讓原本在台受歡迎的韓貨一夕間身價爆跌，賣場也出現韓貨賣不動、消費者轉而選擇台製、日製品牌等選邊站情形。有量販業者也順應情勢，把韓國泡麵撤下促銷區，由本土品牌泡麵取而代之。⁷⁰

「反韓」聲浪中，韓劇卻不受影響，八大《同伊》收視節節高升，東森《料理絕配 PASTA》更創新高，緯來《錯愛一家親》也不降反升，顯示韓迷不動如山，愛看就要看。⁷¹

從這類新聞論述當中，可以發現韓貨或是韓國流行文化在台灣已經是一股無法忽視的潮流，也因此當與韓國的衝突事件發生時，也成為眾人第一時間想要去抵制的對象，然而透過抵制的這種強烈程度，更能突顯出韓國流行文化在台灣風行的一種矛盾心態。

這種心態隱含著一種喜愛卻又仍懷著恐懼，這種喜愛來自於優質商品以及令人著密的大眾流行文化，但恐懼的是過去與我們並駕齊驅甚至是落後的韓國竟然成為我們所羨慕的對象，也因此這些聲音總還是以韓國做為一個比較對象，仿佛在韓國身上看到自己過去榮光的影子，但在這些聲音底下仍有著很深的刻板印象，懷有著韓國只是會耍一些小技巧，認為韓貨的流行只是偶然或是台灣一定不能輸的心態：

徐秀貞說，做生意三十幾年，過去韓國廠商只會模仿台灣，台灣人做什麼，他們就跟著模仿、搶訂單，這幾年藉著韓國明星打進台灣市場，美妝品 BB 霜、雪花秀賣翻天，但自從亞運事件爆發後，韓國廠商也開始緊張了，還說希望台灣消費者不要反應過度。⁷²

⁶⁹ 依據東方消費者資料庫資料顯示，但自 2002 年開始，韓國電視劇首度以 13.8% 超越日本電視劇的 7.8%，成為閱聽人最常收視的外來電視戲劇節目。

⁷⁰ 〈泡菜泡麵急撤 韓式料理店急凍〉2010-11-21/中國時報/焦點

⁷¹ 〈黃立成反韓 火判李玖哲甬發片〉2010-11-19/中國時報/影視

⁷² 〈聲援楊淑君 美妝店韓貨全下架〉2010-11-20/自由時報/台北都會

「大砲」陳昭榮在臉書說，當年經歷四小龍年代，看不起韓國，沒想到現在追過台灣，「氣憤歸氣憤，但也感慨，我們一定要強壯起來，希望台灣更團結，我們不能輸他們。」他沒去過韓國，不過老婆愛看韓劇，「她這禮拜如果看韓劇，會被我關掉。」他還說不服輸的氣勢要有啦，抵制韓貨，從拒吃泡菜開始。⁷³

這種隱藏的焦慮不斷累積，隨時等候著一個適合的出口宣洩，運動場域的強調公平性以及國家選手所帶來的國族想像提供了一個可以「客觀評論」韓國的良好環境。是故從前一個時期可以發現，在運動衝突事件發生時，韓國的刻板印象已逐漸的被確立，相較於第一時期對於韓國的包容性，第二時期開始媒體的呈現越來越直接，對事件的追蹤或說明逐漸變少，情緒性的花絮或是形容詞也變多。

比對第二個時期，第三時期仍繼續延續這樣的發展，當在處理這類與韓國相關的運動衝突事件時，往往媒體在意的是有沒有韓國人？是不是「又」是誤判？台灣人是不是「又」被欺負了？進而痛斥韓國人的運動民粹主義，表示這是一種「本性難改」：

南韓與中國是東亞有名的民粹主義運動大國，打得贏靠技術，打不贏靠愛國。南韓在國際上早已聲名狼藉多年，就是因為裁判不公平和選手的粗暴……在場觀賽的曾志朗對裁判大喊：「你是摸著良心宣布結果嗎？」曾教授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了。他們若有良心，也不會在國際上惡名昭彰了。⁷⁴

多年來，跆拳道運動的金牌多為韓國選手包辦，而韓國更是國際跆拳道比賽合法裁判的直接間接認證國。在歷次歷年的國際跆拳道比賽中，台灣與各國選手被韓籍裁判或記錄員「黑哨擊敗」的爭議事件層出不窮，而雪梨、雅典兩次奧運地主國也碰巧被「奉送」金牌，頗為神奇。每逢國際比賽，這項運動在國人心中，就自然蒙上一層陰影；大家都知道，除了實力與戰鬥意識之外，還得禱告不會遇上韓流騷擾。這次楊淑君被判失格，

⁷³ 〈陳昭榮籲台灣強 禁老婆看韓劇〉2010-11-19/中國時報/影視

⁷⁴ 〈蘋論：老牌不要臉〉2009-12-09/蘋果日報/社論

國人的情緒之所以如此憤怒，絕對與大家長久以來對韓國與跆拳道之間的怪異感受有關。⁷⁵

在這裡面，除了許多刻板印象的「封號」不斷出現，如黑哨、民粹主義大國等，媒體更喜歡用上許多加強性的形容詞如聲名狼藉、層出不窮、惡名昭彰等等，或是在客觀事實上加入許多主觀性的描述：

曾志朗說，他立即上前抗議並用從未如此流利的英語表示：「我們尊重奧運的精神及和平，但運動場上要公平且公正的競爭，不公平競爭下，選手受威脅且有犯規動作是不對的」。但是仲裁委員召集人不敢看這些證據，僅向他及大會鞠躬就離開會場。⁷⁶

叱咤！（韓文，音同皮摳背，意即可恥！卑鄙！）日來謊話連篇的南韓籍世界跆拳道總會秘書長梁振錫昨厚顏第三度舉行記者會，他雖然首度承認楊淑君腳跟的感應貼片在比賽前就取下，但仍傲慢栽贓楊意圖作弊。⁷⁷

此外，有趣的是，在過去的運動衝突事件中，媒體所在意的爭論點許多便是與誤判或是韓國裁判不公有關，也就是將仇視韓國的焦點放在追求運動的公平性，然而台灣人在曾敬翔事件中，自己似乎卻也逃避不了這樣的國族情緒：

對手以「非法」攻擊得分，裁判卻「明眼無視」，除肉體上痛楚，曾敬翔還要面對身為邊審的自家裁判賽後不挺自己的無情打擊，身心都受創的他，是用一連串的傷痛，換來這面銀牌。⁷⁸

跆拳道執行秘書長李勝陽甚至表示，鄭大為在關鍵時刻沒有為台灣隊據理力爭，非常不應該，他已經向秘書長何豐彥報告，這也讓鄭大為遭受內外兩方面的壓力。⁷⁹

在這些論述中，可以發現在處理這些事件時，媒體所著重的許多並非運動衝突事件的原因探究，而是在稍微敘述過程後，迅速的抓出「戰犯」以及「正義的

⁷⁵ 〈力挺楊淑君 讓跆拳道黑哨消失〉2010-11-24/中國時報/社論

⁷⁶ 〈曾志朗返國：台灣尊嚴不能丟〉2009-12-09/中國時報/運動天地

⁷⁷ 〈高麗騙子3天3改口 終承認楊淑君賽前已取下感應片〉2010-11-20/蘋果日報/頭條要聞

⁷⁸ 〈「銀」色東亞運 笑痛兩般情〉2009-12-15/自由時報/體育

⁷⁹ 〈東亞運跆拳道賽 鄭大為成箭靶〉2009-12-09/自由時報/體育

一方」，並且去找出韓國人可能涉案或出現的地方，在曾敬翔事件中，到最後竟然連當時副審鄭大為的妻子都被牽涉其中，成為與韓國牽連的「證據」：

在東亞運上判決南韓犯規攻擊「得分」的台灣副審鄭大為，近來不但被外界批成「全民公敵」，連日來接到不少騷擾電話，更有網友查出鄭大為的妻子是韓國人，質疑鄭大為根本是「台灣韓僑」。⁸⁰

韓國的快速崛起，造成了東亞各國的焦慮感，在日本出現《嫌韓流》這類仇韓刊物，大陸則是在 2005 年過後不斷的出現某某為韓國人的錯誤報導，對於混雜著中台認同的台灣人而言，也因此在這個議題上異常的反應激烈，從而成為在這個階段新增的一項證據，方便控訴韓國人不擇手段的慣習：

韓良圻說，韓國以前稱高麗國，近期才譯為韓國，而韓姓有歷史可循就超過一千五百年以上，近年韓國爭議事件不少，屈原、孔子都說是韓國的，連豆腐也變成韓國人發明的，真是莫名其妙，認為沿用「韓」字為辱，因此希望內政部、外交部等部分，將高麗國翻譯改為「寒」國。⁸¹

儘管這類某某為韓國人的錯誤報導在當時很快地為韓國媒體所駁斥並證明子虛烏有⁸²，甚至自由時報在後來藉由讀者投書刊登舉證，表示這些根本只是網路上的流言⁸³，然而一旦遭遇到韓國的欺壓時，這些「本性難改」的印象仍舊一股腦的衝破理智線：

南韓媒體「亞洲經濟」報導楊淑君事件，並翻拍民眾怒燒南韓國旗的電視台畫面，內文中引述南韓網友們的看法，其中有南韓網友表示楊淑君的跆拳道對手是越南人，主審也不是韓國人，不了解為什麼要反韓。

只是南韓人稱孔子是韓國人，美女西施、神醫李時珍也早被劃入「韓國籍」，這次卻說韓裔裁判不是韓國人，實在是令人傻眼。⁸⁴

從上述這些文本可知，這個時期媒體在處理韓國相關的運動衝突事件時，越來越朝向國族情緒上作發揮，並且在論述過程中為韓國「羅織罪狀」，迅速地為

⁸⁰ 〈鄭大為助韓成全民公敵 網友爆：鄭太太是韓國人〉2009-12-10/自由時報/體育

⁸¹ 〈韓姓宗親蒙羞 要求韓國譯寒國〉2010-11-23/自由時報/北部綜合

⁸² 〈荒唐的臺灣媒體〉2008-08-09/朝鮮日報

(資料來源: http://chinese.chosun.com/big5/site/data/html_dir/2008/08/09/20080809000021.html)

⁸³ 〈腦殘統媒醜化韓國〉2010-05-21/自由時報/自由廣場/楊虔豪

⁸⁴ 〈楊淑君效應--南韓網友喊冤：主審不是韓國人〉2010-11-20/自由時報/影視

事件定調歸因，並且增加許多的形容詞或是網路上情緒性語言來加強文本戲劇性。

這樣的趨勢一方面來自於過去中韓斷交後所延續的矛盾以及近年來台灣在全球化經濟競爭上落後的不甘心情，也可能來自於報紙間的競爭激烈，以及蘋果日報進入台灣所帶來的「小報化」有關，強調讀者導向，使得新聞文本越趨煽情與強調情緒宣洩。

另外，量化的資料中顯示，在第三時期中，政治口水一項突然增多，而在報別方面，各報在「一丘之貉」與「借刀殺人」兩個論點上明顯的論點上差距，這個差距又以楊淑君事件所蒐集樣本最為明顯，原因很可能在於選舉期間的報紙媒體政治傾向，使得文本在議題操作上有所不同。這個部份也將於接下來的章節繼續討論，以訪談方式以及大眾文本的論點蒐集對照，作為解釋的範疇與方向。



第四節 小結

本章主要針對自一九八零年代以來，媒體在與韓國的運動衝突事件上是否有操作的軌跡，以及如何建構仇韓的集體記憶。在經過內容分析的結果與文本上的舉例討論後，大致可做出以下歸納：

一、運動做為國族情緒的迸發場域

誠如 Maguire 等人 (2002/2008: 175-176) 所述，運動具有對國家與社會統合的潛力，因此常被拿來與國族主義結合，成為了弱小民族與國家情緒能量宣洩的安全途徑及出口。

資料顯示，歷年來的台韓運動衝突事件中，在文本上都承載了當時時空背景下的政經情勢，而隨著這些政經情勢，在新聞文本上所呈現的框架方向與論點也都有所差異。從這些框架上的變化與差異，我們可以知曉在不同時期的國族情緒迸發的原因如何，也可以看出媒體在這些時期中的文本呈現有什麼差異。

整體而言，媒體所呈現的對韓新聞文本，便是一個逐漸從內團體轉移至外團體的過程，在第一時期，儘管民間與官方的對韓國的想像已經有落差，但媒體所呈現的仍是將韓國納在同一陣營中，所建構自身認同的那個必須「他者」，則來自於中國大陸。

至第二、第三時期後，由於政治上的變化，以及產業經濟上的競爭，韓國逐漸成為台灣的假想敵，如同 Klein (1997) 所說的藉由運動上的區分「他／我」開始畫分邊界，以呈現「我」的存在。這種假想敵的建構，實是一種動態的過程，雖來自於一定的時空背景基礎，但要能持續以及維持在大眾記憶中，則需要藉由不斷的被提醒，才能被建構出來成為一種集體記憶，媒體作為「想像共同體」的關鍵中介體，便成為強化這種集體記憶的重要推手。

二、仇韓新聞框架的累積與集體記憶

從三個時期的新聞框架變化可以發現，在各時期與韓國的衝突事件中，所呈現的框架方向與論點都有不同，媒體文本呈現的是越來越仇視韓國的趨勢，這樣的趨勢便是藉由不斷的框架所累積，進而使得韓國的形象開始被建構出來。

即如 Gamson (1989) 早已說過，框架便是一組具有組織性的中心思想，可引導我們何者才是議題所在，也因此他將新聞視為一種說故事的過程，而非新聞事件的呈現。因為在新聞文本中，新聞工作者在字裡行間所選擇的特定句法與詞彙，除了呈現自身（記者及報社）如何認知該社會事件，同時也框限了讀者的理解面向。

在資料中顯示，媒體隨著時間進程，對於韓國的描寫在框架上越來越仇視外，在描寫上也逐漸出現特定的形容詞與用語，甚至是不存在的假新聞藉以突出韓國在事件中的意義。此外在版面的配置上，從原本應屬於體育版面的事件開始變動，在第三時期更明顯擴散到各版；在消息來源的部分，對於民眾的意見也越來越著重，這都顯示媒體對於這類事件的重視程度越來越高，相對也顯示其認為這類事件能夠引起讀者注意。

這些文本框架上的變化，代表的便是一種經過操作的軌跡，儘管政治經濟發展的背景會反映在新聞對於韓國的呈現上，但媒體在敘述事件時，也有推波助瀾的情勢出現，使得韓國不斷的被醜化與既定刻板印象，逐漸成為一種被創制的傳統。

第五章 大眾論述作為對照及新聞框架的產製過程

經過第四章的不同時期媒體報導的框架分析，可以了解媒體在對韓國的呈現上，隨著時期有著一定的規則在進行，藉由論點的不同以及描述手法的差異，開始慢慢建構出韓國的形象，而藉由版面配置的差異性和消息來源的差別，也可以推論媒體在面對這類事件的呈現上，有著不同以往的考量，從而影響了集體記憶的塑造。

此外，在前一章的資料中顯示，四報在第三時期中的框架論點與前二時期有著明顯不同，而這些造成差異的論點分布又多在楊淑君事件當中，顯示在這次事件裡，媒體有其特殊的考量存在。

因此本章便希望藉由楊淑君事件，進一步了解當遭遇到與韓國相關的運動衝突事件時，媒體在新聞產製的過程中所思量的部分為何？並透過採集與媒體的相對的大眾文本作為對照，一方面了解在沒有經營生存壓力下的大眾文本，在面對這類與韓國的衝突事件時，其所著重的立場與方向如何？另一方面從而檢視與突顯媒體在建構新聞框架時的特徵如何？是以本章將回應研究問題如下：

- 2-1 以楊淑君事件為例，韓國相關衝突事件中，媒體與大眾間所建構的文本框架差異為何？
- 2-2 以楊淑君事件為例，媒體報導的文本框架產製過程如何？

第一節 媒體與大眾的框架建構－以楊淑君事件為例

從整體的框架方向（表 5-1）來看，媒體與大眾之間的框架方向比重並沒有顯著差別，不過在楊淑君事件當中，無論是媒體還是大眾的仇韓比例都高於六成，這樣的數據與第三時期的框架方向分布差異不大。

但再進一步看四報的框架分布與大眾文本對照（表 5-2），便可清楚發現四報之間的仇韓比例有所不同，統計上也達到顯著差異（ $\chi^2=8.648$ ； $p<0.05^*$ ），在當中以最仇韓的以蘋果日報較明顯，比重有 76.9%，其次則是自由時報的 68.9%，而中時與聯合兩報則都低於六成，至於大眾文本的仇韓比重雖介於中間，但仍高過六成。

表 5-1：楊淑君事件媒體與大眾（網路）框架方向分布

框架方向	媒體 (四報)	大眾 (網路)
仇韓	n=156 (64.2%)	n=49 (66.2%)
不仇韓	87 (35.8%)	25 (33.8%)
總和	N=243 (100%)	N=74 (100%)

表 5-2：楊淑君事件四大報與大眾（網路）框架方向分布

框架方向	媒體				大眾 (網路)
	中國時報	聯合報	自由時報	蘋果日報	
仇韓	n=28 (52.8%)	n=37 (57.8%)	n=51 (68.9%)	n=40 (76.9%)	n=49 (66.2%)
不仇韓	25 (47.2%)	27 (42.2%)	23 (31.1%)	12 (23.1%)	25 (33.8%)
總和	N=53 (100%)	N=64 (100%)	N=74 (100%)	N=52 (100%)	N=74 (100%)

接著將框架方向細分為框架論點分布，如先將媒體匯集成一塊與大眾文本對照如圖 5-1 與表 5-3 所示，兩者之間在框架論點上有顯著差異 ($\chi^2=23.278$; $p<0.01^{**}$)。並可以發現在「民族自尊」、「本性難改」、「政治口水」、「一丘之貉」、「理性自省」幾個論點中，比重相差較大。

其中媒體在「政治口水」一項高出大眾，表示媒體呈現了較多的政治人物如何消費仇韓議題，這可能與楊淑君事件正值五都大選有很大關係，相對來說大眾對於這個部份就不是那麼的著重。另一方面民眾雖然在「民族自尊」一項比重低於媒體，看似較不仇韓，不過則在「本性難改」明顯高出媒體，表示民眾對韓國的刻板印象更深，相較媒體，當遭遇到與韓國的運動衝突事件時，大眾更會去表述對於韓國過去「前科」的不滿。

至於在「一丘之貉」論點上，媒體與大眾也呈現明顯差距，在楊淑君事件中，大眾同時仇韓又仇中的比例較高，認為衝突事件的發生，並非韓國單方面負責即可，主辦的中國也是共犯之一。不過在「理性自省」論點上，大眾則相較總體的四報平均來得低，這個部份可能也與網路上匿名性容易出現情緒言語有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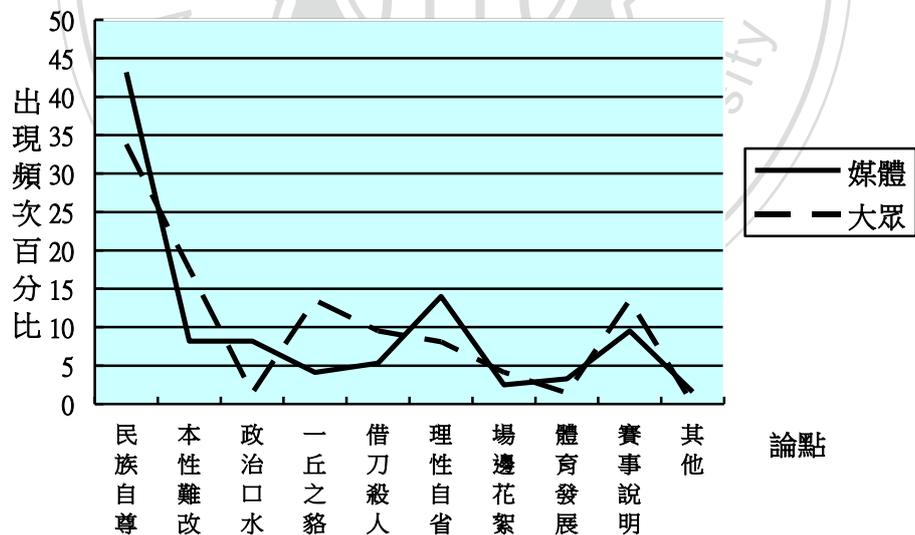


圖5-1 楊淑君事件媒體與大眾框架論點走勢

表 5-3：楊淑君事件媒體與大眾（網路）框架論點分布比較

框架論點	媒體	網路（大眾）
民族自尊	n=105 (43.2%)	n=25 (33.8%)
本性難改	20 (8.2%)	13 (17.6%)
政治口水	20 (8.2%)	1 (1.4%)
一丘之貉	10 (4.1%)	10 (13.5%)
借刀殺人	13 (5.3%)	7 (9.5%)
理性自省	34 (14%)	6 (8.1%)
場邊花絮	6 (2.5%)	3 (4.1%)
體育發展	8 (3.3%)	1 (1.4%)
賽事說明	23 (9.5%)	7 (13.5%)
其他	4 (1.6%)	0 (0%)
總和	N=243 (100%)	N=74 (100%)

不過從四報之間的差異性來看，又可以發現前述的一些論點統計仍存有盲點，以「理性自省」論點來說，媒體的總和是高過大眾文本，然則從下頁表 5-4 可知，這樣的比例是由中國時報與聯合報所拉高，而自由與蘋果兩報則與大眾相差不遠；這樣的情形也與「賽事說明」論點相像，唯一不同的是在「賽事說明」論點中，大眾文本的比重則是偏向中時與聯合兩報，會有這樣的情形可能來自於大眾本身難以接收到第一手資訊，因此在衝突事件上的討論，容易出現引自各報媒體訊息進而去還原現場狀況。

另外相較於表 5-3 及圖 5-1 中媒體與大眾在仇韓仇中的論點選項如「一丘之貉」、「借刀殺人」的比重分布，在下頁表 5-4 的四報論點分布中，可以發現此二論點在中國時報與聯合兩報完全沒有樣本出現，對照大眾文本部分有 13.5% 與 9.5%，可以推論中時與聯合兩報在此事件中將砲口一致指向韓國，與大眾仇中又仇韓的傾向相異。

如進一步比較大眾與四報的差異性，在「借刀殺人」論點上，四報中只有自由時報與大眾文本有蒐集到樣本；其次，在仇韓的論點中，自由時報與中時、聯合兩報在屬於仇韓框架的前三論點（民族自尊、本性難改、政治口水）總和相距不多，但扣除掉仇中又仇韓的「一丘之貉」論點後，整體仇韓框架方向的比重反倒與中時、聯合兩報相差不遠，顯示自由時報面對仇中仇韓的選項上，與他報立場雖較為不同，卻相對貼近大眾文本所呈現的框架分布。

表 5-4：楊淑君事件四大報與大眾（網路）框架論點分布比較

框架 論點	媒體				大眾 (網路)
	中國時報	聯合報	自由時報	蘋果日報	
民族自尊	n=21 (39.6%)	n=26 (40.6%)	n=29 (39.2%)	n=29 (55.8%)	n=25 (33.8%)
本性難改	5 (9.4%)	5 (7.8%)	7 (9.5%)	3 (5.8%)	13 (17.6%)
政治口水	2 (3.8%)	6 (9.4%)	8 (10.8%)	4 (7.7%)	1 (1.4%)
一丘之貉	0 (0%)	0 (0%)	6 (8.1%)	4 (7.7%)	10 (13.5%)
借刀殺人	0 (0%)	0 (0%)	13 (17.6%)	0 (0%)	7 (9.5%)
理性自省	12 (22.6%)	12 (18.8%)	6 (8.1%)	4 (7.7%)	6 (8.1%)
場邊花絮	1 (1.9%)	3 (4.7%)	0 (0%)	2 (3.8%)	3 (4.1%)
體育發展	2 (3.8%)	3 (4.7%)	1 (1.4%)	2 (3.8%)	1 (1.4%)
賽事說明	8 (15.1%)	8 (12.5%)	3 (4.1%)	4 (7.7%)	7 (13.5%)
其他	2 (3.8%)	0 (0%)	0 (0%)	0 (0%)	0 (0%)
總和	N=53 (100%)	N=64 (100%)	N=74 (100%)	N=52 (100%)	N=74 (100%)

第二節 文本分析與訪談討論

本章主要希望藉由楊淑君事件做為例子，藉由比較四大報之間差異並且與大眾文本對照，一方面了解當媒體在處理這類可能引發仇韓情緒的議題時，是否有不同立場與刻意操作的軌跡；另一方面了解媒體所營造的仇韓集體記憶是否影響了大眾的思考方向。

經過前面內容分析的結果顯示，在楊淑君事件中，雖然在論點上有比例上的差距，但基本上都能對應到媒體的框架論點分布，媒體總合的框架方向比重與大眾文本基本上是一致的，可以推論媒體所營造的仇韓集體記憶有其影響性，並且能與大眾部分相做呼應。

但再比較四報與大眾的框架論點，卻可以發現不同的報別有明顯的議題操作軌跡，在中國時報與聯合報部分，對於仇韓的框架呈現較低，也未曾有仇中的論點出現；至於蘋果日報與自由時報，則呈現較高的仇韓框架論點比例，且都出現既仇韓又仇中的「一丘之貉」論點項目，這個部分則與大眾文本比較相似，且在四報中只有自由時報單獨出現了針對仇中的論點，也高過大眾文本的該項論點比重許多，顯示媒體在報導仇韓議題時，與社會真實相比，有不同的操作與反映方式。

透過上述的資料可以初步知曉媒體在新聞產製的操作軌跡，但對於其文本上的呈現方式以及產製過程中的意向仍較欠缺說明，因此本節將透過文本上的舉例以及四大報記者、主管的訪談結果進行綜合討論，進一步了解媒體在產製過程中如何定調這類的運動衝突事件。

一、當番薯遇上泡菜：個人框架的累積

原則上，只要比賽是在韓國當地進行的話，韓國的做法都是比較強勢的，像當年那個亞青杯，到了漢城他們不准我們用國旗國歌，那我們就全隊折返，這是兩個國家中韓之間第一次在政治議題上面有衝突，就是干涉到體育的，不過那個時間點中韓還有邦交，那個時候的駐韓大使好像是叫金什麼的，反正就鬧得不愉快，就是從那個時間點開始不愉快到現在。

(中國時報/主管 A)

台灣對韓國的怨氣一直其來有自，從最早的「六義士劫機事件」，韓方欲將在大陸劫機後迫降韓國的所謂「反共義士」交付給中共處理，開始了台韓兩國的外交上的裂痕，而後又在亞青盃籃賽中無預警的打壓我國參賽隊伍，以及之後與我國閃電斷交並草率將我國大使館轉交給中共以示好，讓韓國從此被冠上了一種不擇手段刻板印象。

這種刻板印象也被延伸到運動場上，幾乎在每次的運動衝突事件都被拿出來一次次的提醒，在楊淑君事件中，從讀者投書的激烈言詞便可以看出國人對於韓國的一種長久以來極端不信任感：

韓國人幾千年來在強權之下討生活，形成了潛藏恨意的強烈民族主義。為了掙民族榮光往往不擇手段，因此在各種國際比賽韓裁判作弊名滿天下。在國粹跆拳道賽中更惡名昭彰。韓國人長期努力才把跆拳道推成奧運項目，但地位仍不穩。為入奧、保奧和維持跆拳道霸權，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幾乎沒有一次比賽不作弊。⁸⁵

對韓國的集體記憶框架塑造，不只存在於大眾身上，追根究柢，來自第一線的媒體在面對韓國時，根據過去的報導經驗，有時也會提到對韓國民族性的印象深刻，並且拿來與他國做比較，記者本身而言也難以避免這樣的主觀意識，產生個人框架：

雖然新聞從業者都有他的專業判斷，不過不可避免台灣本來就是有仇韓情緒，對韓國人本來就有成見存在，加上南韓過去辦一些比賽，你會發現可能是民族性不同，所以台灣人對日本比較包容，日本人做事方式跟台灣比較接近，韓國人的做事方式對台灣媒體來說比較不適合，加上韓國民族性和台灣跟韓國處於一種競爭狀態，所以這種狀態會轉移到運動場上。所以不管有意無意，當我們輸的時候就會不自覺把矛頭對他們...姑且不論這些民眾，同業都會有這些反映。

(自由時報/主管 B)

從訪談可知，記者也承認在處理這類衝突事件時，儘管自己身為新聞從業人員，但有時也會不自覺地將韓國與「不當動機」聯想，這樣的情況也使得在存有

⁸⁵ 〈跆拳道賽與作弊民族主義〉2010-11-25/蘋果日報/頭條要聞/林濁水

灰色地帶的事件時空下，媒體因而可能採取較為「守舊與固定」的方式去報導，迅速為事件歸因。

因此，肇因於歷史因素以及地緣關係，讓台韓兩國在政治、經濟、體育上不斷地有碰頭的機會，然而每次的競爭都難免有碰撞的情形出現，也使得台韓兩國的嫌隙似乎越來越深，也建構了對於韓國這方面的集體記憶。這種狀況便如同Wertsch（2002）所說，集體記憶的形成是一個動態的過程，透過社會脈絡、媒體力量交織形成。這些仇韓的情緒便是經由長期逐漸累積，平常並不顯而易見，一旦出現導火的事件，便會適時的爆發產生影響，不只在大眾呈現，而可能更先存在於新聞工作者心中。

二、反映社會真實？媒體組織的不同偏向

從量化的資料可以知道，在楊淑君事件中，大眾文本的框架論點是既仇韓又仇中，在大眾的文本裡除了較媒體有更多對韓國負面刻板印象的呈現，也提出對中國方面的疑慮，另外，在評論衝突事件時，也使用較多的情緒性字眼：

韓國的亞跆盟跟梁振錫本來就該負起汙衊楊淑君的責任!!韓國平常愛搞奧步.這回幫中國擋子彈擋到對台選手開槍..新仇加舊恨~被罵活該死好~不要逃避責任~狗就是平常作弊做慣了.這回才會連別人作弊都搶著幫忙(笑)⁸⁶

中國是地主國，護具故意不提供，該量級又有你們中國選手，又成天喊金牌數要超越上屆 166 面，怎麼可能不想要區區一面跆拳道金牌，你要怪就怪韓國人給你們背黑鍋吧！總之都是不要臉！⁸⁷

這樣的狀況，的確符合前述的國族情緒歸因，即藉由明顯的他者（中國、韓國）來強調自我認同。如此的國族情緒也可以在報紙上清楚見到：

台灣當然不會因此和韓國打仗，但是長期受到中國外交打壓，以及韓國對台灣多如牛毛的不友善小動作，從斷交、體育競賽、文化教育（如稱孔子、李白是韓國人），再到經貿競爭，都已經成為台灣人的集體記憶；

⁸⁶ 〈R: [新聞] 韓媒報導 中國才是事件受益人〉2010-11-21/ Olympics_ISG/作者: liparis

⁸⁷ 〈R: [心得] 楊淑君事件的層層佈局〉2010-11-17/ Olympics_ISG/作者: Answerme

現在又加上楊淑君事件，台灣人民爆發集體憤怒當然是可以諒解的，因而產生中、韓聯手做掉台灣選手的陰謀論聯想，也其來有自。⁸⁸

在自由時報部份，則除了報導上同時轟擊中、韓外，在社論與讀者投書更幾乎一面倒的將罪魁禍首指向中國：

另一件事也同樣讓人百思不得其解，此次楊淑君誤判事件，中國籍技術委員趙磊扮演的角色，令人起疑，就現有資料、現象研判，他很可能就是楊淑君失去爭奪金牌機會的藏鏡人，所以很多台灣民眾質疑中國才是製造失格冤案的幕後黑手，根本不干韓國人的事。⁸⁹

韓國人與台灣人無冤無仇，在這次事件中也無選手與楊淑君競爭，為什麼要對台灣不利？行為必須有動機，楊淑君被判失格以後，是誰拿到獎牌？誰又在事件發生後最先誣指楊淑君「作弊」？馬政府放縱口沒遮攔的官員、媒體煽動反韓情緒，誠如美聯社所說，「明顯避免指控中國」，台灣人應清楚箇中原因，不應在此時被人拿來利用。⁹⁰

自由時報這樣的報導呈現傾向，或許與其長久以來的政治立場有其密切的關係，在筆者與自由時報的記者訪談中，儘管沒有直接說出，還是可以感受到記者所體認到報內政治所帶來的組織框架：

因為你知道我們自由時報就是比較走本土路線啦！對中國方面的東西會比較謹慎，當然對台灣的部份，我們當時的處理就是相信她（楊淑君）想要保護他，中國的角色其實是還好啦，但是就是會質疑他有偏向。

（自由時報/主管 B）

如將蘋果日報與自由時報的部份綜合，也可以發現與大眾文本的論點較為相符，都是認為楊淑君此次比賽被奪權失格，實是中韓雙方聯手將我國選手推入火坑的大陰謀。

反倒是比較資料後，中國時報、聯合報兩報除了在仇韓的框架方向上較低，在「一丘之貉」與「借刀殺人」兩個論點上也是缺席，顯示兩報對於仇中這個選

⁸⁸ 〈蘋論：舉國之怒〉2010-11-19/蘋果日報/頭條要聞

⁸⁹ 〈國共愛情堅貞不渝〉2010-11-25/自由時報/自由評論

⁹⁰ 〈「真的不是韓國人的錯」〉2010-11-24/自由時報/自由廣場/沈政男

項並沒有著墨，從中國時報的一篇文本當中似乎可以看出這樣傾向：

因為韓國沒參賽，網民激憤之餘又把矛頭對準中國大陸，把事故怪在大陸選手想拿金牌，最可能的對手就是楊淑君，這股氣實在也沒必要。輸贏場上見真章，中、韓友誼再深，深不過兩岸關係，這位韓裔裁判完全沒有道理為大陸選手，做出違反常理的事。事實證明，裁判委員會本來要裁定台灣跆拳道隊全部停賽，大陸方面一口回絕。⁹¹

在文中，強調在這次的事件中方與韓方並沒有「作案」的動機，並且在文末更是提到當時大陸方面力挺我國選手的細節，針對這樣的文本描述，中國時報的主管 B 是這樣回應的：

因為整個事件去想，沒有理由在楊淑君身上做這樣的報復吧，就公平性跟動機來看，都沒有韓國選手，那中華隊楊淑君也未必就是篤定金牌，就是說有沒有必要在這個上面做這個手腳？那另外就是中國是主辦單位他有沒有必要做這樣的手腳？而且因為你是懷疑但是你沒有證據阿，這是沒有辦法講出來的事情，只能做合理的懷疑但是不能形諸文字。

（中國時報/主管 B）

中國時報方面認為在當時的狀況，台灣與韓方各說各話形成羅生門，在沒有確切證據下，只能有「保守的合理懷疑」，不宜直接地將砲口對準誰。至於聯合報的部分，記者在事件發生第二天，便發了一篇以楊淑君誤用電子襪才遭判失格的新聞，引起國內大眾的強烈反彈：

楊淑君在亞運比賽被判失格，各種陰謀論出籠，如果還原真相，中華隊可能在不知情的狀況下，誤用七月已遭禁用的電子襪。其實今年五月哈薩克舉行的亞洲跆拳道賽，就有選手穿著跟楊淑君一樣的電子襪出賽，被大會制止。亞洲跆拳道聯盟在比賽期間開會決議，今年七月的世界杯團體賽開始，禁止使用這一款電子襪。

但是中華隊總教練劉慶文昨天說：「到今天為止，我不知道這項規定。」就有外國教練私下指出，看到楊淑君還穿這種電子襪上場，「嚇

⁹¹ 〈一定要上告奧會 替選手討回公道〉2010-11-19/中國時報/時論廣場

了一跳，心想一定出事，後來果然被抓。」獲金牌的大陸選手吳靜鈺也知道，舊款已被禁用。⁹²

在新聞中，提到了楊淑君在不知情狀況下，誤穿了電子襪導致被判失格。記者 A 在訪談時也提到，後來他獲得了亞運當時領隊會議的簡報檔，上有清楚的圖文說明，更證明了他當初的判斷是正確，但國內報紙甚至是官方單位囿於輿論壓力，並不承認有這份簡報檔，他也提到當時寫完報導的隔天，報社與他即感受到強大的民眾壓力：

你看誰再找真相，只有我敢這樣寫，沒關係阿，第二天我們報社就接了幾百通電話，就是來說你們怎麼可以這樣寫（講中華隊錯），報社會有壓力啦，我也變成什麼網友的全國公敵阿，反正我是不上 PTT 的啦，聽說也是把我罵的，還人肉搜索怎樣的。但這種東西不會影響我跑新聞的原則，真相對就是對，錯就是錯，我就是要把真相寫出來。

（聯合報/記者 A）

這樣可以看出各報之間在處理這類可能引發仇韓情緒新聞時，在報導策略上有所不同，這個策略來自於輿論及讀者的報社經營壓力，也可能是報社本身的立場或記者專業取向使然，使得報紙之間有了不同的事件報導「包裝」。此外，透過比較，也可發現四報與大眾文本論點都有若干差異，顯示媒體在事件報導時，並非如實的反映社會真實，而有各自的組織影響包含其中。

因此，幾乎四報記者都提到，儘管在體育版面他們有其在事件上新聞專業的合理推論，但報社仍有自身的考量，他們無法去干涉其他路線的記者，他們有他們的專業。也使得在量化的資料中，可以看到在其他的版面仍然還是有出現不同程度的仇韓新聞，間接反映了組織所呈現的整體影響性。

三、完美的新聞風暴：仇韓報導作為新聞商品

據前討論可知，「台灣人的仇韓情緒」來自於社會脈絡與人為所建構，但都是根植於台灣這塊土地上集體記憶所展開的主觀建構式想像共同體。這樣的情緒下，自然使得媒體對於與韓國相關的議題特別敏感，因為這樣的東西讀者是熟悉的，可以快速的進入情境，即 Hesmondhalgh（2002/2006）所述，閱聽人的習癖

⁹² 〈不知情誤用 淑君的電子襪 七月已禁用〉2010-11-18/聯合報/頭條要聞/廣州報導

難以預料，最好的辦法就是去建立連續性的閱讀誘因。降低新聞產製的成本風險，自然也可以達到媒體經營所需要的利潤。

運動場上，其本質在於競爭，也因此容易產生衝突性，進而勾起相對歸屬感，觀賞者各自為屬於自己的一方吶喊助陣，形塑出我族與他者異同的民族情緒（Rowe, et al, 1998:124）。在楊淑君事件中，可以看到運動與國族情緒的完美結合，除了政治人物爭先恐後為其打抱不平，爭取所謂的「國家尊嚴」：

高雄市長候選人陳菊昨晚在高雄縣造勢晚會上，批評國家執政者軟弱無力，讓前進亞運參賽的金牌國手楊淑君，在國際賽事被侮辱「作弊」時，叫天天不靈，叫地也不應，若再由這種政府繼續統治，台灣的主權就會消失……「馬政府執政兩年半來，台灣主權、尊嚴究竟存在與否？」陳菊說，楊淑君被韓國裁判指控作弊，「一個台灣金牌代表被說作弊，這是比在那兒當場將她槍斃還痛苦」。⁹³

也可以看見媒體直接將其冠上台灣女兒、台灣之光等稱號，並在內文中將楊淑君化身為「女神」並營造出一種民族英雄的氛圍：

桃園機場第二航廈昨晚擠進約千人接機粉絲，來自全國各地的學生與支持者，揮舞國旗與海報高喊：「楊淑君加油，我們愛妳！」氣氛溫馨感人。楊淑君綁著馬尾、薄施脂粉，帶著微笑現身，熱情民眾再以掌聲、鮮花歡迎，她紅著眼眶，頻向四方揮手鞠躬致意……昨晚七點半左右，楊淑君踏出入境大廳，早就拉好歡迎布條的「君」迷們，立刻大聲呼喊：「淑君加油！」也讓楊淑君感動不已，支持者看到楊淑君大喊歡迎「君神」歸來，代表淑君在不少台灣人民心目中儼然成「民族英雄」。⁹⁴

楊淑君原本就是亞運跆拳道項目奪冠的大熱門，加上外型姣好，作為一個運動明星，本來就帶有調節與接合觀眾情緒的作用，此次不但「又」碰到與韓國相關的誤判裁決，還是在「對岸」的場地上發生，是故激化了國人的強烈民族情緒；對於媒體來說，這樣的題材更是「千載難逢」：

後來我們一直在開玩笑講，新聞議題需要什麼？人事物三個東西，這個就是一個完美風暴，如果我今天是一個阿宅踢輸了在那邊哭，也許大家

⁹³ 〈任楊坐地哭 菊批政府無能〉2010-11-22/聯合報/五都選戰專頁

⁹⁴ 〈台灣女兒 楊淑君回來了〉2010-11-23/自由時報/頭版新聞

同情一下就過了，偏偏今天是一個嬌滴滴的大美女，就是楊淑君，這個新聞人物本身就充滿話題性。

後來大家都朝台灣女兒在國外被人家欺負的方向去寫。再加上要有好的對手，就好像武俠小說裡面對方要有大魔頭才好看，這次一次來兩個大魔頭，一個是不共戴天的老韓，一個是老共，就好像「亞運人生」的發展潛力，如果你拋開嚴肅那一面，這本身就很有戲劇張力。像楊淑君在那邊哭，劉宗達衝過去抱他，就讓我想到倚天屠龍記，張無忌他爸爸被七大派圍攻抱著殷素素的樣子。

(自由時報/主管 B)

由此可知，媒體的確在新聞呈現選擇上有新聞商品的考量，所考量原因與閱聽人收視率密切相關，因此當然會希望有話題性（台灣人又被中、韓欺負）、戲劇張力（劉宗達擁楊淑君），最好再加上代表正義一方的是俊男美女（楊淑君），就更符合「吸睛」要素。

另外，運動與國族主義如要完美結合，那麼最重要的便是那個可以清楚用來畫分邊界達到自我認同的「他者」，在楊淑君事件中，與台灣最明顯有競爭或政治關係的兩個「他者」都出現了，一個是長期在國際外交上打壓台灣生存空間的中國，另一個則是被台灣人冠上不擇手段封號的韓國，自然引起台灣人的強烈反彈。

不過隨著事件發展到後期，楊淑君正式提告、對簿公堂，當越來越多證據呈現時，我國相關單位態度開始轉變：

跆拳道因為「楊淑君事件」槓上世跆盟，世跆盟堅持曾經在領隊會議向各隊告知電子襪相關禁令，禁用外貼式感應片的電子襪。原先我方對此態度強硬，指責根本沒有聽過相關規定，但現在情況突然有了轉變，跆拳道新任理事長許安進表示，如果世跆盟說法屬實，過錯就會落在我方身上，恐怕連累楊淑君等我國選手遭世跆盟停權，進而影響奧運參賽權，因此若確定錯在我方，打算撤銷告訴。⁹⁵

⁹⁵ 〈電子襪事件 跆拳道：若理虧擬撤告〉2011-06-07/自由時報/體育

中華跆拳道協會今年5月新上任的理事長許安進表示，據他了解，亞運跆拳道領隊會議有明確「禁止使用」電子貼片的簡報，是我國跆拳道協會未善盡告知選手的責任，協會明顯有錯；既然有錯，就應撤告。⁹⁶

媒體對此事件儘管在當時仍然「憤恨不平」，但在之後卻慢慢開始改變報導方向，也似乎證明當初的新聞操作太過一窩蜂，便有記者認為當初的報導方式的確過於民粹：

到後半段我們自己幾個記者捫心自問，的確是失控的，但是當下那個氛圍就是民心可用，可以感受到大家的憤怒，所以才會燒成這個樣子，在那個狀況下誰敢說楊淑君有錯。

(自由時報/主管 B)

從上述討論可以發現，當媒體遇到這類台韓的衝突事件時，的確會有一個預設立場存在，並且以此作為議題操作的依據，然而當事件逐漸退燒或轉向，失去了新聞價值，媒體自然也就漸漸的不去報導，從記者的訪談中也可以看到這樣的脈絡存在：

其實到後來，我們大家也慢慢開始接受我們也有錯，那個方向已經變成這樣，那既然變成這樣，我們不可能拿我們也有錯這個東西去做操作。一開始我們會說中韓聯手做掉我們，但當對方有越來越多明確證據說我們有疏失，我們這個走向就要開始縮，加上這個事情久了，民眾也失去興趣了，我們就不需要這麼操弄這個東西。

(蘋果日報/記者 B)

易言之，對於媒體而言，這類的衝突事件便是一個好操作的新聞商品，尤其當事件中的「主角們」還有「故事情節」都是大家所熟悉的時候，那麼更是一個完美的新聞風暴。

四、商品化導致的個人框架與組織框架的衝突

新聞組織內部為了使新聞工作順利進行所制定的慣例與程序，這些規則通常會去限制議題的新聞性，如決定哪些人屬於新聞人物、哪些消息來源是值得採訪

⁹⁶ 〈跆拳道協會撤告 體委會要告到底〉2010-06-08/蘋果日報/體育

的，從而對議題產生不同的報導面向（林建利，2007；張敏華，2005）。從先前的文本框架分析與訪談討論也可以發現，媒體報導新聞時有著一定的取向存在，而當媒體遇上國族議題時，依據各自組織框架對同一事件便會有各自解讀出現。

在楊淑君事件中，除了組織框架，從訪談裡也可以看到記者個人在報導歷程中所累積的基模，逐漸形塑出個人框架，進而可能影響到記者去判斷新聞事件調性：

他們做地主的時候，通常會希望能夠把成績拉抬起來，像 1988 漢城奧運時，他們金牌有衝到十面以上，就是利用主場優勢無所不用其極，讓自己選手獲得好成績，就難免有小動作出來。基本上我們跑體育的記者，這方面韓國的小動作我們看得比較多，你疏忽的話，就被他呼攏過去了。

（中國時報/主管 A）

菲律賓雖然也會搞小動作，但像老韓就會一路燒，可能跟我們兩邊競爭太激烈，像產業或是其他的同質性太高了，變成又愛又恨，因為記者也是人阿，而且採訪經驗來說，十個採訪記者來說，幾乎對韓國評價都不是那麼高。

（自由時報/主管 B）

這樣的個人框架來自於我們對事實的主動建構，讓人對於事件的認知透過不斷累積形成基模，有著強烈的主觀傾向（鍾蔚文，1992）。儘管記者們大多表示在事件發生時，是盡可能的還原現場，但從量化資料顯示仍存在著偏向，並且大致與組織框架一致。不過也有記者有著不同的看法：

說真的，反正他們就是一個國家而已，他們在運動場上的成績也是蠻受大家尊敬的，那他們也是一直有在培育運動員。我本身沒有對韓國的偏見或是所謂仇視。比賽就歸比賽，有些技術上的東西，那我覺得是每隊都可以這麼做，看你要不要做，那今天你不做你也不能說人家小動作，因為我覺得在合理合法範圍內，你把規則發揮到極致，都 ok，跟你是不是韓國或是什麼運動都無所謂。

（蘋果日報/記者 B）

然而這樣的個人框架便可能與報社的組織框架產生衝突。如文獻中提到，媒體的「新聞室控制」是框架社會真實的重要因素。即國內學者所說的「內部控制」，指的便是「新聞編採人員的工作環境，如何影響新聞成品的內容」（鄭瑞城、羅文輝，1988: 118）。

新聞媒體可能透過具體的編輯手冊明示報社的風格與立場，有些則必須靠記者自行去學習摸索組織中隱晦不明的立場。這也表示許多時候記者本身個人框架可能會與組織框架有異同，只是在勞資雙方的不對等權力下，最後往往是由組織框架取得發言權。在訪談中，有記者便提到在事件發生時，與編輯台在溝通上的拉鋸情形：

後製端在聯合報來講並沒有限定我什麼角度，但是畢竟聯合報不是體育專業報，是綜合性報紙，這些主管對體育不了解，對跆拳道更陌生，那台灣民眾對籃球、棒球最熟，所以他們都對於楊淑君貼片的東西會有疑問，那我要去做解釋，就是規則上面他們其實不了解，所以就會認為被搞鬼了阿...那個時候就花了很多時間再跟他們（後製端）溝通。

（聯合報/記者 A）

除了溝通的拉鋸情形外，記者本身的稿子往往在產出後，還會經過編輯、排版、潤飾，使得原始的稿件也許不如記者想像的呈現，也突顯媒體組織在最後守門時刻的影響不可小覷：

基本上我們記者怎麼寫稿跟標題無關，那內容部分是因為，第一時間我所看到的情況我把它據實寫了出來，那至於這個事件報社或我們主管怎麼操作他，他們怎麼加字、下標圖片怎麼放，那已經不是我可以控制的，我就是寫成一篇報導傳回去公司.....我有感受到台北或是整個台灣民眾，都覺得我們是被做掉的，當時的氛圍就是這種感覺，但我在現場我所問到所感知道的，不是那麼回事。

（蘋果日報/記者 B）

以最仇韓的蘋果日報為例，在這樣的框架競爭下，記者漸漸便能感受到所謂的「新聞室控制」，使得本身的看法只能轉而隱藏，也更凸顯出媒體本身在議題操作上具有特殊的商業考量，以讀者為依歸，刻意的去營造仇韓的情緒氛圍：

在蘋果就是讀者最大，其他就是不重要的，報社今天發現讀者反應超好，他就繼續這樣做，就不會去在意那某部分的真相，它不會要那一部分的真相。

就我來說，我就要把我心中的真相先放著啦，然後寫我所知道的其他真相是長官要的啦，就是這樣。

（蘋果日報/記者 B）

而蘋果日報這樣的操作手法，也讓報社之間感到經營上的焦慮。在訪談中，當問到報社在報導這類與韓國運動衝突事件時，對於他報是否有看法，各家媒體似乎不約而同地指向蘋果日報，對於較為情緒化的報導方式不太能認同：

我是不太能苟同蘋果的寫法，就是那個中韓裁判聯手作掉中華隊，那個標題下的很聳動，那實際上你怎麼去講，怎麼講我覺得那是一種語不驚人死不休，那當然在新聞炒作是無可厚非啦，但是你有沒有根據現場事實，就把這個標題做出來，那當然你就是煽動情緒啦。

（中國時報/主管 A）

或是感嘆現今的媒體環境受蘋果日報作風影響深遠，使得各報在報導上越來越傾向將新聞視作商品，並且強調組織經營的壓力：

我覺得現在各報都越來越走向蘋果化，有人認為這是譁眾取寵，但有人會覺得這是一個生存之道，因為你寫的東西如果讀者看不懂，讀者沒興趣的時候，就很難生存。尤其現在取得資訊的管道太多，媒體生態多少會受影響。

（自由時報/主管 B）

從這些回答以及前述的量化資料顯示可以知道，蘋果日報所帶來的競爭壓力的確給原本的台灣媒體產生影響，加上各報自身的讀者群不同所產生的立場差異，使得在報導這類與韓國相關的運動衝突事件時，往往必須犧牲掉某些真相，迎合大眾，因為如自由時報主管 B 所說：「當你寫的東西讀者沒興趣的時候，很難生存」。

第六章 結論

本章共分三節，第一節針對研究結果作出回顧；第二節則以研究發現進行理論上的討論；第三節提出本研究限制與後續研究的建議。

第一節、研究結果

一、媒體再現的框架分析

(一) 不同時期的仇韓新聞框架變化

從資料分析中可以發現，從框架方向來看仇韓與不仇韓的比例，在第一與第二時期之間，仇韓比例大量增加，如以本文劃分的時期來看，關鍵年代介於 1985 年至 1996 年之間，在這之後仇視韓國的框架比例逐步增加。

第一時期之後仇韓比例較高，原因可能來自於中韓斷交所帶來的衝擊，因為在第一時期中，官方與媒體的引述中仍盡力希望修好中韓關係，使得新聞框架較偏向在賽事的報導追蹤，或是以理性自省的方式看待事件發生。而在第二、第三時期，則較多與事件相關仇視言詞的呈現，或是針對韓國在其他領域如經濟、文化上的「小動作」進行批判。

反映在框架論點的分布上，所蒐集到較多的即為「民族自尊」與「賽事說明」兩項，這兩個論點各自代表了仇韓與不仇韓的框架方向，而此二項論點隨衝突事件時期互相有成反比的趨向，換句話說，民族自尊論點在第二第三時期中，論點數目所占比例較多；而賽事說明則是隨著時代越趨近，所占比例越少。

此外，媒體在呈現韓國相關的衝突事件時，「本性難改」比重逐漸增加，顯示韓國的給國人較差的刻板印象有越來越固化的情形出現。而在第三時期中，政治口水一項明顯增加，反映採樣的楊淑君事件正值選舉期間，政黨消費這類衝突事件的軌跡。

至於報導形式、版面配置與消息來源分布，投書有越來越多的情形，而特稿越來越少；且新聞文本所在的新聞版面的越來越擴散；消息來源上，民眾、公眾人物大致上有變多的情形，選手等事件相關人員卻逐漸不是主要的消息來源。顯示媒體越來越喜歡去訪問民眾對於事件的意見，配合前述報導形式與版面配置分

布的呈現情形，表示媒體越來越傾向將這類事件跳脫出單純的體育新聞，使事件報導已不只限縮在體育版面，反映媒體在處理與韓國衝突事件時，不止將其視作單純體育新聞，而是以從國族議題角度來思考與操作。

（二）不同媒體以及網路論壇的框架差異

1. 四報比較

在整體框架方向的分布上，蘋果日報與自立+自由此兩組報紙呈現較多的仇韓比重，而聯合報則略高於中國時報。

框架論點的分布方面，蘋果日報在「民族自尊」這類較情緒性的框架論點，呈現上占有比例較重，其次則是自由時報；而這兩報在「理性自省」與「賽事說明」二論點的呈現上也相對較少。另外，中時與聯合兩報則在論點上的比例都相當接近。

如依樣本蒐集時間分段來看，第一時期中的媒體框架方向比重，不仇韓的比例是大於仇韓，約呈現六比四比重；但從報別來看，自立晚報在第一時期中，仇韓比例便已高出五成，而後幾個時期中也都明顯高出中時與聯合兩報，顯示不同政治立場的媒體對仇韓情緒的呈現有所不同。

至於版面配置上，總體來說蘋果日報分布在體育版的比例最少，而在娛樂版、焦點版、綜合相對他報比重較多，顯示對於仇韓事件的注重程度最高。另外，政治立場較屬於獨派立場的自立+自由兩報，則以政治版的比重最高。

2. 楊淑君事件中媒體報導框架與網路論壇論述框架

在媒體報導當中，仇韓程度以蘋果日報較明顯，比重達 76.9%，其次則是自由時報的 68.9%，而中時與聯合兩報則都低於六成。至於大眾文本的仇韓比重則介於四報中間，但仍高過六成。

媒體在「政治口水」一項高出大眾，表示媒體呈現了較多的政治人物如何消費仇韓議題，相對來說大眾對於這個部份就不是那麼的著重。另一方面民眾雖然在「民族自尊」比重低於媒體，看似較不具有國族情緒；不過在「本性難改」的論點上卻高出媒體許多，顯示民眾對韓國的刻板印象更深，相較媒體，當遭遇到與韓國的運動衝突事件時，大眾更會去表述對於韓國過去「前科」的不滿。

在論點分布上，自由時報面對仇中仇韓的選項，如「一丘之貉」、「本性難改」兩論點，與他報立場雖較為不同，較為強調中國的角色，卻跟網路上的大眾論述所呈現的框架分布較為接近。

二、新聞產製者意向

藉由對參與新聞產製的記者的深度訪談，本研究發現新聞產製的框架，受到下列三個層面的影響，分述如下：

（一）個人框架的影響

除了蘋果日報的記者黎建忠外，幾乎所有的記者在提到過去對於韓國的報導經驗或是同業間討論時，對韓都具備特定的刻板印象。這樣的刻板印象使得記者在處理存有灰色地帶的現場狀況時，可能會採取與過去意象較為符合的方式，來進行推論、報導，而使得個人的報導方向偏向仇韓。

（二）不同媒體的偏向性

量化資料中顯示，不同媒體在呈現台韓衝突事件的框架不盡相同，與大眾論述比較後，發現自由時報與蘋果日報較為接近大眾的文本框架，而中時與聯合兩報則忽略仇中選項的框架論點。訪談中也發現，記者本身的確可以感知媒體組織的立場，進而透過自我審查或在編輯室壓力下，產出與組織立場相符的新聞文本。

（三）新聞商品的經營本質

在量化資料中可以發現，隨著時期越近，媒體在事件的報導上除了跳脫原有的體育版面擴散成為議題、及框架論點逐漸聚焦於國族情緒上，在用詞上也越來越激烈地指向特定的仇恨對象，特別是韓國。在訪談中，具主管職的記者便以「完美的新聞風暴」來形容這類的台韓衝突事件，表示這樣的題材是大眾所熟悉的，在當中存在著明顯「他者」，也因此能夠引起大眾國族情緒的共鳴，相對的對於媒體本身更是一個好的新聞議題操作目標。這樣的新聞商品操作本質也反映在記者個人認知與媒體經營理念的碰撞上，由於個人與組織的勞資權利不對等，使得在許多時候，記者往往需要花費許多心力在說服後製端，表達自己認知的現場狀況；甚至記者只能配合組織，並報導所謂的「部分真實」，以符合媒體組織的產出需要。

第二節 研究發現與討論

一、難以避免的運動國族想像

儘管屬於體育場上的事件衝突，媒體本該以運動規則或體育慣例處理與分析，但是在這些與韓國相關的運動衝突事件報導裡，往往都會被冠上關於國族的字眼，例如「台灣人又被欺負了」、「國家的尊嚴被放在哪」等等？

無怪乎 Maguire (2008) 等人會認為當代運動的發展和國族等概念已結合為一體。因為運動有著明顯的對抗性質，當運動員或是代表隊佇立在國際運動場上，便讓人極易聯想到國與國之間的對抗，換句話說，運動已成為了整合社會以及國家認同與建構的催化劑。

從前面的文獻討論可知，當談論國族議題時，必須思考的重要問題，即是回答：「我」是誰？因為在尋求如此認同建構的過程的同時，便會發現「他」者區分的重要性無可避免。運動的特質，恰好符合這種國族認同的特質，也就是有明顯的「你」、「我」之分，也說明了為什麼仇韓的衝突論述多發生在運動場域。

透過大眾媒體的傳播效果，使我們在觀看運動事件的同時，不再是一個狹隘地域的經驗，而是如同 Appadurai (1996) 所說，觀看會產生一種使人崇拜與充滿魅力的群體情誼。當我們去觀看，甚至是想去觀看，在這個過程中即是集體認同感的匯集軌跡。因此，國族意識與運動之間的結合力量，不僅僅在於運動參與者本身，也因具觀賞價值，而擴散到觀賞者身上，例如近年來的許多「台灣之光」如王建民、曾雅妮、或跆拳道場上的楊淑君、朱木炎，都只是運動場上的一員，但是透過大眾媒體的傳播包裝，其國族感染力，卻可以透過螢幕感染上萬甚至百萬人。

而當這些「台灣之光」在運動場上遭受不平之冤時，這種衝突與委屈更容易使得原有的國族情緒爆發出來，快速去劃分所謂的他我之分。運動場上的衝突因此往往成為國族情緒的催化劑，因為有了衝突，歸屬的相對感便自然地在集體記憶中存在逐漸發酵，從而創造民族主義中兩個重要因素：共同的歷史感與命運。

再者，台灣與南韓多年來有其特殊的愛恨情仇，在文本的蒐集中不時可以發現，儘管主題應圍繞在衝突事件上，但往往都會提及過去的中韓斷交、事大主義，

以至於近年來韓劇、韓貨在台的廣為流行，或是產業上的惡性競爭等等。這些反映在國家、商業、流行文化上的論述，間接的描繪了台韓兩國的歷史脈絡與競爭背景，台灣從原本的齊頭競爭甚至占有優勢，到近年的苦苦追趕以至於敗退，雖讓國內興起一股向南韓學習的氛圍，但在這種氛圍之下，實存有是一種競爭後敗退的不甘心，認為韓國人是靠小動作來獲得成就，只是商場、國際外交本就沒有永遠的朋友，弱肉強食、成者為王敗者為寇，台灣只能自求多福。

然而運動場域代表的是一種公平競爭的聖地精神，不容許有不擇手段的情形出現，也使得我們對於韓國的深層受害意識反映在其中，容易放大韓國在運動場上的動作，將之與場外的競爭做連結。

也因此從資料顯示，在歷年的台韓運動衝突事件中，文本都承載了當時時空背景下的政經情勢，隨著這些政經情勢，在新聞文本上所呈現的框架方向與論點也都有所差異。

二、被創制的仇恨

(一) 他者的逐步建構

從前述可知，運動場上往往寄託了台灣人對韓國的國族情緒，從這些框架上的變化與差異，我們可以知曉在不同時期的國族情緒迸發的原因如何，也可以看出媒體在這些時期中的文本呈現有什麼差異。

荊子馨（2001/2006）認為，台灣自我意識懷有一種孤兒心態，沒有歸屬感，認同本身是不穩固的，因此必須高度仰賴著論述，反覆記憶和情感投入，以便在一個變動不居的世界中維持一種凝聚感。

這種流動認同也說明了為何我們不斷地出現或營造所謂的「台灣之光」，這種「台灣之光」現象，從另一種角度來看，便是為了取得認同的深層渴望，因為唯有透過這樣，我們才能被看見、才能被重視。也因為這種心態，「亞細亞的孤兒」無時無刻地擔心再被人背叛、擔心不被他人看見，更擔心被別人（韓國）比下去。

整體而言，媒體所呈現的對韓新聞文本，在第一時期，儘管民間與官方的對韓國的想像已經有落差，但媒體所呈現的仍是將韓國納在同一陣營中，也多呈現

出中韓友誼仍然友好的情形，或是反映出韓方對事件發生感到相當遺憾與憤怒，大致都將事件本身視做單一事件處理，而非「連坐」將帳算在所有韓國人上，所建構自身認同的那個必須存在對照的「他者」，則來自於中國。

至第二、第三時期後，由於政治上的變化，以及產業經濟上的競爭，韓國逐漸成為台灣的假想敵，如同 Klein (1997) 所說的藉由運動上的區分「他／我」開始畫分邊界，以呈現「我」的存在。媒體在報導時也開始去呈現許多刻板印象，或用其他相關事件新聞（甚至是錯誤的報導）來加深關於韓國的負面訊息，在這些訊息裡，仇視的對象已轉換，也從原本應該的從體育場上的就事論事，變成一視同仁的「韓國」或「韓國人」。

媒體在後期呈現上，似乎翻轉這樣的做法並迎向大眾口味，對於賽事衝突本身的重視比例降低，而較強調韓國相關的衝突點與對立性，以及表達國內民眾不滿的情緒；在描述的手法上，也開始加入形容詞與特定用詞加強語氣，並且營造正反雙方的角色增加可看度。

這種假想敵的建構，是一種動態的脈絡性，來自於一定的時空背景基礎，但要能持續以及維持在大眾記憶中，則需要藉由不斷的被提醒，才能被建構出來成為一種集體記憶，媒體作為想像共同體的關鍵中介，便成為強化這種「集體記憶」的重要推手。

(二) 媒體真實 ≠ 事件真實

Anderson 認為傳播科技的確改變了人們的時間觀，新聞不斷產出使人們能夠水平地去想像我族，大量的共同語言與資訊流通，讓人們得以有一個共同想像的媒介，透過有形的文字影像，具體化抽象的想像成為現代人晨間禱的代用品，催化了國族的想像。因此仇韓如果做為一種國族主義的抽象思維，大眾媒體的呈現與催化必定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彌補了過去傳統的文化歸屬形式，也建構了仇韓集體記憶。

不過，集體記憶的形成，同時也是動態的過程，藉由社會環境、媒體力量交織形成的 (Wertsch, 2002)。可以從文本的分析發現，這種仇恨記憶是逐漸的被媒體創制出來，相較於第一時期對於韓國的包容性，第二時期之後，媒體的呈現對事件的追蹤或說明逐漸變少，情緒性的花絮或是形容詞也變多。

除了許多刻板印象的「封號」不斷出現，如黑哨、作弊民族大國等，媒體更喜歡用上許多強調性的形容詞，如惡名昭彰、聲名狼藉等等，或是在客觀事實上加入許多報社自身的主觀性描述。此外，處理這類與韓國相關的運動衝突事件時，媒體在第二時期過後，往往在意的是有沒有「韓國人」？是不是「又」是誤判？然後依過去受害經驗尋找佐證，進而痛斥韓國人的運動民粹主義，表示這是一種「本性難改」。

而從不同報紙與大眾文本的比較也可發現，報紙的組織框架形塑出不同的事件報導立場，也更顯示出媒體組織在議題操作上留下刻意的痕跡，表示新聞框架形成的人為與複雜性，更顯示所謂的仇韓集體記憶當中，其實包含著相當主觀的認同偏向，使得其在真實性與正確性存有疑義。

集體記憶如 Le (2006) 所指出，是一種「對於過往的導覽」(orientation to the past)，讓國族成員藉由重溫不論是自身或他者的集體記憶，從而強化認同。但我們可以發現所謂的仇韓集體記憶是媒體藉由不斷的新聞框架累積而成的，逐漸建構出韓國的形象，這種新聞框架的產生，實是有許多深層因素在其中生成。一個新聞文本的誕生，背後包含了個人框架的累積，以及個人新聞義理與組織經營目標的協商過程。

在訪談中可知，整體的歷史脈絡的確影響了個人框架的生成，如台韓之間的商業關係與外交脈絡碰撞，當中包含了前述所謂的國族認同，這樣的一致認同連記者也無法避免，使得在撰稿時受到影響，讓事件報導在第一時刻或有灰色地帶時，容易有先入為主的觀念，不知不覺地創造了議題走向。

然而，個人框架也可能與組織框架產生碰撞，在訪談中也發現，當組織認為這類仇韓的議題可以操作時，新聞記者往往必須放下己見，去建構部分真實，而這樣的協商的結果，成為了大眾所見到的仇韓新聞文本，在不斷的框架累積下逐漸形成了一種創制傳統，也形成集體記憶。這樣的情形呼應了 Zelizer (1993) 所說，這種媒體的集體記憶建構往往會屈就認同的一致性，或者受到權力的脅迫，使得其在真實性與正確性上存有疑義。

從 Hobsbawm 提出的「創制傳統」概念觀察，「傳統」往往具有一定的歷史意識，才具備「創制」傳統的動機與背景，然而也涉及了個人的「現實意識」。所以當民眾透過媒體中介，感知到與韓國衝突事件的國族情緒，進而產生仇韓的

集體記憶認同，這種仇韓集體記憶的傳統看似理所當然，展現出民眾的民族熱誠並且能與特殊的歷史經驗連結，但背後實是許多的人為因素所構成，包含不同的框架相互生成、累積以及與媒體商業利益的協商，最後成為大家都可以接受與認同的「被創制仇恨」。

三、亞細亞孤兒—看見另一個「我」？

一直以來，台灣常以「亞細亞的孤兒」作為自己的近代民族史寓言，努力希望獲取國際認可，這種認可確建立在流動的自我認同上，必須藉由他者的形象不斷的定義自己；如果將台韓兩國的歷史脈絡與競爭情況納入 Schmitt 敵我之分的思考情境，那麼台灣人將韓國視作敵人並不值得大驚小怪，因為台灣對於韓國有著的相對複雜的心態，讓「亞細亞的孤兒」仿若看見另外一個自己，深怕被競爭淘汰而無法被眾人所認可，韓國因而成為一個容易受到放大的比較對象，這樣的情節出現在台韓兩國文化、經濟、體育的交流上，讓台灣人對韓國有著特別的愛恨情仇。

仇韓情緒其來有自，來自於台灣、韓國各種面向的競爭與比較心態，來自於台灣人對於韓國的複雜認同，進而形成了一種自主性的缺乏與集體焦慮。劉昌德（2011）即指出，仇韓的情緒並非是短暫的抽象激情，是在這十幾年來每隔一陣子就會被喚起的集體記憶，韓國是我們所排除在外的「他者」，但同時也是台灣人心中默默斤斤計較的「自己」，這種焦慮與仇恨來自於政治經濟的結構因素，唯有找到台灣的自主性，我們才能超越這種想像出來的國族情愫。

從這個角度來看台韓間的愛恨情仇，可以了解這是一個大結構下的社會情緒，但這樣的社會情緒如本文所強調，媒體的力量在其中穿插，承載著過去與現在的集體記憶，並在適當的時機不斷讓大眾複習，誠如 Gillis（1994）指出，大眾媒體實是「儲存並分類」了過去，這些被中介的過去成為媒體全力合理化的資源。換句話說，在媒體所呈現我們所「熟知」的過去或現在，其實都是被中介的結果，是一種被建構出來的真實。透過在本文中資料蒐集與討論便可以發現，這樣的集體記憶與認知，並非如此自然，當中有著許多的刻意建構，除了大環境的結構因素，但更是媒體新聞框架後的真實。

在媒體的框架產製過程中，組織的經營考量往往成為文本產製的最終考量，使得仇韓新聞框架以讀者為導向，以新聞商品為前提建構文本。這樣的媒體真實

隨著時間的拉長，也逐漸的被認知為一種社會真實，與整個大環境結構變得相互生成，慢慢成為一種被創制的傳統，自然地存在於眾人的仇韓集體記憶中，等待下一次的觸發時機並且作為媒體可依歸的新聞商品固定產製公式。

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一、研究限制

首先，本文透過「框架」內容分析，試圖描繪台灣「仇韓情緒」的輪廓。然而因為時間、人力上的限制，在媒體樣本的選擇上只能採取「立意抽樣」方法，以仇韓言論最有可能爆發的關鍵論述時刻進行採樣，這樣一來便無法較為全面性的觀察媒體文本的對於韓國形象的演繹過程；二來也因為樣本的抽樣時期縱深較長，只能選擇部分事件進行編碼，然而事件與事件當中空隔時間不一，可能會造成無法精準的判斷不同時期之間的差異性。

另外，由於本文主要想要觀察不同時期、不同媒體之間的再現差異，探究其框架論點與方向，然而因為觀察年代既長且遠，部分媒體因為產權轉移或因歷史發展，使得在樣本母體的選擇上，無法全部統一放在相同的基礎點上比較，雖然本文已經力求以類似相同走向的報紙進行採樣，但仍有無法一致的缺憾。

再者，本文選擇用 Tankard 的「框架清單」分析途徑，儘管有量化分析長時間議題框架的優勢，但可能無法深入探討新聞內涵，以及進一步剖析文本中媒介框架競爭過程中的權力關係與歷史社會脈絡狀況。而使用「框架論點」與「框架方向」也有類目建構上的缺失，比如語意相近而無法做到完全互斥原則，以及同篇文本可能不止一個框架論點，皆為本文的研究限制。

最後，由於國內研究仇韓相關議題論文目前尚屬未開發狀態，大多數與韓國相關傳播媒體論文則以韓劇、韓國流行文化來作探討，使得筆者在蒐集資料時較無法獲取直接性的參考，只能旁敲側擊當中相關意涵並綜合其他領域理論，逐步釐清概念與建構研究方法。也因此雖然本研究有諸多限制，但由於先前並無類似的框架研究文獻，故也希望藉由本文成為後續相關研究的發展基礎參考。

二、研究建議

本文將媒體視做仇韓集體記憶的建構來源，也因此藉由框架分析去探究媒體

是否有刻意操作的痕跡，當中雖然有加入大眾文本進行對照，但無法知曉一般民眾被影響的確切來源是否與媒體相關？所承接的集體記憶如何？如何看待這樣的集體記憶？因此，若能加入大眾端進行討論，對於研究整體的仇韓社會情緒應能有更完備的輪廓。

其次，在筆者蒐集資料的過程中，發現仇韓似乎具有性別上的差異，仇韓情緒的發言者在資料中大多以男性為主，而女性則被營造為韓劇或韓星的迷群，但是否實際如此或是純粹因為性別問題造成國族意識的差距，值得進一步了解。

此外，韓國流行文化在近年風靡東亞甚至歐美，若能瞭解國內韓國流行文化的消費端觀眾，在面對台灣與韓國的衝突議題如楊淑君事件時，其心態或行為是如何調適或轉變，相信也會是有意義的研究主題。



參考文獻

- 王石番 (1991)。《傳播內容分析法》。台北：幼獅文化。
- 王明珂 (2001)。《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台北：允晨文化。
- 尹俊傑 (2008) 《報紙政治新聞小報化傾向初探—蘋果日報在台發行前後之比較》。政治大學新聞所碩士論文。
- 朱立熙 (1993)。《再見阿里郎：台韓關係總清算》。台北市：克寧。
- 江佩蓉 (2004)《想像的文化圖景：韓流與哈韓族在台灣》。政治大學新聞所碩士論文。
- 林富美 (1999)。〈從自立早報停刊事件談台灣報業發展的宿命〉，《目擊者》，第10期，頁7-9。
- 林建利 (2007)。《網咖與遊戲網路新聞之建構—框架分析與社會認知的觀點》。中正大學電訊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 邱俊榮 (2006)，〈台韓經濟發展消長比較分析〉，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委託研究計劃案。
- 周宜慶 (2008)。《日據時代皇民化運動對台灣與韓國身分認同的影響-兼論台灣族群共識的建構》。國防大學政治所碩士論文。
- 柯裕棻 (2009)。〈十年愛恨論韓國〉，中國時報 (2009.12.16)。
- 荊子馨 (2001/2006)，鄭力軒譯。《成為日本人：殖民地臺灣與認同政治》，臺北：麥田出版 (原著：Becoming “Japanese”: Colonial Taiwan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Formation.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侯致遠 (1999)。〈大眾傳播與運動之互動現象及其影響〉。中華傳播學會年會論文。
- 翁秀琪 (2000)。〈集體記憶與認同構塑—以美麗島事件為例〉。中華傳播學會年會論文。
- 翁秀琪 (2001)。〈集體記憶與認同構塑—以美麗島事件為例〉，《新聞學研究》，

第 68 期，頁 117-149。

張京媛（1995）。《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台北：麥田出版社。

張卉穎（2004）。《蘋果日報對聯合報、中國時報的影響》。政治大學新聞所碩士論文。

張敏華（2005）。《「新台灣之子」的媒體形象：外籍配偶子女之新聞框架研究》，中正大學電訊傳播所碩士論文。

陳順孝（2003）。《新聞室的控制與反控制》。台北：五南。

陳子軒（2007）。〈國族（的）運動：棒球與台灣認同〉。《文化研究月報》，第 68 期。取自 http://hermes.hrc.ntu.edu.tw/csa/journal/68/journal_park681.htm。

陳姿伶（2008）。《台灣年輕男性韓劇閱聽人的收視經驗》。台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家奇（2008）。《解構媒體建構的王建民現象—國族、名人、與媒體商品》。中正大學電訊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詩婷（2011）。《H1N1 疫苗新聞的媒體再現—以《聯合報》及《蘋果日報》為例》。文化大學新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章倩萍（1994）。《新聞記者的認知策略之研究》。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郭洪妃（1997）。《文化民族主義》。台北：揚智。

郭良文（2002）。〈流動的認同，建構的國族想像〉。《中華傳播學刊》，第二期，p41-46。

游任濱（2002）。〈斷裂與懷舊中的呼喚—紀念攝影集中的國族認同〉。《傳播文化》，[9]: 37-60。

楊瑪利等（2002）。《韓國，佔線中：從經濟破產到文化征服》。台北：天下文化。

鄭瑞城、羅文輝（1988）。〈電視新聞消息來源人物之背景與呈現方式之研究〉。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鄭祖邦（2009）《決斷敵人:台灣新國家的難題與可能性》。第二屆佛光大學社會

科學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

臧國仁 (1998)。〈新聞報導與真實建構：新聞框架理論的觀點〉，《傳播研究集刊》第三集。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

臧國仁 (1999)。《新聞媒體與消息來源－媒介框架與真實建構之論述》。台北：三民書局。

劉伊倩 (2004)。《韓劇閱聽人研究－以台北女性為例》。台灣大學新聞所碩士論文。

劉昌德 (2002)。〈足球 不是國族主義與媒體營利的工具〉，南方電子報 (2002.06.27)。

劉昌德 (2006)。《全球資本主義下的國族主義：以世界棒球經典賽中的 BBS 討論為例》。中華傳播學會年會論文。

劉昌德 (2010)。〈仇韓的虛實與超越〉，中國時報 (2010.11.24)。

劉昌德 (2011)。〈仇恨韓國人。成為韓國人〉，《共誌》，創刊號，頁 6-9。

鍾蔚文 (1992)。《從媒介真實到主觀真實》，台北：正中書局。

鍾蔚文，臧國仁，陳韻如，張文強，朱玉芬 (1995)。〈新聞的框架效果〉，臧國仁主編，《中文傳播研究論述》，P.243-256。

羅世宏 (1994)。《後蔣經國時代的國家、大眾媒介與反對運動：國家認同議題的媒介框架分析》。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蘇蘅 (2000)。〈集集大地震中媒體危機處理的總體檢〉，《新聞學研究》，62：153-163。

Ang, I(1990). The nature of the audience. In John Dowing , All Mohammadi,& Annabella Sreberny-Mohammadi(eds.),Questioning the Media: A critical introduction.(pp.155-165).Sage Publications.

Appadurai, A. (1996). Modernity at larg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Baker, E. (2004/2008), 馮建三譯。《傳媒、市場與民主》。台北：巨流。(原著：Media, Markets and Democracy.UK: Cambridge Press.)。

Bantz, C.R. (1990). Corporation Culture. In S.R. Corman et al. (eds.). Foundations of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New York: Longman.

Barker, C. (2003/2004) 羅世宏等譯。《文化研究—理論與實踐》。台北：五南。(原著：Cultural Studies -Theory and Practice.London;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Benedict,Anderson (1991/1999), 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台北：時報。(原著：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 New York : Verso)。

Chung, Wei-Wen and Tsang, Kuo-Jen (1993). News frames reconsidered: What does frame do to realit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EJMC convention, Kansas City, MO. USA

Cohen, A. P. (1985). The Symbolic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New York: Tavistock Publications.

Croteau, D. & Hoynes, W.(2001). The business of media: Corporate media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Thousand Oaks: Pine Forge press.

Davis, Dennis K. (1990) "News and politics", in Swanson, David L.& Nimmo, Dan (eds.) New Directions in Political

Eco, U. (1986) 'Sports chatter', Travels in Hyper-Reality. London: Picador.

Entman, R. M.(1993). Framing: Toward clarification of a fractured paradigm.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 51-58.

Fridriksson, L. (1995). Media framing of a crisis in the Western Alliance. Paper presented to the AEJMC convention, Washington, D.C.

Gamson, W. A., & Modigliani, A. (1989). Media discourse and public opinion on nuclear power: A construction approach.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5,1-37.

Garnham, N. (1979).Contribution to a political economy of mass communication.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No.1. pp:123-146.

Geertz, C.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Basic Books.

Gellner, E. (1994). *Nationalism and Modernization*. In J. Hutchinson & A. D. Smith (Eds.), *Nation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erhards, J. & Rucht, D. (1992). *Mesomobilization: Organizing and framing in two protest campaigns in West German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8: 555-595.

Gillis, John R.(1994). <Memory and identity: The history of a relationship >. In John R. Gillis, (ed.). *Commemorations: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identity*.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Gitlin, T. (1980).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Beverl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offman, E.(1974). *Frame analysis: A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albwachs, Maurice. (1992). *On collective memory*.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all, S. (1996). Introduction: Who needs identity .In S. Hall & Paul du Gay (Eds). *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 (pp. 1-17).London: Sage.

Hesmondhalgh, D. (2002/2006)，廖珮君譯。《文化產業》。台北：韋伯。(原著：The Culture Industries.)。

Hobsbawm, E. J (1990/1997)，李金梅譯。《民族與民族主義》，台北：麥田。(原書: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Programme, Myth, Realit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Hobsbawm, E. (1983/2002)，陳思仁等譯《被發明的傳統》。台北市：貓頭鷹出版社。(原著: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Press.)。

Horne, J., Tomlinson, A., & Whannel, G. (1999). *Presentation, sport and the media*. In J.

Horne, A. Tomlinson, & G. Whannel (Eds.), *Understanding spor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ical and cultural analysis of sport* (pp. 161-192). New York, NY: Routledge.

Jhally, S. & Livant, B. (1986). *Watching as working: The valorization of audience consciousnes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6(3):124-143.

Kellner, D. (2003) *Communications vs. Cultural Studies: Overcoming the Divide* [Online] . Available: <http://www.uta.edu/huma/illuminations/kell4.htm>

Keller, S. (2003). *Community : Pursuing the Dream, Living the Real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ing A (1997). *The postmodernity of football hooliganism*.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48, 576-593

Klein, Alan M. 1997. *Baseball on the Border: A Tale of Two Laredo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e, E. (2006). *Collective memories and representations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editorials: obstacles to a renegotiation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Journalism Studies*, 7(5), 708-728.

Lippmann, W. (1922). *Public opinion*. New York: The Harcourt Brace

Maguire, J., Jarvie, G., Mansfield, L. & Bradley, J. (2002/2008), 黃東治、邱金松譯。《運動世界的社會學》。台北：學富。(原著：Sport Worlds: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Champaign: Human Kinetics.)。

McDonald, M.G. & Andrew D.L. (2001). *Michael Jordan: Corporate sport and postmodern celebrityhood*. In Andrews, D. L., & Jackson, S. J.(Eds.), *Sport stars: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sporting celebrity* (pp.20-35). New York:Routledge.

McManus, J.H.(1992).*Serving the public and serving the market: A conflict of interest?* *Journal of Mass Media Ethics*.7(4), 196-208.

Parisi, P. (1995). *Toward a “philosophy of framing”*: Narrative strategy and public

journalism. Paper presented to the ICA convention, Chicago.

Picard, R. G. (1989/1994), 馮建三譯。《媒介經濟學》。台北：遠流。(原著：“Media economics: Concepts and issues”。London: Sage.)。

Rhee, J. W. (1995).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news frames and an interpreter's schemata: A theory and a simulation. Paper presented to the AEJMC convention, Washington, D.C

Rowe, D., McKay, J. and Miller, T. (1998) 'Come Together: Sport, Nationalism and the Media', in L. A. Wenner (ed.) Mediasport. London: Routledge .

Schmitt, C (1932/2004), 劉宗坤等譯。《政治的概念》。北京：世紀出版集團。(原著：Der Begriff des Politischen.)。

Schwartz, Barry (1996). "Memory as a Cultural System: Abraham Lincoln in World War II."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Oct 1996; 61, 5.

Smart, B (2005/2008), 何哲欣譯。《運動明星：現代運動與運動名人的文化經濟學分析》。臺北：韋伯文化。(原書：The sport star: modern sport and the cultural economy of sporting celebrity. Sage Publications.)。

Smith, A. D. (1998). Nationalism and moderni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Tankard, J. W. Jr., Hendrickson, L., Silberman, J., Bliss, K., & Ghanem, S. (1991). Media frames: Approaches to conceptualization and measuremen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EJMC convention, Boston, MA

Tomlinson, J. (1991). Cultural imperialis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Vincent Mosco. (1996/1998) 馮建三，程宗明譯。《傳播政治經濟學》。台北：五南。(原著：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Rethinking and Renewal. London: SAGE.)。

Wertsch, J. (2002). Voices of collective remember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immer, R. D. & Dominick, J. R. (2003). Mass Media Research: An Introduction (7t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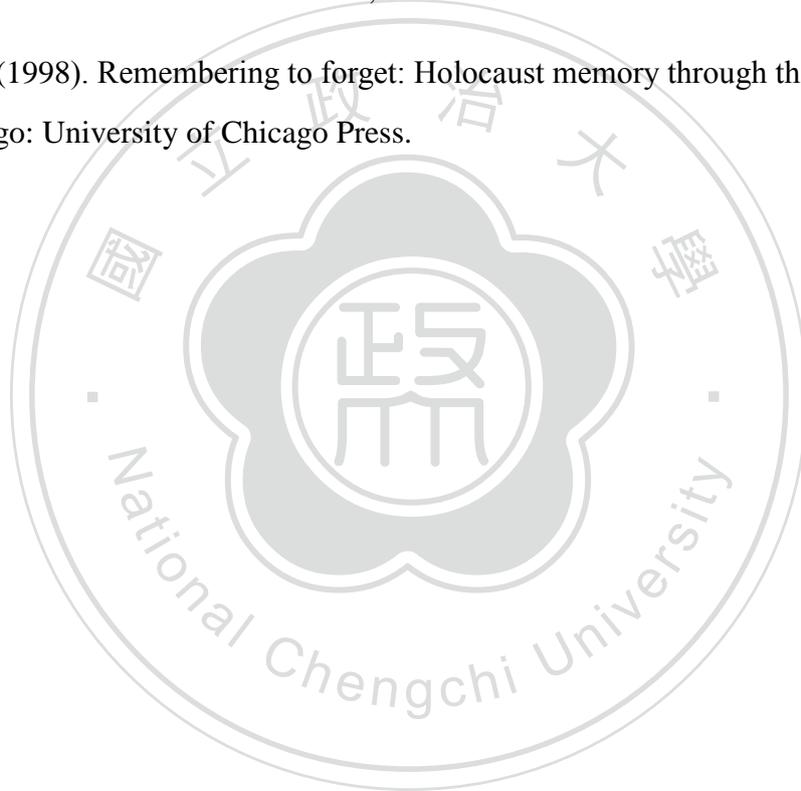
ed). Thomson Wadsworth.

Whannel,G. (1979) 'Football Crowd Behaviour and the Press', *Media,Culture &Society* 1(2):327-42

Yang.F.C.(2008). "Rap(p)ing Korean Wave: National Identity in Question." *East Asian Pop Culture*. Ed. Chua Beng Huat and Koichi Iwabuchi Pp. 191-216.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Zelizer, B(1995).<Reading the past against the grain: the shape of memory studies>,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12:214-239.

Zelizer, B. (1998). *Remembering to forget: Holocaust memory through the camera's Ey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附錄一 訪談大綱

訪談採取半結構方式進行，以訪談大綱為輔助，針對特定議題進行系列發問，題綱作為提示之用，訪談問題根據現場狀況與對象進行調整。

1. 過去對韓國賽事的報導經驗如何？是否會影響到這次楊淑君事件的報導？
2. 此次楊淑君事件中，您本身對台韓中之間的看法是？為什麼？
3. 在楊淑君事件時，有希望特別採訪或呈現哪方面的新聞嗎？考量的原因？
4. 在楊淑君事件當時，有接收到什麼內部方針指示嗎？有什麼看法？
5. 在楊淑君事件發生後，是否有意識的將之發展成議題？考量的原因？
6. 隨事件時間推移，怎麼維持新聞議題？有不同的方針嗎？
7. 楊淑君事件發生後，會傾向取得哪些消息來源？在不同時間階段有哪些差別？
8. 報導楊淑君事件是否有擠壓到其他你想呈現的新聞？你有什麼看法？
9. 初步資料蒐集後，發現各報對於楊淑君事件的解讀不太一樣（仇中仇韓），有什麼看法？
10. 初步資料蒐集後，發現四報在新聞撰寫上對韓國仇視情緒的報導比例有不同，您的看法？
11. 初步資料蒐集後，發現網友討論楊淑君事件解讀與報紙不太一樣（仇中仇韓），你的看法是？您如何看待網路上對事件較為戲謔的解讀方式？
12. 在撰稿或編排時，有參考或是感知道某些意見氣候嗎（網友 or 政府）？考量的原因？